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譚光鼎教授

bell hooks黑人女性主義教育觀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

研究生：許雯茜

中華民國一0三年六月

謝誌

念碩士這個決定幾乎是一瞬間的事，正值大三升大四的人生階段，因為想當老師、對教育學程當中接觸到的教育社會學皮毛產生興趣而決定報考師大教育所。對於未來要從事的職業已經有了大概的想法與了解，我以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卻在身邊同儕大多開始工作而有了「像大人一樣的生活」之後，開始懷疑自已的決定。

在高中以後，那些沒有人幫我規劃的讀書與學習自由而無邊際，我幾乎花了整個大學四年的時間學習如何「學習」，這樣的漫無目的似乎太不符合投資效益了。讀書如果拿不出什麼可以展現的成果，也就無法證明所讀的這些書是有用的，大家都是這麼說的，好像也就無法反駁。那麼大學畢業後，不是真正進入社會、而是繼續深造也就只是逃避長大的冠冕堂皇的說法，是安逸生活的延續，是不用真正為自己負責的冗長人生的苟延殘喘。真的是如此嗎？倘若這一紙薄薄的碩士文憑對我的意義僅止於此，我想我不會快樂，這篇謝誌也寫不出來了。

我想說的是，寫論文這趟旅程充滿衝突、走走停停，可以說是我人生至目前為止最曲折卻也最有收獲的一段時光。碩士班整整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卻讓我成為現在的我。比較喜歡自己，比較懂得同理心，比較知道對於這個世界而言什麼是重要的。在這裡我遇見心胸無比寬闊的人；我遇見對身邊發生的事總是非常敏感、把別人的痛苦看得比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人；我遇見許多自由騷動的靈魂，接觸了一顆又一顆無比真誠的心。

這趟旅程學習的是如何在真正的寧靜中面對自己、檢視自己，然後是不斷的反思，在對與錯、黑與白之間翻滾衝撞終至圓滑。圓滑之後出現的不是無瑕，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印上斑斑點點的生命痕跡。在旅途中遇見的每一張臉孔，如水也如鋼，雕琢我成為不那麼完美卻真實的模樣。我想要感謝每一個我所遇見與即將遇見的人，感謝我的研究對象/人生導師 bell hooks，多麼希望我能像你一樣，在那全部小寫的假名當中沒有自我卻又充滿自我，如此卑微卻也如此高傲。那是一個偉大而透明的靈魂燃燒自己的樣子。

然後我會去做，去教導、去學習，思考也實踐。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bell hooks 黑人女性主義教育觀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

摘要

本研究以理論分析法，針對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反種族主義理論進行分析，並據以探究其教育理論之蘊意與內涵。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一、研究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的淵源與發展。二、分析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當中性別與種族的交互關係。三、探討 bell hooks 教育理論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與應用。四、對新移民女性在教育當中建立主體性提出可能的方法與建議。

hooks 在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上和第二波女性主義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對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有批判也有承繼，提出男性不是女性的敵人而是盟友，並且批判白人女性以所有女性的代言人自居所發展出的女性主義理論。而其反種族主義理論，則是批判男性中心的黑人權力運動，提出「黑人性」的概念取代黑人權力運動當中盛行的新民族主義。主張喜愛黑人性能夠破除黑色被他者化、商品化的問題，並提出後現代黑人性，挑戰傳統黑人認同當中的本質主義概念。hooks 的教育觀主要包含幾種要素，分別是「學習批判思考」、「去殖民化的教育」和「建立主體性」，而教育的最終目的則是作為一種自由的實踐，使個體建立主體性，達到真正的自由。

性別與種族是兩個密不可分的體系，彼此相互影響，並且在兩者之中都存在著階級的差異。在台灣的新移民女性身為性別、種族、階級三方面的弱勢，處在社會的最邊緣，在其建立主體性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障礙包括被社會問題化、媒體呈現的負面形象、身體的商品化、因語言不通而無法自我表達與描述、以及在保留原生文化與融入台灣文化之間的兩難。針對這些困境，研究者建議在台灣所提供的新移民女性教育，應該讓他們擁有和壓迫者對話的能力、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擁有能夠以原鄉語言和中文表達自我的能力與空間、以及在其所處的社會結

構邊緣做出抗拒的能力，最後以愛為中心，透過教育實踐真正的自由。

關鍵字：bell hooks、新移民女性、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主體性

A Study of bell hooks' Black Feminist Though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Abstract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 on education. This study has four main goals: (1) To delve into bell hooks'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her education theories, (2) To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 of race and gender in hooks' education theory, (3) To explore the inspi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ooks' education theory on the education of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4) To propose possible approaches for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to establish their subjectivities through education.

hooks, as a feminist,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he inherits some ideas of the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criticizes that the privileged white women should not speak for all women, and propose that men should not be women's enemies but allies in feminist struggles. hooks' anti-racist theory criticizes the male-centered Black Power Movement, and raises the idea of "blackness" to replace the idea "Neo-Nationalism" which is popular during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in the 1960s. hooks states that loving blackness can solve the problems among black community, such as the otherized and commodified concepts of black. She also proposes the idea of "postmodern blackness", challenging "essentialism" in traditional black identities. hooks' education theories include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the decolo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ies".

Race and gender are inseparable, and their influences are interrelated. Also, there

exist class differences in both systems. New female immigrants, as a marginal group in Taiwan, encounter obstacles like social problematization, negative image presented in mass media, the commodification of female body, the lack of abil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Chinese, and the dilemma between retaining their original cultures and assimilating into the culture of Taiwan. Facing these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es suggest that the education for new female immigrants in Taiwan should equip them with the ability to converse with the oppressors,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 ability and space to express and speak for themselves both in Chinese and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nd the ability to perform the act of resistance at the margin of society. At last, hopefully, these female immigrants will be able to acquire true freedom with love.

Keywords: bell hooks, new female immigrants, feminism, anti-racism, subjectivity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9
第三節　研究方法架構……10
第四節　文獻探討 ……11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13

第二章　bell hooks 生平與思想介紹……15

第一節　家庭成長階段的影響……15
第二節　學習階段與學術生涯的影響……20
第三節　bell hooks 的研究範疇……24
第四節　本張小結……27

第三章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 29

第一節　女性主義的發展 ……29
第二節　bell hooks 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承繼與反動……35
第三節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內涵……39
第四節　bell hooks 女性主義理論之影響與限制……46

第四章　bell hooks 的反種族主義理論…… 51

第一節　黑人權力運動……51
第二節　bell hooks 對黑人權力運動的批評……57
第三節　何謂黑人性……62
第四節　bell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與限制…… 73

第五章　bell hooks 的教育觀和種族與性別的交互關係……81

第一節　bell hooks 的教育觀……81
第二節　種族與性別的交互關係……95

第六章　bell hooks 教育觀與新移民女性的主體建立……105
第一節 當然有關係—性別、種族、階級與教育…… 105
第二節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遭遇的主體性困境…… 106
第三節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主體性建立…… 113

參考文獻……119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闡述研究者的研究背景與動機，首先分析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理論發展的過程以及在當中 bell hooks 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藉由分析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脈絡，探討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再進一步分析當前新興族群「新移民女性」的教育需求。根據研究動機，提出具體研究目的以及可行的研究方法。最後闡述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可能的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多元文化主義的定義與發展

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一開始是因著族群關係的議題而開展，然而其所引發的後續影響與思考卻不僅止於族群。美國是一個移民為主要組成的國家，其民族大熔爐的形象曾經掩蓋了當中種種的不平等，展現出所謂的「美國化(Americanized)」的社會。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大量移民潮從紐約登陸，該時期的教育強調美國文化認同的發展，學校更加強以一個核心文化為標準，執行貫徹單一美國文化認同的教育措施。在這樣的教育措施底下，美國為數眾多的墨西哥裔學生被禁止在教室之外講母語西班牙語，許多大城市也紛紛成立天主教學校，傳承新教習俗（莊明貞，1997）。從定義上來說，非裔美人是屬於最古老的美國人之列，因為他們的文化傳統幾乎是在美國土地上形成的。雖然美國在獨立宣言中寫著：「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非裔美人族群很快地就發現在美國社會，這裡所說的「人人」並不包括他們，無數事實也告訴他們，想要擁有平等的權利必須靠自己的鬥爭。

自 1955 年 Rosa Parks 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而被捕，引發由 Martin Luther King 所領導的黑人抵制城市公車運動，隨後黑人的民權運動即如潮水般席捲全美國。(Franklin, 1980)在接下來的十年間，美國的黑人族群開始要求各項平等的權利。1960 年代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消除在居住環境、工作僱用與教育上的歧視。196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懸置多年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Law)》，該法不僅廢除了在公共設施中的種族歧視與隔離，更宣布在就業上的一切歧視皆違法。此後對

教育直接的影響是公立學校取消種族隔離，自此美國非裔美人的教育邁入嶄新的階段，除非裔美人之外的各民族也開始要求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進行課程改革，使課程能反應他們的經驗、歷史、文化與觀點，在公立學校也要求僱用較多的非白人教師與行政人員作為學生的楷模，並且修訂教科書使能反應美國人口的多樣性(Banks & Banks, 2004)。

作為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社會改革運動之一，女權運動批判的是社會普遍對女性在工作僱用、薪資、教育上的歧視，認為這樣的歧視與制度化的性別中心主義限制了女性的機會，並對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Steinem, 1995)。在教育層面上，有不少女性主義者相信教育對於改善性別不平等是深具效用的，但是對更大多數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教育理論與實務中所蘊含的性別偏見與歧視及其所造成的父權再製結果，才是更應該加以批判並改善的。對於教育制度，女性主義者提出和非裔美人的要求相似的問題，教科書與課程被男性支配，女性在教科書中經常是消失不見的。於是，女性主義者對教育的改革提出教科書的修訂，以包含較多在國家及世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而在小學中，大部分的教師多為女性，行政人員則為男性，因此，在學校的工作僱用上也要求更多的女性被僱用為學校的領導階層(Sadker, Sadker & Klein, 1991)。

因著黑人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的成功，加上日益激增的社會公平風氣之影響，刺激其他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思考，長期以來處於美國這一塊土地上，他們自身的歷史文化是如何地被同化、並且受到壓抑，各種邊緣族群開始進一步採取行動，力圖反抗主流文化力量，減少其在社會各層面受歧視的現象，爭取更多的權益。殘障者、年長者、同性戀者等邊緣族群的權利促進組織也在這時期開始組織起來，投入制度與法律的改革。1975 年的《全體障礙兒童教育法案(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要求殘障學生應在最少限制的環境當中接受教育，並且將教育中的主流制度化，在法律上為殘障學生爭取到基本的受教權利。特殊需求學生的教育受到重視，在課程與教學層面、教育政策層面以及教育相關研究上，特殊教育開始成為必須的考量。

多元文化當中，個體對文化的認同是其歸屬於什麼樣的認同族群的主要依據。Paula Moya 曾經在其著作《重得認同：實在理論與後現代的困境(Reclaiming Identity: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Postmodern)》中評論到認同議題的困境：「當認同作為政治行動的一個基礎，行動主義者以及學術界似乎都下了一個結論－認同有著理論上的無邏輯性，且在政治上具有危險性。…[認同]有著單

方面認定的傾向，視之為唯一的原因或是構成個人經驗社會意義的決定因素。…目前為止每一個女性多少都和其他女性有著明顯不同，要決定『完備的女性認同』，並且在女性此一意符之下來統一不同的女性，那是不可能的(Moya, 2000：1-3)。」

關於女性及性別議題的許多努力，許多時候是聚焦在美國及其他國家與文化的白人女性身上，漸漸地，在檢視與探討女性生活經驗時，談論者已經習慣將中產階級白人女性視為常模。認同沒有固定本質，不是一種統一而均質的方式，認同反映並顯露有關世界的知識，應該是多重而互相關連的。本質論的認同取向容易模糊認同的特性，在引導人們一起結盟時，讓認同「難以從Ａ移到Ｂ」(Wolley, 2003)，而這正是出現在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中的兩難。二十世紀下半，非裔美籍女性開始以她們所經驗的非裔美籍女性生活與歷史來發出異議，批評人們總是假設教育理論可以同時適用在黑人與白人女性身上，而學校課程則帶有種族歧視與白人中心主義。

bell hooks 身為一名非裔美籍女性主義學者，畢生的志業就是為黑人女性發聲。其承襲 Paulo Freire 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的討論，在美國這個族群組成多元而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卻未被完整辨識的地方，hooks 扮演部分的「美國的 Paulo Freire」而起了一種打破現狀、介入理所當然的思考模式之作用(Apple, 2009)。bell hooks 以自身生命經驗分析美國社會，分析社會中的支配、屈從與鬥爭；hooks 也發展理論，但是理論不只是闡述道理的方式，更是一種療癒，是一種具有解放功能的社會實踐。

hooks 的著作超越學術界，訴諸所有族群的痛與苦，而其理論根基仍是對於黑人族群的愛。她挑戰女性主義主要發生並發展在學術界的現實，其自身就是參與在改變力量中的女性主義者之一。除此之外，hooks 也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演講者，同時還參與了許多紀錄片的拍攝，在紀錄片中分析美國社會和文化現象。bell hooks 的聲音是激進的，是充滿爭議的，同時也是不容忽視的。2001 年出版的《二十世紀美國文化理論家(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Cultural Theorists)》把 hooks 列為 35 位二十世紀改變了美國思想的知識分子之一；2003 年出版的《不被束縛的聲音：12 位美國女性知識分子(Voices Unbound: The Lives and Works of Twelve American Women Intellectuals)》一書則將 hooks 列為美國二百年來最重要的女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肯定其對於黑人族群的團結與自我實現所做的貢獻 (沈睿，2008；Davidson & Yancy, 2009)。

鑑於 hooks 之理論與學術發展在美國的貢獻，而臺灣地區對於 hooks 仍感到

相當陌生，大部分研究或介紹仍專注在其教育理論內涵，且多集中在二十年前出版的教學越界一書當中的論點。然而，正如同 hooks 為大眾所知的身份，他是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他關心文化、媒體階級差異等議題，著作範疇涵括性別、種族、階級甚至流行音樂、電影、童書等。對他來說，各種壓迫形式本來就是相互交織的，不能個別分割出來檢視。另外，身為一名關注流行文化與社會關係的社會學者，hooks 的理論發展在這三十年是與時俱進的，是隨著當代議題而轉變的，hooks 本人也時常強調應該從他最新的著作開始了解，最能夠抓住重點。

因此，若想真正的了解 hooks 的理論，勢必要將其理論發展過程作清楚地梳理。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便是從 hooks 的種族以及性別理論面向，分析其三本教育相關著作當中的論點，探索其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之中的具體內涵。期望透過深入分析，耙梳其理論淵源與架構，為臺灣多元文化教育之本土化的發展提供借鑑與參考。

貳、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

台灣最早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從鄉土教育開始，民國六十年代前後，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處境上陷入空前挫折，激起台灣人民的危機感，並引發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反思，大眾對台灣的本土關懷湧現。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一連串包含鄉土文學論戰、鄉土藝術、校園民歌等本土化的風潮接續出現，在社會上對於重新定義台灣文化的呼聲漸高。然而此時期的政治風氣仍然保守，本土意識被認為具有分裂國家的傾向，使得以本土意識為核心的鄉土教育遲遲無法進入正規教育制度。台灣鄉土教育的發展，真正的源頭可以追朔自民國七十年代中期解嚴，社會民主化，國家經濟漸趨繁榮，相應地也促成文化的轉型，自此生活與思想方式轉趨多元，對多元文化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受到重視（洪泉湖，2005；張建成，2000；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

鄉土教育是台灣非常獨特的一項多元文化教育課題，相較於國外多元文化教育大都以族群、階級、性別為主要探討對象，鄉土教育似乎和這些「重點議題」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卻深刻反映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許多面向。隨著民國七十年代台灣政治意識從中國化轉為本土化，教育上的本土化改革行動，某種程度上象徵了文化的邊陲和中心之爭。台灣的鄉土教育在政治權力的趨使之下，被政治光環所圍繞，倉促地被推上舞台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議題。由於決定倉促，政策制定與執行上出現落差，理論發展與實踐之間也缺乏聯繫，也有學者擔心，過度倚

賴政治上的正確性，難以確保鄉土教育的執行成效，有時甚至會形成新的文化霸權，對教育反而有弊無利（張建成，1997）。

若是以文化出現的先後而言，台灣最早的本土文化應該是原住民文化。原住民的文化雖久遠，卻也是台灣現代化過程中受影響最大的弱勢族群。自台灣光復以來，對於原住民的教育政策長期皆是以「同化」為主要目標。1945 年至 1962 年間，政府推動的「山地平地化」政策，以改良風俗習慣、建立國家觀念為主要任務，目的在剷除日據時期文化的遺留；1963 年至 1987 年間的「融合整體」政策，則是以促進原住民族與一般社會的融合為主，此時期增加了針對原住民學生設置獎學金、改善學校師資設備等措施。自 1988 年起，原住民教育開始走向開放發展，強調尊重原住民文化以及政策的多元參與，陸續推動各項改善原住民教育的教育政策與計畫（譚光鼎，2012b）。1996 年正式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 年頒布《原住民族教育法》，其精神主要在落實多元文化教育，提出尊重原住民文化主體性與原住民教育權之自主性（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1998）。較諸早期以同化教育為主的原住民教育政策，雖然顯現出政府改革原住民教育的決心，實際上獲得的進展卻十分有限，相對忽略文化因素，也未能真正影響台灣原住民的教育與經濟向上流動。

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受到世界女性主義風潮的影響，也可以追朔自七十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張建成，2000；洪泉湖，2005）。一九七一年呂秀蓮自美國返台，一篇名為〈傳統的男女社會角色〉的文章，引起熱烈討論與注目，由其領軍的「新女性主義」於焉誕生。新女性主義主張先做人再做女人，抨擊台灣社會男尊女卑的現象，對台灣習以為常的父權制社會體系無疑是一當頭棒喝。自此以後的十多年間，台灣學術界亦陸續成立女性相關研究機構與課程，將女性意識與觀點注入大學教育。至民國九十年代中期，雖然台灣的性別平等意識受到社會關注，對於教育層面的實施卻一直限於民間運動組織以及教改團體間的討論。

而性別平等意識真正進入教育體制，始於 1996 年的彭婉如事件，自此女性人身安全與性別平權問題才真正成為全國關注的問題焦點。之後的一個月內立法院即三讀通過積壓多時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將性侵害防治列入課程，教育部並於隔年三月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制定各項教育計畫及課程綱要，並培訓性別平等教育師資和教育行政人員。2005 年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強調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或認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別待遇（劉美慧，2012），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也在二十年間逐漸將性別教育納入主流討論議

題當中。

近年來，台灣的族群組成中一個新興的族群是跨國婚姻家庭，政府自 2003 年起即試圖透過制定各種補償與改革政策，回應人口變遷而產生的問題。2004 年行政院「弱勢跨國家庭子女教育處境與改進策略」，規劃提早進入公幼、辦理學習輔導、舉辦國際日活動、辦理教育研討會與教材研發以及強化教育研究等配套措施。此外也廣徵教師、行政人員與專家學者意見，訂定補助各縣市政府推動「教育部推動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2009 年教育部通過「新移民子女教育改進方案」，特別著重語言與多元文化學習，包括實施華語補救課程、編印或購買多元文化教材、辦理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辦理母語傳承課程。至於新移民母語傳承的師資問題，教育部核定於 99 學年度學校規劃開辦新移民母語傳承課程，授權學校可聘請具新移民母語資格之教師（潘志煌，2011）。

作為台灣當前教育的迫切議題，對於新移民子女教育的相關研究很多，但多為學校生活的適應問題，較少碰觸教育中的「文化認同」議題。此外，跨國婚姻家庭現象同時也牽涉了性別、族群、階級等議題（游美惠，2012），以此觀點檢視台灣相關教育政策與論述，「多元」的呈現有餘，「文化」的理解卻不足，實為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必須反思之處。研究者認為，針對新移民的教育相關研究不應只停留在教學方法或政策分析的層面，關於其背後的文化因素，應該有更深入的理解與設想。華人文化當中「母以子貴」的概念仍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社會，也因此在新移民子女議題受到重視之時，新移民女性所受到的關注卻仍只有與子女相關的部分，對其作為獨立個體在台灣脈絡底下的發展卻是鮮少觸及。

新移民女性這個族群，從一開始被認為是不需要理會而自然會消失的冷僻議題，到後來雖然受到關注，卻多以處理「外國人問題」的角度，勉強地、帶有距離地去處理與面對。直到近幾年，政府和媒體才開始以「國內問題」正視新移民女性。然而這些關注仍著重在「問題解決」層面，究竟其中對於新移民女性本身在台灣的生活或文化適應有多少關心，恐怕不是做了幾篇研究或訂定幾條法規所能解釋的。從新移民女性還未正式正名以前被稱作「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就可以看出，雖然多數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以後就和小孩一起生根在這片土地，台灣大眾普遍還是把他們當做外人，所以「他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多數觀點都帶有「非我族類」的排他情結。如何突破這些陳舊的觀念，從新移民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來看待他們在台灣的各種境遇，是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重要的發展課題。

參、台灣新移民女性的處境

吳清山（2004）認為，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價值觀念與風俗習慣，在面對不同文化或生活環境之下，可能會產生一種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的現象。新移民女性的跨國婚姻經常要面對許多文化適應上的問題，往往必須迅速地做到「入境隨俗」，以排除生活不易的窘境。葉肅科（2006）認為，新移民女性經常面臨的問題，主要根源自六個面向：一、母國原生社會支持網絡的斷裂; 二、社會歧視與污名化的影響; 三、政治意識形態的政策扭曲; 四、多元文化社會的素養缺乏; 五、社會資本建構的能力不足; 六、邁向社會融合的障礙重重。

對於許多新移民女性來說，在婚姻關係中她們是被定位在台灣人的配偶、母親的角色上，而這樣的角色定位使得她們被矮化為附屬以及生產的工具，甚至是被當作「性商品」來對待或販賣（王君琳，2005）。然而，許多時候國家的政策或是大眾媒體是透過合法的機制過程，強化了男尊女卑的價值觀，而成了父權體制的共犯結構（林良穗，2008）。此外，在台灣傳統的父系社會觀念裡，女性被期待扮演的角色是以生兒育女、相夫教子以及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在這樣的觀念裡，女性在於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教育各方面皆屬於從屬的地位，更何況是被視為「生產工具」的新移民女性（林伊莎，2007）。因而在此父權結構的文化背景之下，所延伸出的即是社會大眾對於「母職」的與「女性」之角色期待。

在移民政策上，彭德富（2007）認為台灣的移民政策中是以階級主義做為設計主軸，並伴隨著性別主義，對於在階級上處於劣勢的新移民女性，採取歧視與不公平的待遇規範。同時，官方政府與大眾媒體之呼應，更使新移民女性在定位上與普遍觀點上處於更加劣勢的狀況。如王君琳（2005）提及政府與媒體形象對新移民女性，無論在各項權利的制定與社會角色的建構，均著重於「配偶」與「母親」的身分定位，並以「資源的消耗者」看待這群新移民女性。在此前提下所延伸出輔導她們融入台灣社會的目標就更加被突顯，因而完全忽略了她們的主體性。在新移民女性的婚姻關係探討中，不同於一般台灣女性，新移民女性須面臨更多的考驗與壓力。在這些壓力之下，如何跳脫「台灣媳婦」、「新台灣之子的母親」這些身份，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建立其主體性，並且在不抹滅其原生文化與傳統風俗的前提之下，爭取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各項「權利」和「權力」，是台灣研究者能夠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肆、新移民女性的主體性建立

美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對於主體性的討論是核心之一。雖然開始是由白人女性發起，女性主義理論很快地就必須開始面對不同背景下的女性主體，面對黑人女性主義者及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的抨擊，女性主義運動團體愈發意識到女性間的差異和多元位置，必須要謹慎地避免為族群/階級與女性雙重弱勢的女性團體「代言」的問題。「尊重差異」以及「看見差異主體」成為女性主義論述與運動的共識。在台灣，女性主義論述的發展深受美國的影響，對差異政治的認知也達到共識，卻鮮少看到差異政治在女性主義運動上的落實。

在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族群與性別雙重弱勢就是原住民女性，但除了原住民女性的議題，在弱勢階級女性的議題上，台灣的婦女團體皆很少介入。像是女性勞工的議題，全部由勞工團體介入，而婦女團體雖有參與關於是否應該開放引進外籍幫傭的爭辯，但外籍女性移工進入台灣以後出現各種權益被剝奪、甚至被性侵的問題，也多由勞工或教會團體發聲（林津如，2000）。因此，夏曉鵑（2006）認為，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團體，雖然在修辭上承認了在族群/階級弱勢位置的女性的主體性，但也僅止於修辭層面，在實際的運動當中鮮少落實。台灣的女性主義運動主體仍是漢人都市中產階級，明顯缺乏基層女性群眾的基礎。

新移民女性因其社會、經濟、語言及文化等多重弱勢，其主體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一些研究宣稱以人道關懷出發，卻是不斷地將新移民女性「受害者化」，將其描寫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婚姻暴力的受害者，忽略其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夏曉鵑認為，讓新移民女性擁有真正的主體性，首先必須從其賦權(empowerment)開始。這種賦權過程的第一步，就是滿足新移民女性的「實用需求」，也就是語言的習得。不會說中文成為新移民女性和外界接觸最大的阻礙，因此，各種識字班、中文補校的出現漸漸協助他們走出孤立無援的狀況，開始具備為自己發生的能力，也能自主捍衛自己的權利。

夏曉鵑進一步解釋，語言習得不只能夠滿足實用需求，也能夠供作策略需求之用。用 Paulo Freire(1970)的話來說，具備所處情境之語言能力，能夠「打破受壓迫者的沈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那麼對台灣的新移民女性而言，具備中文的讀寫能力，就成為了打破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沈默的必要條件。然而，具備語言能力也不全然意味著就能滿足取得平等公民權的策略需求，亦即看清楚壓迫的根源。實際上，台灣目前針對新移民女性所開設的課程多是透過語言的學習進行

同化與馴化。這些課程的內容不僅漠視新移民女性的主體性，也貶抑其母國文化的價值。夏曉鵑認為，唯有在這些課程中注入解放教育的觀點和方法，才有可能同時滿足前述之實用與策略的需求。

伍、黑人女性與新移民女性的相似之處

美國從奴隸時代到後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中，非裔美籍女性在支配的社會結構底下一直是處於最邊緣的位置，大略來說就是種族、性別、階級三方面的壓迫之下，黑人女性在人數上雖多，卻幾乎無法擁有任何公民權利。在談論種族議題時所指的黑人其實就是黑人男性，而女性主義者所進行的解放鬥爭，爭取的也是白人女性的權利。因為關於黑人女性的所有認識都成為「片面知識」，黑人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的主體性失去了，透過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描述所建構出來的黑人女性特質，其種族與性別的身份是斷裂的，是沒有發聲也沒有立場的，存在著卻不被看見。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首先這樣的跨國婚姻形成多是從相對邊陲的國家移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地位往往是相對弱勢的。而因為母國文化和台灣文化的差異，從語言、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容易遇到融入困難的情形。再加上嫁來台灣之時多是背負著傳宗接代的使命，這樣族群、性別、階級的三重弱勢，讓他們在主流社會的位置一直居於邊緣。也由於新移民女性語言能力的缺乏，想要為自己發聲、爭取應得的公民權幾乎不可能。長期由他人「代言」的情況下，新移民女性很難確立在台灣社會的立場，表達的意見不是沒有人關心就是不被認真看待。也因此無法具備用來建立正向自我認同的主體性，這些因素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都與黑人女性在美國所遇到的問題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與可比較性。

職是之故，如何從 bell hooks 的黑人女性主義理論當中，學習解釋台灣當前新移民女性所遇到的困境，建構適合台灣脈絡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論，並且結合教育場域的教學實踐，讓教育真正具有自我實現的功能，將是未來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的重大目標。因此，研究者擬探討 bell hooks 對於其教育理論如何具體實踐並形成社會行動的觀點，期望能透過深入的分析，為臺灣多元文化教育之實踐的途徑，連結多元文化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提供一些反省思考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探討 bell hooks 的性別與種族理論，以及其如何結合兩者應用於教育理論當中，並且對台灣當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在新移民女性的身份認同的討論與實務的發展提出建議，協助建構符合台灣脈絡的本土多元文化教育理論，並且對於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主體性建立提出可能的方法。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研究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的淵源與發展。

二、分析 bell hooks 教育理論當中性別與種族的交互關係。

三、探討 bell hooks 教育理論對台灣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啟示與應用。

四、對新移民女性在教育當中建立主體性提出可能的方法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主要是為了正確理解理論的真實涵義，首先對理論的基本進行分析、釋義，其次尋找相關概念之間邏輯結構的推演，進而對此理論之思想程序、演繹系統及整體組織形式與內容做全面的分析、解釋與批判。理論分析法的實施步驟分為：一、概念分析，意即分析概念字元意義的內涵與外延所能陳述的範圍；二、結構分析，即根據理論組成因素，將理論體系區分為數個不同的部分，並分別加以闡釋；三、思想程序的分析，根據一定的邏輯推演程序，對理論之思想過程加以分析，以使作者的思想要旨清楚地呈現出來；四、整體特質分析，綜合前面的探討，將理論之思想體系做整體的掌握，並抽繹出其與眾不同的特質，加以解釋評估，以達透徹完整的理解(葉雪梅，1989)。本研究希望藉由探悉 bell hooks 教育學理論的思想內涵，分析其理論內涵以及對其產生影響的相關理論，以探討其形塑過程，並且提出其理論之特殊性及對於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可能的啟示與助益。

貳、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主旨和目的，研究者擬先針對 bell hooks 的學術發展背景進行綜合的鳥瞰,再從性別與種族兩方面探討 bell hooks 教育相關理論的學術淵源與內涵，最後進行綜合分析與討論，並提出研究者之結論。整體而言，本論文預計分為六章，各章之重點與結構關係簡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闡述本論文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問題之重要性與意義，並具體提出研究目的。接著說明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依研究方法所發展的研究架構，最後針對研究相關使用的重要名詞做解釋，並且列出研究範圍與可能的限制。

第二章為 bell hooks 的生平簡介，主要探究影響其理論發展建構至深的家庭成長背景、學術背景和經歷，並闡述其特殊寫作風格與研究範疇，最後介紹其主要教育學理論－交融教育學，包含交融教育學的內涵、在教育實務研究中的應用及限制。

第三章針對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進行闡述與分析，首先簡述美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歷程，並分析 hooks 的黑人女性主義理論之建構源起以及立論基礎，藉由其對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批評與反動，點出理論的特色並闡述其內涵，最後說明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對後世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在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啟示，以及其理論的限制與受到的批評。

第四章則是接續前一章，介紹 bell hooks 的另外一個重要理論根源，即反種族主義理論。hooks 經歷種族隔離教育的實施與廢除，其生命歷程中也處處顯示出種族主義歧視的影響，本章將首先闡述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並指出 hooks 身為一名黑人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對於黑人民權運動中男性威權的批評，最後說明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不同之處，並突顯其將種族與性別交互討論與分析的努力。

第五章的則綜合第三章與第四章的討論，分析 hooks 性別主義理論與反種族主義理論如何產生連結，以及 hooks 是如何交織性別與種族兩個壓迫形式並發展做出抗拒的方法。特別是在 hooks 的教育理論當中，如何突顯種族與性別因素對於教育當中主體性建立的影響，以及在教學場域如何據以作出因應，進一步探討並嘗試分析其理論架構的建立過程。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總結前面討論的結果，對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當中新移民女性的相關研究與實務提出建議。

第四節　文獻探討

在台灣博碩士論文網當中，和新移民女性在台灣所受之教育相關的論文共有26篇，大部分是關於中文學習的過程與影響因素，其中依據探討主題以及研究目的又可再分為學習策略或方案（王淑宜，2013；王麗玲，2012；江芷玲，2008；洪素櫻，2012；高嘉慧，2009；羅雅倫，2009）、學習過程與經驗（王錦迷，2013；丘善美，2008；利百芳，2011；柯妧青，2012；柯妙幸，2012；夏玉華，2008；陳美玲，2006；盧宸緯，2005）、學習動機與成效（王玉秀，2012；吳芳茜，2008；邱瑞紅，2007；張維書，2010；楊盛名，2012；溫漢玉，2010；鄭雅雯，2011）、學習困境與適應（林妗鎂，2006；鄭惠珮，2012；蔡依珍，2012；謝美桃，2007）等。

在學習策略方面，主要以探討各種教學素材或教學方法對於新移民女性中文學習的影響; 學習過程與經驗的部分，則多以國小補校中文班或新移民女性同鄉會的個案研究為主; 學習動機與成效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從影響新移民女性學習中文的動機、持續性以及成果進行分析; 至於學習困境與適應則包括了因為各方面因素造成的困境與解決方法，以及中文學習對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適應之影響。從以上的統整分析可以發現，在台灣，多數關於新移民女性教育相關議題的研究，仍停留在中文學習的方法與策略上，或是中文學習狀況和其母職工作表現之間的關聯，並沒有進一步探討新移民女性作為台灣的雙重弱勢族群如何建立其主體性，或是如何在雙重壓迫的環境底下為自己發聲。

另外，在期刊論文方面，和新移民女性教育相關者則主要分為四個層面，包括探討新移民女性的華語文教學與學習經驗（李明哲，2009；吳芳茜、李麗日，2009；何青蓉, 2004；林翠玲與劉智忠，2009；黃玉幸, 2009；廖湘美與王榮正, 2007；謝美桃、劉由貴，2009），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文化適應與心理輔導策略（王碧霜、黃淑玲，2009；呂靜妮、李怡賢，2009；賴美言，2008；魏麗敏，2011），也從各方面分析新移民女性的教育需求及相關教育政策（何青蓉、丘愛鈴，2009；吳俊緯，2004；李瑛，2004；陳英傑, 2006；張芳全，2009；劉金山、林彩碧，2008；闕河嘉、李欣潔、朱亭亭、呂宜華，2013），以及記錄研究台灣現存的新移民女性團體等（黃力，2007；冬聰凜，2004；夏曉鵑，2003）。

在華語文教學上，學者分析當中的學習困境、難題並試圖提出解決方法，或

是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討論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各種可能。生活與文化適應則是從新移民女性來到異鄉首先必須面對的、生活中的各種文化差異去分析其教育當中可能需要的內容，並且透過敘事文本、心理劇等方式作為自我實現與促進生活適應的輔導。針對新移民女性的教育政策，學者或從文本分析、或透過一些特定的哲學理論探討台灣當前針對新移民女性的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的適當性與意涵。另外，特別的是，許多學者本身參與在一些新移民女性權利團體的發展並為其爭取權益，一邊將團體的發展過程記錄下來寫成研究，提供做未來其他新移民女性團體或是新移民女性教育的建議與參考。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bell hooks 是美國最著名的女權主義理論家之一，其思想對美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她同時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評家、作家和教育家，其著作以對種族、性別、階級和文化的關係分析而聞名。hooks 持續且不遺餘力地批評美國「白人至上的資本主義父權制文化」，以獨特的視角看待美國社會，洞察美國社會和文化的本質。hooks 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研究領域涵括女性主義理論、性別特質、種族主義、教育學理論、大眾文化以及兒童文學。

本研究主題為 hooks 黑人女性主義教育理論的探究及其在多元文化教育上的應用，因此主要參考書籍皆為和其教育理論相關的著作，從 1982 年 bell hooks 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難道我不是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到 2013 年 bell hooks 的最新著作《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這三十年之間和 hooks 的性別、種族理論相關的著作皆列入研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 bell hooks 的教育理論內涵，並且對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發展的提出建議與可能的方向。因著研究方式、研究範圍和研究對象的選擇，有三個主要的研究限制，敘述如下。

一、研究無法涵括 bell hooks 的全部著作：hooks 幾乎是每年至少有一本著作，從

第一本著作至今已經有逾三十多本著作出版，其研究領域也包羅萬象。然而本研究只著重在 hooks 的教育學理論，是以將 hooks 三本教育學理論的相關著作《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1994)、《教育社群(Teaching Community)》(2003)、《教育批判思考(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2010)作為其教育理論探討的核心，其他涉入其性別與種族議題的著作則納入研究討論的範圍，至於其兒童教育文學等著作則不列入研究。

二、台灣與美國社會文化發展脈絡的差異：台灣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承襲自美國，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美國脈絡下產生的 bell hooks 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反思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然而台灣和美國本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國家，在人口組成結構、文化發展與內涵等方面皆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將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論述套用在台灣有其風險，必須經過調整，融入台灣特色與實際，才不至流於理論華麗、實踐卻空虛無物的研究困境。

三、無法確知實際應用的成果：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為理論分析法，分析 bell hooks 理論發展的過程及內涵，探索其理論對於台灣教育可能的價值。然而畢竟不是實徵研究，無法得知研究結果應用在實際教學現場可能產生的效果，只能提出研究者個人的分析與建議，相關實徵研究有待未來的研究進行探討。

第二章　bell hooks 生平與思想介紹

bell hooks 是一位生命和理論相互影響交融的學者，將理論真實的活著，也將生命遭遇體現在理論上。hooks 的寫作正是她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坦率而直接，不屈不撓地渴望被聽見。不同於許多理論家是由他人藉第二手資料對其生平進行描述與記錄，hooks 在發展理論的過程中同時就細細闡述了她的生命故事。本章將從 hooks 對自身成長過程到求學階段並且進入學術界的敘述，整理出其理論發展的背景脈絡，以及這樣的背景如何造就她成為今日這樣一位黑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寫作出二十世紀末至今影響深遠的解放教育學理論。

第一節 家庭成長階段的影響

壹、成長背景即理論根源

1952 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名 Gloria Jean Watkins 的 bell hooks 出生並成長在肯塔基州的種族隔離小鎮 Hopkinsville，她在一個貧窮的非裔美國勞工階層家庭中成長，家裡有六名兄弟姊妹，父親是一名工友，母親在白人家裡做傭人。自小在全為黑人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成長於種族隔離的南方小鎮讓 hooks 自小即發展出抗拒種族主義的意識，包含家庭與鄰近地區的生活經歷也讓她產生對身為女性的角色的正面與負面印象，並形塑了她的女性主義意識。

一、抗拒種族主義意識

生長在美國南方的生命經驗是影響 hooks 種族主義理論重要的根源，雖然建國立基於「人人生而平等」此一人權概念，美國在教育機會均等概念上比諸其他西方文明國家發展較晚，其問題源自種族隔離根深蒂固的影響。1896 年，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支持南方諸州的「隔離但均等」(separate but equal)措施之後，種族間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日漸被突顯。而在 1954 年的「布朗控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最高法院判決種族隔離政策違憲，並於隔年要求各州執行，在美國的黑人教育史上是決定性的一頁。然而所謂的「取消種族隔離」，實際施行卻因為沒有適當的措施加上白人的抵制而成效不如預期。此外，美國最高法院並未直接引用學校教育的效果作為衡量不均等的規準，而是採用「種

族整合」的規準，也就是重在種族融合的人數與程度，而不在種族融合之後的教育成效。因此，種族整合的規準似乎蓋過學校教育效果的概念（屈書杰，2004）。

hooks 在她的教育著作《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Teaching to Transgress :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中曾經敘述種族融合政策對其教育經驗的影響。就讀於公立黑人學校時，學校是 hooks 的避風港。上學是一件充滿愉悅的事，在家庭中 hooks 被期望安靜溫婉，在長輩的眼裡 hooks 只是一個不起眼而古怪的小女孩，聽話就是最大的美德；而在學校卻是交與這樣一個小女孩和家庭信念相反的價值觀，在這裡 hooks 可以不只是那個愛哭的 Gloria，在這裡，hooks 可以透過理想重新形塑自我。黑人學校帶給學生的不只是課堂知識，而是親身實踐一場反殖民的革命教育。在 Booker T. Washington 學校，黑人小孩被認為是特殊的、是充滿天賦與潛能的，並且得到特別的關注。教師「了解」學生－這樣的了解含括了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生活環境以及家人對待他們的方式，並且站在學生的身邊，為學生努力，期望他們能夠成為知識份子，提升族群的地位。

而種族融合政策卻讓一切改觀。hooks 回憶在政策倉促且未經妥善安排的執行下，少數黑人學生被迫每天多花費數小時到遙遠的白人學校上課。在這裡，黑人學生總是被視為外來者，在白人教師的教導之下，更加強了種族主義的印象。hooks 是這樣描述的：「知識突然簡化成資訊，與個人的生活經驗與處事方法無關。也不再與反種族歧視的鬥爭連結。…我們知道別人希望我們學習服從，而非求知的欲望。我們過度積極地投入學習反而會被視為是對白人權威的威脅(hooks, 1994a)。」

學校不再是實踐自由的場域，但學校仍是政治性的，因為黑人學生必須不斷對抗白人的種族歧視。hooks 對於必須肩負起實現反種族隔離的責任感到憤怒，他們必須放棄熟悉的世界，進入冷淡且陌生、不屬於他們的世界；而 hooks 同時也為作為社會秩序的威脅者感到驕傲，以願意跨越規範、具有抗拒的勇氣為榮。

二、發展女性主義意識

在 hooks 的自傳性寫作中，經常提及她的家庭對其性別意識的影響(hooks, 1989, 1990, 1992)。hooks 自述自己擁有充滿痛苦的童年，在家裡被視為不同且怪異，所以總是受到情緒上的虐待，偶爾也被鞭打。對於自己是一個女孩，以及作為女孩的獨特性別角色，hooks 自幼就從生活中清楚地發展出對性別主義的意識，她知道女孩被賦予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建構的。「我不記

得第一次聽到女性主義者這個詞,但我知道自己是從童年時期開始思考性別角色,從那時候開始我知道並感覺到被塑造為女性的經驗和被塑造為男性的經驗不一樣(hooks, 1989)。」

面對家庭養育她的方式並且期望她達成的女性角色，hooks 痛苦而堅持地提出質疑、挑戰長輩「理所當然」的父權制思想。hooks 認為自己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開始接觸理論，即便幼年時期的她並沒有辦法描述自己從事的思維與批判就是理論化的過程，但她確實將自身經驗理論化了。如同她在 homegrown 一書中提到的:「有的人說是當代女性主義讓我成為現在這樣的人，但實際上是因為我自己拒絕接受父權制的『表現得像一個女孩一樣』的要求 (hooks & Mesa-Bains, 2006)。」

在教育機會這一層面，hooks 也深刻感受到性別主義的壓迫。在前往 Stanford 大學就讀之前，hooks 只是一個來自南方勞工階級家庭的黑人女孩，離開肯塔基的小鎮前往 Stanford 是可怕並且極度痛苦的。她的父母親並沒有對於她被允許入學感到高興，甚至反對她離家如此遠的距離。就像許多勞工階級家庭一樣，父母親害怕大學教育可能對他們的子女造成的影響，即便他們清楚理解大學教育的重要性。他們不情願地支持她的學業投入，同時也持續以嚴厲的批評來反對。面對家人的質疑與否定，hooks 努力用更好的表現來證明自己，在實踐中，hooks 展開了女性主義的抗拒。「我的父親告訴我們，太多的教育會讓女性沒有吸引力。…很多時候我被父親責打就是因為我的固執己見，當我了解到必須去抗拒這樣的支配時，我的女性主義抗拒就開始了(hooks & Mesa-Bains, 2006)。」

貳、使用假名的涵義

在 hooks 的寫作過程中，經常要面對關於她的名字的疑問。本名 Gloria Jean Watkins 的 bell hooks，從十九歲寫作第一本著作《難道我不是一個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Ain't I a Woman :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開始一直是使用假名來發表作品的。關於使用假名的原因，bell hooks 曾經在〈to Gloria : who is using a pseudonym〉一文中詳細地解釋。

> *bell hooks 這個名字來自我的外曾祖母，一開始是我要在社區發表一本詩集，卻有一個參加者和我同名，我輕易的就決定了要取假名，因為我從來都不是很喜歡 Gloria 這個名字。…我害怕這個名字所代表*

的含意會掩蓋我這個人，害怕在我還沒取得真正想要的認同之前就成為我的認同。我很高興有使用其他名字的機會。…我選擇 bell hooks 這個名字是因為它有一種有力的聲音，這個名字代表著一個堅強的女人，一個真誠面對自己所說的話的女人，一個在這個世界活出自己的生活的女人。(hooks, 1989：160)

假名對 bell hooks 而言是具有療癒效果的，透過使用 bell hooks 這個名字，hooks 取得了身分認同，擁有了發言的權力。Gloria 這個名字是家庭所給予的，乘載著家庭所賦予的期望。一個叫做 Gloria 的女孩可能會是一個甜美的南方女孩，安靜、順從、討喜，卻無法成為具有反抗力量的狂野的聲音。選擇假名來寫作對 hooks 而言就是展現一種反抗的姿態，是一種賦權策略的一部分，放棄 Gloria 這個名字，將她還給那些創造她的人，因此能夠創造並找到自己的聲音和身分。

使用假名時時刻刻提醒 hooks，寫作個人的想法是自我的一種表達，但並不是全部。hooks 不想要過度認同這些想法，甚至讓人不願意改變這些想法或接受其他想法。hooks 特別點出，過度認同正是當代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問題，對個人特質(personality)的盲目崇拜嚴重地限制了女性主義運動，就像我們似乎經常更投入在說話的那個人，而非那個人到底說了些什麼。在女性主義思想家中，許多人抗拒去改變對於白人女性經驗的觀點，就是出於過度認同。過度認同讓人將想法視為所有物，是能夠擁有的、能夠控制的，不惜任何代價都要維持。

持續地意識到作者在寫作中並不是在創造認同而是在分享想法，對 hooks 的智識成長非常重要。藉由使用假名，hooks 有意識地試圖區隔想法(ideas)和認同(identity)，使自己能夠接受挑戰和改變。hooks 想要創造一個作品，在個人特質、說話者的認同和被說出的話語之間隔出距離；而既然 bell hooks 是一個不知名的作家和思想家，讀者就不會直接去設想她的個人特質。hooks 也觀察了使用假名寫作實際造成的影響，發現並沒有完全如同她所預期的使讀者不去注意作者的認同和個人特質，然而這麼做確實使讀者注意到作者、認同和文本本身之間的關係，並且提供讀者不一樣的思考角度。

參、自傳體的寫作風格

對我而言，訴說我成長的故事和殺死過去的自己的渴望親密地連結，

卻又不用真正地殺死自己就能做到。我用寫作殺死那樣的自我。一旦那樣的自我離開了，我就真的是那個屬於自己的自己了。我想要擺脫的，就是那個 Gloria Jean，那個總是被懲罰、被羞辱、總是在哭、被認為因為太瘋狂最後一定會進入精神病院的女孩。藉由寫作自傳，我不只是擺脫了這個 Gloria，更擺脫了那個一直糾纏著我的自己，那個讓我無法更靠近當下的自己。(hooks, 1989：156)

hooks 不只是自己寫作，也鼓勵人們寫作。她相信將個人真實經驗理論化，在根本上連結到自我修復和集體解放的過程(hooks, 1996)。hooks 尤其在建構其黑人女性主義時，強調黑人女性的獨特生活經驗能夠形塑出反霸權的意識，使黑人女性的世界不同於那些擁有特權的人(hooks, 1984)。hooks 引述 Adrienne Rich 的話：「這是壓迫者的語言，但我必須和你對話。」受壓迫者、邊緣族群必須學習壓迫者的語言才能和壓迫者對話進而做出抗拒，然而更重要的是，受壓迫者必須創造出一種新的語言、做出對立的論述、發出解放的聲音。

語言是鬥爭的場域，如同 Paulo 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中所說：「我們不能夠以客體進入鬥爭只是為了成為主體。」受壓迫者要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經歷，作為主體進行自我恢復(self-recovery)。自傳體的寫作對 hooks 而言是一種療癒過程，喚起成長在南方種族隔離的社區中的特殊經驗，是一種重新補捉南方黑人文化豐富色彩的方式。hooks 認為，記得並保存這些經驗對她尤其重要，因為在之後大部分的時間裡她都生活在白人占多數的社區並在白人為主的大學教書。寫作自傳使 hooks 不得不是面對身為黑人女性的現實，以及那些被否認並掩埋的歷史。

藉由回憶自己的南方成長過程，hooks 學到理解自我的方法。自我存在於關係當中，其真正的存在依賴於每一個人的生活與經驗，自我不是一個「我(self)」的示意物，而是許多「我」聚集在一起，自我作為過去與現在、家庭與社群集體之現實的體現。在關係中自我的社會建立意味著我們會知道在我們之間說、並且對著我們說的那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我們會和自己的歷史產生關聯；然而，也就是這樣的聲音，在我們受到支配時是被靜音的(silenced)、被壓迫的。支配和殖民企圖破壞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而當我們尋求自我復原、努力將存在的碎片拼湊在一起、努力復原自己的歷史，就是在抗拒這樣的侵犯(violation)與非人化(dehumanization)(hooks, 1989)。

自傳體寫作讓 hooks 創造了一個重新憶起而重生的自我，如同 Audre Lorde 所言「宣稱擁有成為其所選擇成為之人的權力。(1984：173)」hooks 重新取得控制自身主體性與認同的權力，重新拼湊破碎的生命成為一個解放的完整生命歷程。在〈writing autobiography〉一文最後 hooks 有了這樣的醒悟：「最終我並沒有感覺我殺了那個 Gloria，反而是拯救了她。她不再是我裡面的敵人，不再是必須消去那個女孩才能讓現在這個女人真實存在。在寫作這個女孩的過程中，我重新取得了那個我很久以前就拒絕的自己。記憶是重聚循環的一部分，將碎片拼湊起來。敘述，讓破碎的心重新完整。(hooks, 1989：159)」

第二節　學習階段與學術生涯的影響

壹、學習階段的影響

hooks 從小一直夢想成為一名作家，她熱愛詩，家家戶戶的書架上都有的白人作家的詩集，或是必須到處尋找借閱才能找到的黑人作家的詩集。對 hooks 而言，詩是秘密聲音存在的地方，那些不能直說的話，那些無以名狀的感受，都可以付諸於詩的語言。進到大學，hooks 開始認識到聲音作為具體化作家之特殊表達的概念，聲音不再只是聲音，聲音被和認同連結。

一、白人男性學術霸權

hooks 曾就讀過四所大學，包括史丹佛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南加州大學和加州大學 San Cruz 分校，而她從來沒有在其中任何一所學校遇過黑人女教師。hooks(1989)回憶起自己曾經在史丹佛大學和南加大有機會遇到兩位黑人男教授並且向他們學習，雖然他們都不願意支持或鼓勵黑人女性學生，但除去他們的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不論，hooks 仍對他們非常感謝，因為他們證明了黑人學者也能教文學，黑人學者也能在英文系任教。不論是否出於個人意願，他們仍提供了一種支持和肯定，對抗許多白人教授強烈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

那些清楚表明自己的課堂不歡迎黑人學生的教授並沒有直接說出種族歧視的言論，而是透過各種隱而不宣的方式表現，像是在點名時跳過黑人學生的名字、眼神不看向黑人學生、在黑人學生說話時假裝沒聽見、有些時候甚至是完全性的忽略。hooks 清楚記得自己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狀況，她感到非常疑惑而害怕，包

括她自己和其他白人同學都很清楚，這名白人教授的侵略性的對待是針對她而來的。其他同學都告訴 hooks 她不可能通過這門課，但卻從來沒有人沒有說出可能是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造成這樣不平的對待。

升上研究所，hooks 越來越難避開種族歧視的課，而雖然她可以說出這樣的問題並且對抗這樣的人，她的言論卻很少被嚴肅地看待。個別的白人教授有白人極權的機構所支持，有同樣種族歧視的同事支持，還有讓教授的話語能夠支配學生的這種階級制度支持。許多時候 hooks 在私底下向其他教授訴說這樣的種族歧視情形，換來的卻是驚訝與不相信。他們傾聽只是因為聽學生說話是他們的職業責任，但他們拒絕相信也拒絕負擔起白人種族主義的責任，讓他們根本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動，高等教育殿堂裡的歧視也。

二、抗拒與堅持

hooks 的研究興趣從早期美國文學轉向現代和當代美國文學，這樣的轉變主要是源起於一個白人男性美國文學教授，在這堂課中學生飽受性別與種族歧視的嘲諷。當 hooks 向教授提出他的態度問題，得到的回應卻是她並不是念研究所的材料，並告訴她應該要退學。隨著時間過去，hooks 變得越來越沮喪，她甚至開始夢到自己帶著上膛的槍走進教授辦公室，要求教授傾聽，要他感受這樣的恐懼和羞辱。當這樣的夢持續出現，甚至成為清醒時的幻想，hooks 就知道是時候從研究所離開好好休息了。hooks 感覺到教授對她擁有太多支配的權力，而她必須把教授從她身上奪去的自我意識重新找回。因著這樣的意念 hooks 重新回到研究所，甚至回到那一名美國文學教授的課堂上。

在抗拒的過程中，hooks 經常從白人同學那裡得到要求她不要質疑、挑戰或抗拒的建議。這些白人同學對支配的容忍程度似乎比她高得多，而經過批判地反思彼此之間的相異之處，hooks 發現這些白人同學都來自優勢階級背景，被要求服從並不會影響他們的自我價值認同。然而，來自劣勢背景的學生能夠來到研究所這一階段，是經過了無數次的鬥爭，擊退那些試圖讓他們相信自己做不到的想法。優勢的白人學生在校外的生活不需要面對任何的貶低或羞辱，他們只要撐過某些形式的支配，接受它作為開啟未來的過程，最終就能夠掌握支配的權力。

三、高等教育中黑人女性的經驗共享

除了嚴重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更是讓學術場域失去實踐自由的初衷。hooks 比較學術界的黑人男性與黑人女性經歷，同樣作為學術領域的邊緣族群，黑人女

性因為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結合力量而受到更大的壓迫。大多數時候，黑人男性較容易在文學系研究所取得成功，許多白人學者可能注意到黑人男性知識分子傳統，卻幾乎不知道任何黑人女性知識份子。就像在白人學術傳統中一樣，非裔美籍知識分子傳統也是男性支配的架構。

畢業多年後，hooks 持續和身處文學研究領域的黑人女性談論這個問題，發現很多情況並沒有改變，黑人女性仍然在學術場域感受強烈的孤立與孤寂感。這也就是為什麼 hooks 一直強調高等教育中的黑人女性應該寫作並且談論自身的經驗，以及分享如何生存的方式。hooks 希望讓擁有同樣遭遇的人知道，她們並不孤單，她們遭遇的問題和阻礙都真實存在，這些感受很傷人，但並非無法克服。也許這樣的話語能夠帶來安慰，能夠加深她們的勇氣，更新她們的靈魂(hooks, 1989)。

貳、學術生涯的影響

hooks 在教室中的教學是和她的理論密不可分的，在課堂中 hooks 應用理論進行教學，在發展理論時也提出自己的教學經驗作為實例，可以說是理論和實踐相互作用的最佳範例。

一、「激進」聲音的必要性

談論到自己的黑人學者身份，hooks 強調黑人知識分子雖然不需要每天面對恐怖的種族歧視和剝削，這些遭遇在過去正是提醒黑人族群結束種族歧視的鬥爭不能停止，然而黑人學者的命運也是和世界上所有受壓迫的黑人的命運親密地連結在一起的。許多黑人知識分子因為脫離了這樣的日夜壓迫，對於那些投身於轉化社會的黑人教育家所建立的激進傳統變得漠不關心。hooks 認為自己身為學者與教師最重視的是教育作為自由的實踐，解放的教育學根源於對政治現實的意識，並且使人不得不去辨識高等教育機構為各種形式的支配服務的架構方式，迫使人去面對教育並不是一個中立的過程的事實。

很多時候，投入在實現教育自由願景的學者卻最不願意承認教育不是中立的過程。學術自由被用來使注意力轉移，不去探討知識是如何被使用以加強和滲透支配。當這樣的狀況發生時，學術自由的概念就失去其意義與完整性。hooks 強調這樣的議題對於黑人學者來說特別相關，黑人學者經常被誘使產生錯誤的假定，認為學術自由的目的能夠藉由政治中立性的形式最好的展現出來。因著這樣的假

定，許多學者認為他們應該避免引起人們對種族歸屬或種族主義的注意，並且認為他們應該展現出不在乎種族的態度。然而，hooks 斷言這麼做並不是在促進學術自由，反而協助建構了一個種族主義的白人男性表現基準的社會現實。黑人學者應該負起對自己身屬黑人族群以及所處學術社群整體的責任，建構並且維持學術和社會的空間，在當中促進教育作為自由的實踐此一概念。

二、學術場域中的「權威聲音」議題

hooks 的研究大多圍繞在邊緣族群的受壓迫與抗拒，也強調寫作作為發聲方式的重要性。她經常批評學術著作中仍充滿權力支配關係，讓學術界無法成為實踐自由的場域。hooks(1989)舉自己在教授女性與種族課程時和學生的討論為例，關於白人女性是否應該寫作談論黑人女性生活經驗的著作。部分學生認為寫作什麼內容是個人的權力，也有部分學生認為白人女性當然不能夠寫作關於非白人女性的作品。在學術界，所有的邊緣族群，包括白人女性、非白人女性、黑人族群、同志族群等，曾經在某段時間裡他們的經驗是只被白人男性研究、詮釋與寫作的。即便這些所謂的「權威(authorities)」是較進步的、是充滿關愛的、並且在各方面都是值得信賴的，只要這樣的權威是建立在所談論的族群經驗中個體聲音的消失或減弱，這種主體－客體的二分就維持了，也加重了架構中的支配。

寫作和自己不同的族群之文化與生命經驗，當爭議的議題是誰將會被認為是更具「權威」的聲音時，就變得充滿政治性。以女性主義理論為例，白人女性並不會鼓勵白人男性在創造女性主義理論與學說當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即便很明顯地許多白人男性學者擁有更多經驗與聲望，女性主義學者仍判斷性別主義偏見可能限制了他們創造出來的著作形式，或者他們的男性氣質可能阻礙他們的理解。hooks 批評到，白人女性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輕易地看見白人男性作為權威聲音的問題，卻看不見白人族群寫作非白人族群時可能帶來的問題，這是女性主義理論中很大的盲點。

當然，這並不代表寫作非屬自身族群經驗的學術著作就是沒有價值的，而是意味著這樣的著作不應被視為「絕對」，而這樣的學者也不應該是「最重要」的聲音。hooks 強調，研究其他族群絕對有助於彼此之間的了解，以及去除種族主義和挑戰支配結構，只是在過程中必須非常清楚自己寫作這個族群的原因，並仔細檢視自身的觀點是否反映出種族偏見的問題。

三、「越界」的理論

女性主義理論的學術生產，是在一個階層化的環境裡被闡述。支配階級制定了一套評斷何為理論的標準，使得不夠理論化或是傾向於親近廣大讀者的手法寫作的作品，在學術領域通常不具有合法性與正統性。理論變成工具性的作用，利用理論為思想建立不必要的、競爭性的階級制度；透過將作品區分階級，進一步強化了支配的權力架構。學術理論被期待高度抽象化，充滿難懂的術語，然而在學術領域之外的地方，這些理論被視為無用而保守，無法在社會上共享並且具有非常低的能見度。hooks 認為，這樣的理論或許能夠迎合父權制的眼光，卻也被用來在女性族群中進行分裂、切割與疏離，侵蝕並破壞了女性主義運動。

hooks 對理論的批評並不是希望揚棄理論，相反地，理論是邊緣族群進行鬥爭時必須具備的要素。貶損理論、反智以及繼續保持沉默是一種共謀的行為，讓邊緣族群相信無須理論也可以進行解放的鬥爭。因為理論具有力量，當支配階級建構一套理論代表邊緣族群「發聲」，並且利用理論來彰顯自身的權威，使其成為只有少數人能夠進入的批判場域時，若是以宣稱理論不具有任何價值的反智理論作為回應，就造成了溝通的斷裂，抗拒也無從著力。

理論是必要的，hooks 建議應該積極關注創造促進鬥爭運動的理論之重要性，並且讚揚及珍視用口述或書寫方式分享的理論。hooks 強調必須與人分享理論，盡力創造理論，促進人人都願意參與的女性主義運動。將經驗理論化並不容易，因為這必須說出個人的痛苦，勇敢地揭露傷口，並且提供自己的經驗去做分享與指引。這樣的行為是解放性的，不僅回憶並找回自己，更重新承諾了一種更積極、更具包容力的女性主義鬥爭。而身為女性主義理論思想家與運動家，學者們應該集體地尋找一個讓女性主義理論發生的方式，以及創造讓這樣的發生成為可能的場域。要達到這樣的目的，hooks 建議回到起始點，回到女性主義萌芽的開端。像孩子一樣，單純地分享並實踐生命經驗。(hooks, 1984；1989)

第三節　hooks 的研究範疇

hooks 的著作讓我們能夠一窺她的人格特質：充滿智慧、直接、觀點上的女性主義者、言辭激進、具教育性、熱情、強調參與。hooks 以其直率的社會與文化批評而聞名，主要關注焦點在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壓迫現象。她將過去只被制限於學術界與菁英圈的議題帶到大眾之間，意圖引起一般民眾的注目

與討論。hooks 的研究皆圍繞著自身的生命經驗進行，從未停止地心繫著自己身為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黑人女性知識份子的使命，認為自己和自身身分認同的社群的命運緊密相連。隨著生命經歷中出現的遭遇與轉變，hooks 產生不同的體悟，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和不同領域對話，也和自己對話。根據 Florence(1998)、Jaramillo & McLaren(2009)、Cheng(1997)和沈睿（2008）對於 hooks 著作的描述與分析，整理其學術生涯中的主要研究範疇。

一、性別主義壓迫無所不在

從第一本著作《Ain't I a Woman》開始，hooks 開始了一段長達數十年的關於帝國主義、父權體制和性別主義的分析。hooks 仔細描述了在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產生制度化的支配與壓迫的美國南方，黑人女性與男性是如何被剝削，並且讓人們注意到白人和黑人男性同樣參與在貶低黑人女性存在價值的性別政治當中。在教化的觀點上，hooks 遵循 Freire 壓迫者/受壓迫者的辯證法，並將其應用在解釋黑人社群中的父權制文化。

hooks 認為，主人－奴隸的辯證顯示在家庭領域，家庭不是一個封閉體系，當中的男性和女性是在更大的種族主義－資本主義族群政治之下調和他們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男性所享有的支配權力並非優勢的資產階級白人男性所獨有，而是普遍存在於各種族群與階級的男女關係架構當中。hooks 把男性特權視為資本主義關係整體裡的種族與階級政治病徵，應該被根除。但是必須強調的是，hooks 並沒有把消滅性別主義置於其理論的核心，而是將性別主義壓迫視為「為了消除所有形式壓迫的鬥爭當中重要的一步(hooks, 1982：37)。」簡單來說，對 hooks 而言，種族主義、階級剝削和性別主義是相互構成的，但單單消除其中任何一種「主義」並不足以解決其他兩者的矛盾。

二、邁向女性主義的實踐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最終目的仍是在消除所有形式的壓迫，而光是將女性主義的對話侷限在家庭或社群並不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因此，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也逐漸朝向以女性主義的實踐為核心。hooks 主張，女性主義的實踐不能排除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setting)外發生的事，必須和生命歷史與經驗有所連結。hooks 的女性主義實踐要求自我根本上的轉化，一種受壓迫者/壓迫者關係的超越。近似於 Freire 強調建立教育情境讓對話、批判意識與有意義的實際行動能

夠發生的過程。

hooks 也提倡一種透過「相對的世界觀」、讀寫能力和批判意識來尋求自我恢復(self-recovery)的女性主義實踐，而這也就轉而發展成一種改革的女性主義教育學。對 hooks 來說，整體是從抗拒的邊緣中顯現，邊緣是語言能夠被發展用來抗拒支配與霸權力量的地方，在當中抗拒的文化能夠形成多元文化創造以及不同認識論存在的空間。在教育意義上，邊緣創造了產生相對論述的教育情境，在抗拒支配與剝削的過程中，不同方式的思考、閱讀、寫作、存在皆能逐步發展。

三、種族與性別當中的階級壓迫

在中期的著作《Where We Stand：Class Matters》當中，hooks 以階級作為檢視美國階層制關係的出發點。她描述了在社會關係被從純粹的「性別」或「種族」角度檢視時經常會發生的錯誤評估，強調若沒有批判地檢視階級的問題，就無法有意義地談論種族主義或是性別主義。hooks 非常認真看待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支配意識型態以及媒體所造成的影響，並提倡嚴厲批評將物質消費視為認同形塑與階級定位的基準之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

hooks 也將其對階級的批評應用在黑人社群的分析中，寫到：「種族提升的邏輯，意味著在階級制底層的黑人應該尊敬並欣賞那些階級有所提升的同胞，…以階級為基礎的種族整合影響了過去使黑人族群團結在一起的種族凝聚力。具優勢者開始將處於劣勢者拋在後面不管了(hooks, 2000：90)。」此外，hooks 根據觀察，認為階級在美國鮮少被談論甚至提及，尤其在教育場域中人們更不願提及階級差異的事實。因為大多數人進到教室裡都帶有一種預設，認為教育是打破階級差異的最大動力，並且相信教育讓人們攀升到社會階級頂峰的機會必定是平等的。不論這樣的預設看似多麼無懈可擊，階級差異仍然存在，因此引起人們對階級背景的重視是教育學方法當中不可或缺的任務。

四、媒體中的黑人形象

bell hooks 重視媒體作為傳遞資訊媒介的力量，對文學、藝術、影視中再現的黑人形象進行研究和批判。hooks 的文化批評視角總是激起讀者對理所當然的文化現象有新的感覺，迫使他們正視過去沒有正視的問題，而且試圖為建設黑人文化提出建議。hooks 的文化、藝術及影視評論大都是對大眾流行文化、精英文化或電影電視中的黑人形象的反思，揭示這些形象中的種族、階級和性別的關係，

以及這些關係是如何被制造出來、又被觀眾所接受的。她向我們的藝術概念挑戰，擴展我們對藝術的感覺和思考。hooks 的評論對象中制作者大部分都是黑人藝術家，其評論不是批評亦非讚揚，而是分析和闡釋。她從不逼迫讀者接受任何想法，也不刻意創造所謂的「正確的」形象，而是以自身細膩的感知，分析並揭露已存在但未受到注意的事實。hooks 謹守自己身為社會學知識份子的角色，激進但不誇大，在文化評論當中尤其如此。

五、以愛為本的轉化

hooks 是少數真正了解且實踐 Paulo Freire 的轉變理論的學者，對 Freire 而言，一個個體的最終職責就是變的更加人性化(human)。許多關於轉變的理論目標都是批判意識的發展，但是一個常見的問題是這些自由理論家一方面要求人性的轉變，另一方面自己卻又成為壓迫者。hooks 理論的成熟與獨特性展現在她的包容性、知識的完整性、情感上的誠實以及充滿字裡行間的愛。hooks 批判社會當中所有的壓迫現象，但她並不會讓讀者停留在絕望或憤怒的「被害者」狀態，而是最終仍要回歸到「愛」。hooks(1995)認為，憤怒是對於不公義之事很好的回應，但憤怒應該經過處理而具有建設性。愛自己所建立的認同，而非別人希望自己建立的認同。hooks 提出以愛作為堅強有力的出發點，在當中對抗並且轉化美國社會中固有的不平等的物質情況。愛變成同時是道德的和政治的基礎，其對於創造政治同盟以及生命認同與人類社群是不可或缺的存在。hooks 後期出版許多童書,正是圍繞著以愛建立認同的論點而寫作的教室與生活中的轉變理論。

hooks 自身的生命經驗和尋求打破社會批評的常規傳統的女性主義寫作相符，是一種將知識導向集體理解與實踐的形式。hooks 的特殊身分與經歷相當程度地架構出她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教育學方法，相對地，其理論也充分反應出她的個人生命經驗歷程，兩者之間的關係如樹的根盤根錯節，密不可分，必須交錯檢視與探討，才可能真正了解 bell hooks 這個學者及其理論。

第四節　本章小結

hooks 的成長過程中經歷了種族隔離與種族融合政策，深刻體會學校教育對學生的影響，在後來的高等教育階段更是因為她的黑人女性身分備受歧視與壓迫，這些經驗形塑了 hooks 的種族主義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hooks 的研究範疇從描

述性別主義壓迫現象開始，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為核心，發展出其女性主義理論。hooks 特別強調黑人特質，作為邊緣族群如何鬥爭取得權力。hooks 和其他自由理論家最大的不同是以「愛」為起點，最終仍回到「愛」的關係的認同追尋過程。總括來說，hooks 雖是一名黑人女性主義學者，其理論卻同時強調族群、性別與階級對人的個人認同之影響，認為鬥爭的最終目的是達到所有形式壓迫的解放。

hooks 從她的女性主義理論與種族主義理論當中發展出「交融教育學」，交融教育學承襲 Freire 的希望教育學，是一種全人教育，認為教育是賦予受壓迫者權力與希望的過程，強調知識學習當中理論與實踐的聯結。hooks 的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對話，透過對話讓多元觀點、多元聲音的存在成為可能，因為能夠發聲，也能夠被聽見，所有個體都有施展權力的空間。以學習社群的方式打破傳統階層制的、僵固的教學，學生與教師透過交融教育學最終能夠達到真正的自我實現，在當中所有個體都成為主體，教育即自由的實踐。

第三章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

bell hooks 自詡為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成長於黑人民權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皆蓬勃發展的時代，hooks 一直將她的這兩個身分緊密連結。她是一個鬥士，為黑人也為女性發聲。hooks 延續了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脈絡，並且藉由自述、反思與批判描繪出全新的理論發展藍圖，揭開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的理論新頁。本論文將闡述女性主義理論發展過程和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架構之間的關係，並且整理 hooks 的理論對其後女性主義與教育理論發展的影響。

第一節　女性主義的發展

女性主義的發展從十八世紀開始至今，隨著時代背景更迭也不斷地在進行革新與轉化，女性在發聲，女性也在尋求對話的空間與對象－女性和男性對話，女性和女性對話，性別和種族的對話，性別和階級的對話，性別理論和性別實踐的對話－在持續的對話當中女性主義理論羽翼漸豐，呈現多元色彩的風貌。大致上，女性主義理論一般以立論基礎與目標分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文化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與生態女性主義(顧燕翎，2000；鮑曉蘭，1995；Abbott, Wallace & Tyler, 2005；Donovan, 2000；Tong, 1989)。本論文為探討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建構，只列入對 bell hooks 之理論有影響與交互作用的女性主義理論流派做闡述與討論。

壹、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最早的女性主義起源於十八世紀末的啟蒙時代思想，當時的思想家急於為世界制定一套新秩序，讓封建制度瓦解之後分崩離析的世界重新恢復井然有序的樣貌。牛頓於 1687 年出版的《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成為啟蒙時代世界的基本樣式。牛頓的學說－即自然界的運行遵循幾條簡單的、合理的規律－在啟蒙時代作為解釋一切事物的重要隱喻。自由主義認為人的共通本質是理性，這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之處(Donovan, 2000)。政治哲學家以此為依據，進一步發展了挑戰君權神授觀念最重要的道德思想之一：人類每一個個體都擁有與生俱來的、「天賦的」權利。因為人人都擁有理性，人人就都能夠自主，為自己下決定，決定自己的生存目標。

女性主義沿襲自由主義的概念，將天賦人權的概念推展到女性身上，也就是今日所稱的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有幾個要點：首先女性是人，同樣具有理性；也就是說，女性同樣具有所有人類的共通本質，應該先被看作「人」，再來才是「女人」。理性作為當時代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女性主義必須先宣稱女性具有理性，才可能進一步要求平等權利。再者，女性主義認為女性也擁有自我實現的天賦人權，女性是為自己而存在的，而非其他社會所賦予的女性角色。女性必須獨立自主，在概念上是個人主義的(Donovan, 2000；Tong, 1989)。從天賦人權的概念中可以看出，這裡所指的權利是強調個體在公共領域上競爭的權利，也因此十分看重個體參與公共生活的相對責任。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強調女性的不平等地位，源自於女性參與公共領域時面對的人為限制，因此，在公民身分上達到和男性一樣的平等地位也是運動的重要目標(Abbott, Wallace & Tyler, 2005)。

以啟蒙時代高舉理性的社會氛圍為背景，女性主義開始成為一家之言，以 1792 年英國作家 Mary Wollstonecraft 完成了第一部重要女性主義理論著作《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為始。Wollstonecraft 主張女性和男性同樣擁有理性，若是在當時的現況上女性顯得較無理性，那是因為女性被剝奪了受教的權利與發展機會。她認為女性應該要獨立自主，卻並不特別支持女性參與公共事務，而是強調在法律地位與經濟地位上的男女平等。對 Wollstonecraft 而言，女性存在的目的是努力成為理性的人，將女性從為男性服務的角色中解放出來，成為和男性精神上和智識上平等的伴侶。可以說這個時期的女性主義雖然強調女性獨立自主，卻仍未脫女性在家庭中作為母親與妻子的假定（顧燕翎，2000）。

十八世紀的女性主義者深深感受到整個西方社會瀰漫的革命熱潮，並且在當中尋找女性的位置，也逐漸將關於女性權利從和男性的平等關係發展到女性自身對社會的參與，關注焦點也從女性相關議題轉變為具組織的社會運動。在美國本土所有正式的運動之前，新英格蘭教派其實扮演了女性主義的重要推手，1840 年一群教派婦女前往英國參加世界反奴隸大會，受到了活動中其他男性的嘲弄語辱罵，這個經歷促使她們於 1848 年在紐約舉辦首次女性大會 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在會中，由美國女性主義者 Elizabeth Cady Stanton 為首發表了《觀點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這份文件幾乎逐字逐句地模仿《美國獨立宣言》，強調將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改為男女生而平等，使獨立宣言中的公眾事務觀點在女性身上呈現出嶄新的意義，是首次出現直接針對將「天賦人權」還給女

性的呼求(Donovan, 2000)。

獨立宣言表達的是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觀點宣言同樣也是對政府不滿，只是主角換成了女性，並且亟欲推翻的專制君主也不是「大英帝國當前的國王」而是「男性」。藉由引用獨立宣言的內容，表達了女性的天賦人權就是對公眾事務擁有發言權，政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來自於被統治者，應該保障所有被統治者表達意見的權利；而被統治者包含了男性和女性，若是將女性排除在外，就是對於天賦人權直接的違背(Donovan, 2000)。觀點宣言的論點超越了先前只是爭取女性和男性平權的要求，進一步提出了對於作為一個階級或一個群體的女性的壓迫是男性的一種蓄意而為的普遍行為，這樣的觀點影響並激發了二十世紀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訴求的開端。

貳、文化女性主義

十八至十九世紀啟蒙時期的女性主義仍深刻影響之後的女性主義理論與社會，不過在十九世紀的女性主義理論當中，有一部分應該被歸入文化女性主義的類別，因為這一類的理論已經超越理性主義者攻擊的範圍，比起要求政治權利的變化，這一類的女性主義理論更期待廣闊的文化革新。她們注重的不是男女的相似性而是差異性，並且強調女性特質的優越性。文化女性主義理論中隱含著母權制社會的幻想，一個以女性價值觀和女性所關注的事物為準則的社會，並且以和平互助的、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分歧與管理社會生活。這種母權制社會的幻想可以說是對於十九世紀末籠罩整個西方思想界的父權制社會進化論的一種反動，並且塑造出女性主義所特有的「姊妹情誼(sisterhood)」，深刻影響了後來的第二次、第三次女性主義運動。(Donovan, 2000)

開文化女性主義之先的是 Margaret Fuller 於 1845 年出版的著作《十九世紀的婦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criticism)》，承繼了浪漫主義傳統中的個人觀念，並將其應用在女性身上。Fuller 認為，每個個體生來就是一顆設計獨特的種子，必須讓這一顆種子在其一生當中充分地發展；女性也是如此，應該遵循內在準則而非被外在力量左右，並且能夠自我決定，在獨自面對世界時能夠擁有個人的力量。作為個體，女性需要自由地施展她的才能；作為整體，她們則需要探究她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人，這兩種過程都必須與其他女性一起完成。對 Fuller 而言，女性具備一種特殊的能力，是男性所沒有的，而現行的社會將女性囚禁在家庭中，阻擋了這種能力的展現。女性具

有某種超越理性的直覺，能夠洞察人與人和一切生命形式之間微妙的聯繫，但由於男性缺少這樣的能力，因而對女性訕笑與排斥。而若是社會允許女性釋放這些能力，社會也會產生改變； Fuller 並不特別強調女性取得和男性相同的政治公民權利，而是主張女性應該施展其所獨有的純淨道德力量(moral power)。和後來的女性主義者一樣，Fuller 把女性的解放與社會生活的改良結合在一起，認為兩者是相應而生的(Botting & Carey,2004)。

參、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後，女性雖取得投票權、教育權與工作權，但其權利未能滿足女性的需求，乃由於經濟上同工不同酬、政治上父權的法律限制、以及社會上固有家庭道德觀念的不平等，而爆發出第二波的婦女運動。在各種社會運動與理論風起雲湧的 1960 年代，女性主義也有了新的樣貌。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著作－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則作為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前導思想帶來決定性的影響。

西蒙波娃是眾所皆知的存在主義者，也因此這一類女性主義理論一般被稱為存在主義女性主義（顧燕翎，2000）。波娃對於女性主義理論的貢獻在於，她用存在主義來解釋女人在現今社會的文化身分和政治地位。在一個父權制的文化氛圍裡，男性和男性特質是積極的、是標準的；相對地，女性和女性特質則是消極的、次要的、不正常的－也就是說，是他者(the Other)。遵循黑格爾的思想，波娃相信他者性是人類思為的基本範疇，主體只能在對立中確立，個體把自己樹立為主要者，並以此和他者、次要者、客體對立。而女性，就是依據男性主體觀點來定義的人，是附屬的人。當他者對主體構成威脅，如同女性對男性構成威脅，男性若想要保持自由不受壓迫，就必須使女人居於次位，使女人臣服。波娃建立起一個非常重要的對立：被迫抹去自身性別主體性與被迫受限於自身性別主體性。對波娃而言，這是性別主義的哲學本質(Moi, 2008；Tyler, 2005)。

波娃特別強調，女性並不是唯一受到壓迫的族群，受到的壓迫卻有其獨特性。而女性所受的壓迫之所以如此獨特，波娃並不直接相信生物決定論的說法，而是從社會如何評估這些生物現象來看，「女人為何會被社會選來扮演他者？」波娃也從心理分析學中佛洛伊德對女性的「陽具羨慕說」，加上歷史唯物論裡面經濟角度的社會男女之間的關係，來探詢造成女性的他者性獨特的因素。波娃斷言，男性－女性的辯證關係是一種文化上特有的善惡對立說，「他性就是否定，因此

是惡；要提出他者，就要確立善惡對立說。」她的推測是，女性作為他者身分和自身根本的異化部分源自於她的肉體，尤其是生育功能。女性受到諸多生理特質的束縛，男性卻不受這些限制（高虹，2004；羅長江，2000）。

這個時代的女性主義關注的焦點已經有很大的差異，開始重視女性對自我的感受，也就是，女性怎麼定義女性，而非作為男性的附屬品而「被定義」。「意識覺醒」成為女性主義運動的主要目的，女性主義理論也開始進入學術領域，進入大學校園，引起除了女性之外其他族群的注意，並且開始了和各種邊緣族群多元而豐富的對話。

肆、激進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第二波高峰主要形成於六零年代的「運動婦女」之間，在六零年代的種族民權運動、反戰運動之中，從男性新左派(New Left)陣營獨立出來，積極參與民權運動的女性深刻感受到自己在組織中的二等公民地位，急切地希望在組織中能允許真正的女性風格的存在。這是女性主義運動史上最絢爛的一頁，許多憤怒而激烈的大膽想法出現，各種理論遍地開花，這一波浪潮統稱為激進女性主義（顧燕翎，2000；Donovan, 2000）。激進女性主義主張，女性所受的壓迫是最古老、最深刻的剝削形式，是一切壓迫的基礎，必須加以根除，否則將繼續助長各種壓迫的枝枒。激進(radical)一詞取其中「根(root)」的意思，是較新左派更根本的革命立場，也暗示其較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更廣泛、更深入的進步性。激進女性主義和其他女性主義不一樣的是，其並不是直接衍生自男性為主流的社會、政治或文化理論，並且關心的不是性別平等，也不會試圖克服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而是去「強調」差異，因此也被稱為女性中心的女性主義(Abbott, Wallace & Tyler, 2005；Graham, 1994)。

激進女性主義理論的要點包括個人即政治，以及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父權制而非資本主義制度，女性應該要聯合起來，把主要精力投注在對抗主要的壓迫者－男人的身上。早期的激進女性主義最重要的兩部著作都在 1970 年問世，包括 Kate Millett 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與 Shulamith Firestone 的《性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Sex)》；後期則 1978 年 Mary Daly 的《婦科學：激進女性主義的元倫理學(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顧燕翎，2000；Dnonvan, 2000)。

Millett 在《性政治》中以描述一系列的性政治實例開始，揭露了許多被奉為

「正典」的文學著作中對女性的性侮辱與怪誕描寫，指出社會藉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化的過程，使女性接受她們的次等地位。這些男性作家筆下的男女關係流露濃厚的「威權」氣息，且往往讀來令人感覺不僅僅是描述(description)，更近似於規範(prescription)。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是權力關係的典範，但它是藉由性關係來表達的，這種權力的行使是在私密的、個人層次上的。而父權制的主要支柱就是「性政治」，女性若想在父權社會中生存，就必須扮演好社會所賦予的性別角色，表現那些「女性化」的舉止（丁凡譯，1999；Tong, 1989）。

Firestone 的《性辯證法》是一份革命性的文獻，不同於過去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理論，Firestone 認為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不在經濟，而在於生物學。女性的生育功能是造成性別分工不平等的主因，而人類的生殖特性決定了一個社會組織－生物家庭，這個生物家庭又決定了男人、女人、小孩的階級差異順序。人類嬰兒的成熟期很長，這便決定了嬰兒有很長一段時間依賴於成人－特別是母親，同時，生育使女性的體質衰弱，必須依靠男性才能生存。因此，Firestone 極力反對生理母親身分，認為可以透過技術將生育小孩的工作交由整個社會來分擔；如此，生物家庭便會瓦解，兩性的生殖生理區別就不再具有文化意義，女性的解放才能夠完成(Merck & Sanford, 2010；Randall, 2000)。

Mary Daly 則是在《婦科學》一書中直接地指出，女性若不離開父權制則根本連生存都有問題，因為父權制下的男人不僅出力壓迫女性心靈，更極力壓迫女性的身體，諸如印度的殉夫習俗、中國的纏足、非洲的割除陰蒂、歐洲的焚燒女巫及西方的婦科醫學等皆是殘害女性身體的真實手段。書中也引用亞馬遜河旅行者的神話，她認為女性被拋入一個虛妄的、模糊的王國，為了使女人的存在真理得以顯現，必須摧毀這個王國。而由於現實是語言建構的，Daly 利用批判或解構語言來進行。「這是一場新語彙的旅程。」Daly 創造這些新語彙的目的就是在摧毀父權制社會物化的錯誤之時，同時也創造新的意識，新的女性現實感。透過某些傳統詞彙的反意，尤其是用來否定女性的消極詞語，創造新的意識，而那些被汙衊、邊緣化的女性是所有女性的積極典範，她們是拒絕向男性霸權屈服的女英雄(Rousselow, 1988；Tong, 1989)。

以上舉三本著作作為代表，但其實激進女性主義理論相當繁雜，關注的面向也很多，實難以用區區幾個理論來概述其發展過程。不過大略來說，激進女性主義是環繞著女性的性別角色而發展的，一開始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在性別區別，因而致力於消除性別差異；後期發覺把女性受壓迫的原因歸諸於女性身體並不妥

當，便轉而認為男性的身體才是問題所在，並且視女性的生理特質為其力量的來源與解放的種子，歌頌生而為女性的優越性。

第二節　bell hooks 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承繼與反動

bell hooks 的第一本女性主義著作《難道我不是女人嗎：黑人女性和女性主義(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出版於 1982 年，在觀念上對於 1960 至 1970 年代興起的激進女性主義有承繼更有批判與反動，部分研究者(Donovan,2000；姜珊，2011)依據 hooks 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批評將其列入激進女性主義的一個支派，另有部分研究者(賀璋瑢，2002；顧燕翎，2000；Moore-Gilbert, 1997)則因著 hooks 的黑人女性身分以及其批判白人女性的論點而將其歸為後殖民(或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可以確定的是，hooks 的理論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對後來的女性主義發展有很重大的影響。以下將分別就 hooks 女性主義理論中對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延續與革新分別說明，梳理 hooks 創作其黑人女性主義理論的立基與脈絡。

一、承繼與延續

(一)男性和女性制度化的支配－從屬關係

Millett 在其著作《性政治》中這樣闡述:「將兩性關係的制度進行公正調查後，我們發現，從歷史到今天，兩性之間的狀況就好像 Marx Weber 所說的那樣是一種支配與從屬的關係。在我們這種社會秩序中，基本上從來都沒被人們檢驗過，甚至是經常被否認的(然而卻已經制度化了)，是男性按照天生被賦予的權力來統治女性。」Millett 稱之為最巧妙地內在化了的殖民，並且和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相比要更牢固、更普遍、更持久。她認為，女性受剝削與壓迫的根源就是男性對公私領域絕對的權威與統治所形成的父權制，從而保障男性針對女性的各種支配方式，並形成其中的性別主義觀念。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中也不斷強調制度化的性別主義對社會的影響，她在《難道我不是一個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一書中以黑人民權運動為例，指出在勞動和高等教育上對女性的歧視就意謂著那些想要在解放運動中取得領導者地位的黑人裡面，黑人男性是較可能的候選人。而隨著黑人男性取得支配領導者

的地位，他們就形塑了早期黑人解放運動，反映出一種父權制的傾向。在各種場合，黑人男性領導者發言支持父權制規則，他們的性別主義隱含在黑人男性提升黑人女性至顯要地位的浪漫憧憬裡。在爭取自由平等的黑人民權運動當中，卻公然且毫不退縮的將性別主義合理化，並且在男性與女性皆認為理所當然，認為這有助於他們達成「更大的目標」。這些制度化的性別主義壓迫，必須男性與女性一同辨識、承認並且接受其存在的事實，否則沒有展開改變的可能(hooks, 1990)。

(二)女性身體的他者化

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性壓迫女性的根源是生理特徵。首先，人類的性行為受制於女性的「接納」，並且男性對女性的交媾是具有侵入性的，在性方面，男性是天生具有支配性的。男性可以藉由窺視、定義、佔有女性的身體來進行征服。因此，只要女人的性仍是由男人的性來解釋，男性女性的平等關係就不可能達成。hooks(1981)指出在蓄奴時期黑人女性受到大規模的性剝削，這些強暴行為不只來自白人奴隸主，也來自其他黑人奴隸。蓄奴時代早期，美國社會正面對著社會急切地加諸非洲人「性的野蠻人」的身分的時候，而黑人女性，因著女性被當作性罪惡的源頭，自然被視為女性邪惡與性欲的化身。曾有白人政治家鼓吹應該將黑人女性送回非洲以斷絕白人男性的姦淫行為，黑人女性奴隸被描繪為妓女，並且必須為所受到的性剝削負起責任。

hooks 認為，許多學者忽略了黑人女性奴隸被強暴的嚴重性不只是在於白人男性有意地為了經濟目的毀壞了黑人女性身體的完整，也因為其導致了對黑人女性特質的貶低，並且將這樣的想法滲透了所有美國人的心理，在蓄奴時期結束後形塑了所有黑人女性的社會地位。只要女性特質還被區分為兩種－那些仍是處女的「好女孩」和那些性放縱的「壞女孩」，男性就能夠維持對女性的假關懷。現今男性對女性身體的取得更無限制，他們就不再認為有必要去尊重女性，他們可以認為所有女性都是「壞的」、是「妓女」，並且公開地顯露蔑視和憎惡。在父權制社會中，大多數男性傾向於認為他們並不會使用暴虐行為來壓迫女性，然而實際上，男性從小時候就被社會化認為女性是他們的敵人，並且對他們的男性地位和權力是一種威脅－種能夠藉由暴力征服的威脅。隨著年紀增長，他們漸漸學到對女性的侵略行為能減少對於男性權力被侵占的焦慮與恐懼，而女性身體的特質與其所伴隨的象徵意義，使其成為男性發揮支配權力的最佳場域。hooks 再將這種女性身體的他者化延伸到黑人女體的象徵與再現。在流行文化中，黑人女體被呈

現的方式大概只有兩種－肥胖的保姆形象或是帶有動物般野蠻性欲的蕩婦形象。對於白人男性而言，黑人女體仍然是能夠輕易取得的所有物，是易攻擊的，代表著「自然」、「原始」的性滿足。身體，讓黑人女性成為性別主義壓迫最嚴重的受壓迫者(hooks,1992)。

二、批判與反動

(一)工作代表獨立

bell hooks(1984)在《女性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的開頭就指出，走出家庭、爭取社會工作權利這樣的女權要求在美國只能代表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利益。從美國歷史上看，參加家庭以外的社會勞動對黑人女性來說，從來就不是什麼要爭取的「權利」，不論是過去棉花種植園的女奴，還是今日要養家糊口的勞動女性，她們生存的第一條件就是工作。因此，爭取工作權只代表了被丈夫當作玩偶寵物閒置在家裡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要求。這些論點是直接針對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指標性著作－Betty Friedan 的《The Feminine Mystique》的批評。

hooks 首先指出 Friedan 的這本著作因為指出當代女性主義運動的道路而受到很大的重視，但在這本書中，那些受到最嚴重的性別主義壓迫的女性、那些每天精神與肉體受到嚴重摧殘的女性根本不存在，她們也是女性，卻不存在於女性主義運動當中。她們沉默，默默犧牲，默默接受不平等待遇而沒有明白的質疑、組織的反抗、或者集體的憤怒。hooks 進而斷言，至今為止，現存的女性解放理論由於階級侷限和文化誤解，不能解釋女性經驗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更不能代表受壓迫最深的黑人勞動女性。白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中存在大量種族主義觀點，強調了白人至上的理論，從而否定了女性可以超越民族和種族的界線而形成政治聯合的可能，對於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絕對是有害無益。

hooks 再舉了 Leah Fritz 的《夢想者與交易者》為例，舉出這本討論當時代女權運動的書中，強調性別主義壓迫之下的女性遭遇是所有女性共同的東西，超越其受壓迫方式的不同性，「苦難不能用數量來比較和衡量。」Fritz 用這個論點來為女性主義理論中將中產階級婦女的無聊與空虛所受的痛苦等同於靠福利救濟過活的貧窮婦女所受的苦難這樣的說法辯護，這兩者無從比較，因為「她們都是受壓迫者，都很悲慘。」hooks 反駁這樣的論點，認為光是許多女性都是到壓迫這一點並不足以讓所有女性大聯合。許多證據證明，種族和階級會造成女性生活經驗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幾乎是無法逾越的。而當白人女性主義者堅持這些差距「不

存在」或是「無法區別」的時候，有必要探討這些女性的動機為何。

(二)不存在的姊妹情誼

針對女性主義運動中女性彼此的關係，hooks 批評了其中一個關鍵性的論點－即其「姊妹情誼(sisterhood)」的理想。她認為，種族歧視是女性彼此團結的障礙，姐妹情誼理論並沒有將白人女性對其他種族女性的歧視觀念表述出來，無視其他種族的利益需求與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彼此之間溝通困難，特別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間的關係更是如此。

由歷史發展來看，對黑人女性而言，白人女性幾乎都是種族主義者，並能夠直接對她們行使權力，所以黑人女性很快能夠認識到姐妹情誼的矛盾性，即加入女權主義運動意味著幫助受到性別壓迫的白人女性獲得解放，於是，黑人女性認為這是一場同她們自身利益毫不相干的運動。對黑人女性而言，「問題不在白人女性是否比白人男性更加的種族主義，而是白人女性「是」種族主義者。性別主義讓白人女性在白人種族帝國主義的存在當中無法成為支配性的角色，但這並沒有讓他們不去接受、支持、提倡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或是成為種族主義壓迫者(hooks,1982)。」

(三)過度個人化的權力

「個人即政治」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重要論點，指雖然許多事看起來只屬於個人經驗的層面，其實也受到政治的影響。這裡的政治指的是權力結構，用在女性主義理論中就是當前父權制的社會結構，父權制讓生活在當中的人們不得不符合其所規定的性別角色，亦即男性支配－女性附屬的權力關係(顧燕翎，2000)。而激進女性主義提倡女性了解自身受到的壓迫與歧視，辨識自己身處於社會當中的從屬角色，當意識到性別角色是如何影響自己之後進而能夠去批判與反抗。hooks 並不是反對個人經驗的力量，而是對於女性個人經驗的單一化提出質疑。

在《女性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一書中，hooks 對於在女權運動中被扭曲的「個人即政治」做出批判，認為這種口號逐漸變成一種手段。「鼓勵女性去思考其受歧視、剝削或者壓迫的經歷是與其形成對其社會地位的意識型態和制度是一致的，致使許多沒有完全審視自己處境的女性對於其所處的政治現實和與女性群體的關係從來沒有形成一種綜合性的了解(hooks, 1984)。」女性被鼓勵說出自己的經歷，這是自我恢復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步，但這應該僅僅是開始。然而，當女

性內化地認為描述她們的悲哀與發展一種批判的政治意識相差無幾，女性主義的發展便停滯了。

(四)男姓不是敵人而是盟友

對於傳統女性主義中仇視男性的二分法，hooks 斷言，所有男性都是敵人的理論並沒有消除男性繼續壓迫女性並維護父權制的意識和任務，甚至可能會造成男性對女權的厭惡和恐懼這種嚴重的心理，因此將男性視為敵人這一女性主義言論基本上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hooks 認為，對「男人」和「男人的行為」的關注掩蓋了對女性在政治方面發展自己的強調，過度關注男性和女性的二元關係讓女性沒有機會去了解資本主義是如何剝削女性勞動以及其與性壓迫的關係，或是如何反對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這麼做無法讓女性認知到，只有投入革命中、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旨在結束性壓迫的女權運動才能成功(hooks, 1984)。」

除此之外，相較於大多數女性主義理論單面向地將男性視為不變的壓迫者，hooks 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在壓迫者與受壓迫者關係中，男性也是受壓迫者，男性和女性一樣被社會化了，無意識接納了性別歧視思想，因此男性也應當擔負起清除它的職責。可以說，在女性主義運動的鬥爭當中，男性是作為重要的「盟友」，男性也要進行鬥爭，是反對性別壓迫運動的重要力量。當男性希望自身在女權運動中擔負同樣的職責並完成必要的工作，那麼女性應當認可他們的行動，承認他們在反對性別壓迫鬥爭當中的重要性。

第三節　bell hooks 的女性主義內涵

從十九世紀女性意識的抬頭到女性主義理論蓬勃發展的二十世紀，女權運動一直是一項爭取「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的運動，不論是否認同或參與在女權運動當中，大多數人把女性主義運動理解為使婦女取得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的運動。然而，既然男性在白人至上主義、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社會結構當中是不平等的，那麼女性是想要取得哪一種男性的平等呢？而女性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有共識呢？hooks 認為，女性主義的定義多元卻也太過分歧，「當前的女性主義運動似乎是一個沒有任何明確意義的術語，對這個詞的定義採取什麼都行的態度使它實際上沒有任何意義(hooks, 1984)。」

大眾對女性主義政治的誤解也反映了現實中大多數人是從父權制裡的大眾傳媒中得知女性主義的，而這正是一般人提到女性主義總是帶有負面印象，並且從事女性主義運動不容易長久持續的原因之一。對理論達到真正的理解才能夠確實實踐，理解與實踐是互相的，這是 hooks 在闡述她的女性主義理論時非常強調的部分。在《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讀懂的女性主義》一書中，hooks 對女性主義有過這樣的定義：

> *女性主義是一場結束性別主義、性別剝削和壓迫的運動。這個女性主義的定義是十多年前我在我的《女性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一書中提出來的。當時我希望這個定義能成為一個通用語，人人都可以用這個定義。我喜歡這個定義，因為這個定義沒有男人是敵人的這種暗示。這個定義明確指出性別主義是問題的核心，直指問題的心臟。從實踐上看，這個定義指出所有的性別主義思想和行為都有問題，不管維護這些思想行為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這個定義也廣泛得足夠包括一種對系統性的、體制性的性別主義的理解。作為一個定義，它是開放的。為了理解女性主義，這個定義暗示你必須理解性別主義。(hooks, 1989b : viii-ix)*

理解女性主義之前要先理解性別主義壓迫，這是 hooks 談論女性主義運動的前提。今日的社會結構當中存在著各種不同形式的壓迫，hooks 在建立她的女性主義理論時必須讓所有人理解女性主義運動的重要性，增加其說服力，並且清楚辨識出其理論的突破性與侷限性，進而能提出具體實踐其女性主義理論、破除各種形式壓迫的方式。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從前提到最終目的有五個要點：第一，性別主義是最普遍的支配形式；第二，女性可以同時是受壓迫者也是壓迫者；第三，創造各種族群發聲的場域；第四，性別主義非所有支配的問題中心；第五，女性主義運動是自由的實踐。

一、性別主義是最普遍的支配形式

hooks 做為一名黑人女性，首先被貼上的標籤是種族的而非性別的，這在黑人民權運動達到高峰的六零年代尤其明顯，而第二波女權運動同樣也興起於六零、七零年代，這樣的狀況讓同時兼有兩種身分的黑人女性經常面臨兩難的抉擇，大多數黑人女性也就選擇了投身於種族主義運動，並且在當中讓自己的性別特質差

異最小化，甘心地做運動中男性領導者的附屬角色。針對這樣的兩難，hooks 為她為何首先是一名女性主義者然後才是一名黑人民權運動家提出解釋。

這個論點有一個前提－相較於其他形式的支配，性別主義直接形塑並決定了我們私人生活中的權力關係。而女性主義終結父權制的鬥爭對於全世界的男性女性之所以重要並不是因為這是所有壓迫結構的基礎，而是因為這是我們每天生活當中持續遭遇的支配形式。在熟悉的社交空間，在最親密的脈絡－家庭，在最親密的關係範圍－家人(hooks, 1990)。許多時候我們是在家庭裡看見高壓的支配並學習去接受它。在《Talking Back：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一書中，hooks 說明了這本書之所以命名為「talking back(頂嘴)」的原因。hooks 自述成長過程中一直是一個愛頂嘴的小孩，而在家庭中小孩不經允許的說話無疑是自討苦吃，尤其小女孩從來不可能被鼓勵多說話、發表意見，因為只有小男孩未來有可能成為牧師而必須傳教，也才有說話的必要。小女孩應該保持沉默，在任何家庭中不論男性或女性大人都視為理所當然。

hooks 回憶在自己所看到的黑人社群裡，黑人女性在都是女性的環境裡言語充滿熱情，大聲對話、叫喊，語氣時而尖銳時而柔軟，言談之間充滿力量和親密感。但是一旦這樣的場合中出現男性，女性自然就噤聲了。男性女性同時存在的場域，女性是沉默的，並且認為理所當然－因為她們的母親是這樣做的，母親的母親也是這樣做的，這樣的性別角色早已內化了(hooks, 1989a)。

二、女性可以同時是受壓迫者也是壓迫者

另外一個 hooks 發展其女性主義理論的前提是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權力關係的假定。hooks 強調，雖然在全世界性別的觀點上都假定男性擁有較大的主權與控制權，實際上，女性有能力、也確實有參與在支配政治當中，在權力關係中同時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要想了解支配，必須了解人類身為男性和身為女性所擁有能夠成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能力，這是一種連結、一種共通性。(hooks, 1989a) 在家庭當中，雖然主要的壓迫者是父親，母親也可以成為其子女的壓迫者；在性別主義的社會結構底下，相較於男性，女性大多數時候是受壓迫者，但是受教育的、資產階級的白人女性也可能壓迫從事勞動工作的、教育程度低的貧窮非白人女性；在教室裡，學生相對於教師是屬於被動接受的受壓迫者，但學生也可能對其他相對弱勢的學生霸凌而成為壓迫者。

hooks 在批判男性霸權的父權制社會結構的同時，更呼籲女性：「要記得，我

們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支配、去壓迫、去傷害，要記得，我們首先要抗拒的是那存在於我們自身當中的潛在的壓迫者，要拯救那些潛在的受害者。」只要在社會結構中仍存在著任何形式的壓迫，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自由。因此，「唯有做到這些我們才有可能尋求支配的終結、尋求自由解放(hooks, 1989a)。」女性主義正是關注在個人的、自身的轉化，女權的意識覺醒挑戰我們每一個人去改變自己，改變我們個人參與(不論是作為受害者或加害者或兩者皆是)在支配系統當中的方式。

在壓迫者與受壓迫者關係中，hooks 也點出了黑人女性在當中的地位以及其之所以能做為女權運動之動力的原因。黑人女性沒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去歧視、剝削或壓迫，她們通常都有直接向主流的階級主義、性別主義或種族主義社會結構及其意識型態挑戰的切身經歷。這樣的切身經歷可能會形成她們的意識，使她們的世界觀和那些有著特權地位的人完全不同。hooks 認為，在發展女性主義理論中黑人女性主義者扮演著中心的角色，做出了獨特而有價值的貢獻(hooks, 1984)。

三、創造各種族群發聲的場域

抱持女性本質主義思想的白人女性認為，她們所界定的女性這一概念某種程度上適用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種族或民族的女性，她們不僅對種族階級等因素忽視，甚至以為自己持有特權，她們的話語便是所有女性的聲音，這些是 hooks 和其他黑人女權主義者極力批判與反對的，也是女權運動中所號稱的姊妹情誼之所以無法達成使所有女性聯合的原因。在白人女性主義者的概念裡，聯合的基礎是共同的犧牲，所以她們強調共同的壓迫。她們對姊妹關係的觀點要求姊妹應該「無條件」地互愛；她們應該迴避衝突並且把爭執降到最小。她們不應該相互批評，尤其是在公共場合。藉由高呼「團結」、「互愛」，白人女性避開了面對「壓迫者」這個身分的指控，完全沒有意識到她們認為自己「擁有」女權運動，她們是作為代表邀請其他女性這些「客人」加入的「主人」。

在壓迫者/受壓迫者、剝削者/被剝削者關係中，支配者被視為主體而被支配者則被視為客體。作為主體，人們就有權力定義自己的現實、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陳述自己的歷史。受壓迫者爭取自由的鬥爭從定義自己為主體開始，定義他們的現實、形塑他們的新身份、陳述他們的歷史、敘說他們的故事(hooks, 1989a)。在提倡黑人女性的自我敘寫時，hooks 將黑人女性置於中心的這個舉動並不是要排除非黑人女性的「他者」，而是對於那些願意聽他們講話的人的邀請與挑戰，讓

所有人聽見一個黑人女性以一個主體而非劣勢他者的身分發聲，她寫作，不是為了讓白人女性更了解黑人女性，而是讓自己更了解並更多地思考黑人女性的經驗。

寫作與言說對這些女人而言就是「頂嘴(talking back)」的例子，如同她們對於排除在為民族地位抬升或女性賦權所設計的組織制度之外的反應。隨著黑人女性持續恢復過去的聲音並且在公眾凝視當中重新敘寫自己；隨著繼續將黑人女性的聲音置於中心，也持續地揭露出黑人女性意識權力的到來、聲音的發出與自由的轉化。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了解到黑人女性發聲與被聽見所冒的風險，藉由這麼做，我們可以增加機會與空間，促進更進一步的對於試圖轉化黑人女性世界的受壓迫的、隱匿的、被忽略的經驗的現象學分析(Davidson & Yancy, 2009)。

四、性別主義並非所有支配的問題中心

傳統上女性主義傾向於將女性主義議題視為所有問題的中心，認為只要解決了性別主義壓迫最終就能根絕所有形式的支配(鮑曉蘭，1995；Donovan, 2000)。而這樣的假定讓西方女性，特別是擁有特權的白人女性認為種族主義和階級剝削都只是父權制延伸而成的結果而已，這也就演變成在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當中認為抗拒父權制支配比起抗拒種族主義或其他形式的支配更為正統、更為合理化。以白人女性為首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從誕生之始，便陷入脫離各種族與民族女性以及忽視除性別以外其他因素的影響的各種批判中(賀璋瑢，2002；顧燕翎，2000)。

女性主義理論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其引起社會大眾對於存在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性別主義的注意，鼓勵人們挑戰各種形式的壓迫。改革是革命運動的重要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所進行的改革類型。女權主義關注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改善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使很多女性和男性都沒有看到社會整體改變的需要。」(hooks, 1984)看不到這項運動和自己的關係使得許多人不願參與女性主義運動，過度強調女權則讓運動的目的變的狹隘；男性因為只感覺到敵意而不可能參與女權運動，非白人女性或中下階層女性則因為無法認同女權運動的要求與呼籲而拒絕投入。

hooks 同時也提醒人們注意，父權制支配和其他形式的群體壓迫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基礎，只要這些壓迫體系仍然完整存在，就不可能去消滅父權體制。在 hooks 的黑人女性主義中，藉由把注意力集中在互相關連的支配系統－性別、種族、階級，黑人女性和其他女性族群承認女性經驗以及女性的權力與支配關係的多樣性

與複雜性，避免將某一類族群放在第一位，容納各個種族、民族和階層的女性，讓她們說話，貢獻自身的經歷與故事，批判帶有歧視思想的女性主義理論，建立抗拒所有形式壓迫的女性主義。

五、女性主義運動是自由的實踐

hooks 自身深刻感受到女性主義中的不平等是從大學的女性主義課堂開始，而在她的學術生涯當中也從未停止爭取與宣揚學術界的平等化。hooks 自述其作為一名黑人女性主義學者的觀察，她認為學術環境並不是一個說實話的地方，不是受壓迫者能夠聚集在一起對話以擺脫束縛的地方，不是透過寫作以得到自由的地方，不是見證鬥爭之重要性的地方，也不是見證群體努力進行轉化的地方。然而大學是創造理論的主要場域，將想法理論化是重要的，它賦予了邊緣族群「用壓迫者的語言和壓迫者對話」的能力，也是維繫一項運動的穩定與持續的重要因素。但在女性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理論化被過度強調而被扭曲。在學術界，女性主義學者若不被認可為理論化的或智識上嚴格的就會被剔除在特權的連結之外。這對於女性主義傷害很大，不只是失去創造和女性與男性生活直接相關的理論的需求，更陷入一種失去創造力的權力鬥爭，偏移了女性主義的批判能力和目的(hooks, 1989a)。

女性主義作品的價值不應該以是否符合學術標準來衡量。一篇女性主義作品的重要性不應該取決於它是不是難讀懂，也不應該僅僅因為其難懂就被捨棄。把思想內容「轉化」後傳播給不同年齡、性別、種族和文化水平的聽眾的能力是女性主義教育者需要具備的一項技能。女性主義是一種實踐的理論，不管一個女性的政治立場如何，不管她是保守的還是自由的，她都可以把女權主義變成她既存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顯然這種思想使女權主義更容易被接受，因為這種思想強調女性可以不用從根本上挑戰或改變自己和文化，就可以成為女權主義者。hooks 強調連結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女性主義和其他反壓迫理論一樣，都是關係每天生活發生的事，應該讓所有人都能「更靠近(come closer)」。hooks 在《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讀懂的女性主義》中有過這樣慷慨激昂的呼籲：

> *如果我們不能創造一個群眾性的、包括所有男性女性的教育運動，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將永遠被大部分的主流媒體發布的負面的信息所破壞。如果我們不著重指出，這個國家的公民不可能知道女性主義運動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帶來的積極貢獻。具有建設性的女*

性主義對我們社區和社會的貢獻常常被支配文化抹去，然後又以負面形象構建女性主義。大多數人沒有辦法明白女性主義的多重呈現方式，這些方式積極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分享女性主義思想和實踐維繫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知識是為每一個人的(Feminism is for everyone)。

(hooks, 1989b : x)

六、女性主義運動當中的階級議題

hooks 談論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時，也從階級層面進行分析。hooks 舉 Paul Fussell 在《階級》一書中所提出的「X 類人」為例，指出這一類人可能作為一種解決途徑，能夠嘗試解開女性主義運動當中的階級議題。所謂的 X 類人當中「有許多是知識份子，但也有許多人不是; 他們是演員、音樂家、藝術家、體育明星、社會名流…X 類人思想獨立，不對流行風俗趨之若鶩，言行舉止也隨性不羈。…做個 X 類人，就類似於擁有頂端上層人士所能擁有的絕大部分自由和某些權利，只是沒有錢。在某種意義上，X 類人是沒有錢的貴族(hooks, 1994b)。」

雖然出身自南方勞工階級家庭，hooks 一直渴望著成為 X 類人的一份子。黑人解放鬥爭和女性主義運動讓他變得激進，而從大學時代開始，hooks 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他就一直努力讓這種渴望與革命互相協調。hooks 從根本上反對資產階級，然而他也澄清到，他不是不想要任何物質享受，但它能夠看清楚金錢的本質。對 hooks 而言，物質享樂主義是殖民帝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層面，其維護著白人至上的資本主義父權制。也由於這種意識形態思想架構形塑了支配與壓迫文化，因此對物質享受倫理道德觀的批判就是社會變革的核心。

hooks 承認，雖然他並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夠超越階級範疇而存在，但是在 X 類人的自由空間裡，這些人當中對支配壓迫持批判態度的人必須心甘情願地放下階級優越感。有些進步人士宣稱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但他們同時又想方設法地聚斂財富，hooks 認為這些人有必要和 X 類人交流想法，必會大有助益。X 類人表露了他們立志激進的社會變革，並公開聲明他們擁有階級特權，但絕不剝削或妨礙他人的自由與福祉。

hooks 舉自己對幾位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黑人女性學者提出的建議為例，他認為談論 Alice Walker 和 Toni Morrison 等作家時，從其階級地位的變化進行討論將有助於了解他們的寫作內容、風格及人物塑造，但這些黑人女性學者的反應並

不好，彷彿 hooks 建議談論特權階級塑造黑人立場的方式，就是在暗示這些作家並不是「黑人」、不是「權威」，彷彿其本來的目的就是去除他們作為黑人的權威身份。hooks 說明，他相信黑人性的構成並非千篇一律，而他也並不是民族主義者，其所希望的是喚起人們的注意，去了解階級以何種具體真實的方式成為塑造當代黑人女性身份的中心。

第四節　bell hooks 女性主義理論之影響與限制

bell hooks 作為一名難以被定義或歸類的女性主義學者，在其所處的時代裡對於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進程，做到既能夠破又能夠立，其理論與實踐起到了劃時代的重要作用，同時，hooks 是一名充滿爭議的學者，而其著作與公共言論是了解女性主義所不能夠忽視的。以下針對其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性與影響，以及其理論的限制與受到的批判進行討論。

壹、bell hooks 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性與影響

一、打破女性主義的「和諧」

直至 1980 年代，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仍存在一種假定共通性的傾向，西方白人女性為主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她們的政治目的適用於所有女性，她們所受的壓迫也是所有國家、種族、階級、宗教與地區的女性所共有。這種「和諧」可見於各種政治運動當中，權力的操作方式、其在運動中的位置、高度不均質的分配以及取得策略的制定等，讓原本目的為消除歧視、取得平等與自由的政治運動變質而成為不平等發生的場域。hooks 以及其他黑人女性主義者或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的著作與批評讓這些邊緣女性的生命經驗被看見，白人女性主義者不再是獨一的、支配的女性主義聲音，而成為了女性主義多元聲音的一部分。

白人女性主義者之所以和其他女性主義者大多數時候處於敵對的關係，部份可歸因於白人女性並沒有認知到她們處於一種帝國主義的遺留中。對黑人女性而言，壓迫從來就不只是男性霸權一種，黑人女性也更容易和黑人男性而非其他女性形成團結關係。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女性主義對於公與私的二分法的觀點(McEwen, 2001)。白人女性主義者十分強調的一個主張就是女性不應該再被侷限於家庭領域，而是應該走入公共領域取得社會重要地位，讓女性的貢獻被看見。然

而這樣的主張忽略了文化脈絡的不同，在某些文化裡，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確實是分開的，但兩者也都是重要且具政治性的，都應該被討論與重視。以黑人女性而言，黑人社群中看待母職的方式就和西方白人的觀點不同，因著自蓄奴時期流傳下來的傳統，黑人女性在白人社群中從事的工作多數就是所謂的「母職」，即照顧孩童、清掃、下廚等。對黑人女性而言，相較於在白人家庭的工作，在自身的家庭中從事「母職」更有價值，具有無可取代的意義與地位(hooks, 1984)。

打破女性主義理論中假象的「和諧」，指出人與人之間原本就不同，不懼怕揭露壓迫，也不懼怕承認權力關係的存在；多元，就是不斷地追求所有個體的歷史與真實，能夠在平等自由的環境裡共存。對於在教室裡的教與學，hooks 也是抱持一樣的觀點，認為教師必須拒絕落入所謂「絕對平等的教室」的迷思，教室不會是一個承諾平等的人們之間平等的對話的地方，教室中也有權力關係，應該用一種面對的教育學，面對教室中的差異，藉由批判與分析消除並改正學生可能的單一世界觀(Luke, 1996)。

二、說與寫的政治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黑人女性和其它邊緣族群女性皆是由白人女性替她們發聲的。藉由將這些邊緣族群女性當作研究對象，白人女性在學術界中將邊緣族群女性劃為「他者」，被排除在中產階級白人為主的學術中心之外。白人女性透過建立發展自她們的生命經驗與規範的學術理論，擁有了決定什麼議題「真正重要」、而什麼議題只適用於特殊情況的權力。黑人女性主義學者試圖打破學術界的單一命名權、代表權與將知識理論化的權力，質疑白人女性主義者自我賦予的替所有女性發聲的「權威」與「責任」。

hooks 認為，若是不質疑地檢視自己的著作動機，就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不適當的多元理論，將邊緣族群女性更加邊緣化、甚至消去邊緣族群女性的存在(hooks, 1990)。總而言之，在學術界不論是發展理論或教學，應該更加注意研究者在權力關係中的位置，持續地反思知識的產生與創造過程。白人女性主義者要做的不只是認知到她們知識的位置，更要捨棄她們的特權。這就包含了批判地檢視自己的歷史、偏見與習得的反應(Spivak, 1990)。hooks 身為一名黑人女性知識份子，除了批判學術界的權力不均質與壓迫現象，更以淺顯易懂的寫作風格與多元的知識傳遞方式，實踐她的教育作為自由的實踐之理念；自己不斷透過述說自身經驗來發聲，也鼓勵各種身分認同的女性族群為自己發聲。

三、壓迫的連鎖本質

因著不同的社會歷史因素，不同時代所被突顯的壓迫形式各有不同。黑人女性主義者點出各種形式的壓迫實際上是互相影響的，具有不可分開個別討論的本質。對於壓迫形式的檢視與反思，黑人女性主義理論中有一個重大的差異，即從分別檢視各種壓迫形式的內涵，轉變為將不同壓迫系統之間互動的過程做為研究對象；她們的目標不是在已存在的理論中加入新的變項，而是針對系統間的互動發展理論化的詮釋。hooks 明確地指出西方社會中一直存在各種二元論的思考模式，是各種壓迫形式的主要意識型態之構成要素(hooks, 1984)。

這樣的二分法不只可能造成不適當的理論詮釋，更是使得人、事、物被以其差異來分類的主要原因。若是不去理解各種壓迫之間的關係，就容易將各種二分的身分認同視為是互相排斥的，並且在各種身分認同中產生較好/較差、較重要/較不重要、支配/被支配、主體/客體等階層制的區別。黑人女性主義者對於傳統二元論思想模式的挑戰，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創造一種仍為支配文化服務的多元文化理論(Bedolla, 2007 ; Collins, 1986)。藉由將各種形式的壓迫連結在一起，黑人女性主義者所追求的不只是打破性別主義壓迫或是種族主義壓迫，而是真正除去所有互相支持的壓迫形式；身為邊緣族群的黑人女性，關心的不只是自己的經歷與苦難，更是所有曾經受到壓迫、正在受到壓迫或是未來可能受到壓迫的族群的命運。

貳、bell hooks 女性主義理論的限制

一、過度的一般化

黑人女性主義者質疑白人女性主義者在提到「我們」女性時所指的女性的代表性，認為她們口中所說的「我們」似乎隱含著指向全部女性的共通性之意，實際上卻只能代表優勢地位的白人女性生命經驗。這樣一股批評的潮流是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也因為黑人女性主義者的發聲，讓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當中長久以來的「半後設敘述(quasi metanarrative)」產生改變，女性經驗不再被想像為一種共通的、均質的、可以一概而論的特質，各種關注女性不同層面的理論開始出現(Fraser & Nicholson, 1989)。然而，黑人女性主義者對白人女性論述的批評，原意是希望在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間搭起連結的橋梁，卻有可能造成的是更嚴重的區隔。

hooks 同樣也批評了白人女性主義者用「女人」直接等同「白人女性」的傾向，hooks 主張「白人女性從來不曾真誠地和黑人女性或其他女性群體產生連結來對抗性別主義，…，因為她們不願意承認女性運動是有意識地且刻意地架構以排除黑人和其他非白人女性(hooks, 1984：142)。」然而，hooks 這樣的主張將所有白人女性主義者歸為有意的種族主義者，這樣的一般化是十分危險的。和 hooks 同時期的黑人女性主義者 Michelle Wallace(1995)就曾批評 hooks 的著作是「過度自我放縱、自憐自艾…充滿自以為是的說教(pp.21-22)」，認為這就是導致美國學界不願意和黑人女性主義者打交道的原因。

為了爭取有色人種女性的利益，黑人女性主義者對白人女性提出批評，伴隨而來的影響卻也包含了白人女性之間瀰漫的焦慮。白人女性主義者因為害怕說錯話，害怕說出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言論，因此許多時候在面對種族相關議題時乾脆完全噤聲，或是變成說腹語的玩偶，反覆地說著一些出身毫無爭議的、所謂的「專家」說過的話。反對者質疑黑人女性主義者的堅持之必要性，認為在這樣的政治正確氛圍之下，必須先確立權威再發聲的規定反而可能是對於女性自我表達權力的一種攻擊(Gubar, 1998)。

二、無法突破和其他受壓迫論述的相似性

另一個對 hooks 常見的批評正是其獨特的性別、種族、階級三者兼具的理論發展脈絡。這是一種開放的思考方式，為女性主義理論帶來清新的氣息，更為理論的發展方向創造了各種不同可能。然而這種理想雖然新穎，付諸實行時的風險卻也更高。學者以 hooks 著作中的重要概念「頂嘴(talking back)」為例，認為這個概念看起來對於性別化的種族議題是鼓舞的並且是賦權的，《Talking Back》一書本身似乎卻是對著在自己說話，其對於殖民的批評顯得孤芳自賞，尤其是在於其拒絕現實主義(realism)此一脈絡之下，更是不具說服力。雖然 hooks 一直聲稱其論述是超越二元論的，卻還是持續回到輕鬆容易的二分法當中。「我敢不敢對受壓迫者和壓迫者用同樣的聲音說話？我敢不敢用一種能讓我們遠離支配範圍的語言向你們說話？…，語言是鬥爭的場域(hooks, 1989：28)。」這樣的主張受到了批評，認為這顯示了黑人女性主義理論仍無法跳脫和其他受壓迫論述無所區別的困境(Suleri, 1992)。

hooks 被批評誤用了少數聲音(minority voice)這一個概念，讓黑人女性不論在女性主義運動或是在黑人民權運動當中，因為好鬥與排他的特性而都無法被接受，

更有可能在兩個領域都迷失焦點。hooks 將女性主義理論應用在多元文化主義當中視為一種革命行動，也可能無法帶來真正的影響，造成實踐上的困難(Fox, 1994)。hooks 在發展理論的過程中一直清楚地表達其立場，「我的政治立足點並非絕對的女性主義，更多的是黑人的自由解放運動，但我深刻地感受到作為一名女性，要想投身黑人革命鬥爭中，我必須加入女權運動，不管是女權運動還是黑人解放運動，鬥爭應該針對各種形式的壓迫，而事實上我認為以女性主義作為鬥爭的開始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hooks, 1991)。」正是這樣的立場，讓 hooks 在女性主義者之間與黑人民權運動之間遭遇更大的兩難，讓觀點更開闊的同時，卻也使得立場不夠堅定，也不夠具有說服力(Alcoff, 1995)。簡單來說，hooks 的理論因此容易被批評為過於理想化，其所描繪出來的理想藍圖和實踐的方式仍有待彌補的差距，這是其他受壓迫論述當中也存在的問題。

三、區別「本質論」與「經驗認同」的矛盾

hooks 身為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其論述存在著一種矛盾，這種矛盾讓她的理論當中重要的「主體建構」概念變得模糊且容易被誤解。雖然避開了性別和種族理論中的本質論，hooks 同時也非常謹慎地防止任何可能損害個人經驗之權威性的破碎知識，她仔細地區別了「本質」和「經驗建構的認同」這兩個概念，然而這樣的區別卻為經驗建構的實踐帶來難以避免的風險。hooks 將自我的去中心化視為一種新的機會，產生新的、不同形式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並且創造轉化的主體性，能夠表達與展示認同的不同面向。而唯有將在邊緣所建構出來的認同帶到中心，現存的單一主體性的和諧才可能被打破(hooks, 1990)。

然而，重新建構主體性有其風險，當在學術場域表達在邊緣形塑的認同時，這樣的認同可能被視為一種「奇觀(spectacle)」，能夠引起足夠的關注與好奇，卻無法達到預期打破和諧的目的。為了尋求多元聲音，為了建構差異的論述，為了真正達到轉化而不只是由不同的人重複說出相同的話，hooks 以多元性(multiplicity)為其理論的軸心，產生的影響可能是具解放性的卻也可能是具抑制性的(Bordo, 1992)。因為多元性的產生若被侷限在邊緣經驗的認同當中，可能導致在學術場域討論多元性時，多元性的產生卻不「多元」。實際展現在現今的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中，白人女性主義者只從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論述中尋求種族相關議題，再將其應用在白人女性主義的脈絡之下，致使理論的建構反而破碎而片段，失去一套理論應有的完整性。

第四章　bell hooks 的反種族主義理論

第一節 黑人權力運動

美國黑人在爭取平等的道路上未曾歇止，從掙脫羞辱的奴隸身份，到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再到選舉權、參政權和受教權的確立，一步步達成階段性的目標。二十世紀以後，大量黑人勞工湧入都市，而在 1909 年美國有色人種協會(NAACP)的成立，正式帶領黑人鬥爭運動進入組織化的蓬勃發展時期，影響美國的黑人族群至深至遠，直至今日。從鬥爭的「路線」這個角度來說，一般可將此時期分為三個階段：一、法律訴訟階段(二十世紀初至五零年代中期); 二、直接行動階段(五零年代至七零年代); 三、積極參政階段(七零年代至今)。特別是在 1960 年代，美國遍地開花的公民運動氣氛，可以說和黑人族群此時期的鬥爭運動因果交雜，密不可分。大大小小的、有著各種不同目的的黑人團體成立，各種抗議遊行、靜坐、武裝暴動撼動了這個國家，也帶給黑人族群內部很大的衝擊，而黑人鬥爭歷史當中最受爭議的「黑人權力(the Black Power)」口號以及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 Party)正是產生於這個動盪的時期(賴凡，2009)。

一、　黑人權力運動的背景

（一）Booker T. Washington 與 W. E. B. Du Bois

黑人民權運動，有別於其他公民運動，一直有著較明確的目標—亦即平等與自由。在黑人群體當中，產生分歧的是路線的爭論。十九世紀至今黑人民權運動路線的分分合合，概括而論，就是 Booker T. Washington 與 W. E. B. Du Bois 的理念之爭。Washington 著重工業和職業教育，認為黑人應該先走出當前問題—亦即貧窮、失業等，取得職業技能以後，就能向白人證明他們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在其 1895 年發表的《The Atlantic Compromise》演說當中提到，黑人群體想要取得進步有兩個關鍵，一是發展對群體有用的能力，另一個則是種族間的和諧(Moore, 2003)。Du Bois 對此作出回應，提出 Washington 論點中的三個自相矛盾之處，首先，一味地鼓勵黑人成為具生產力的勞工以及擁有個人資產，卻不爭取投票權，會導致黑人的所有財產完全沒有法律保障。第二，要求黑人擁有自我尊重的同時，卻又要求黑人臣服於白人僱主以取得工作。第三，強調工業教育重於高等教育，

不適用於所有黑人，而且若忽略了高等教育，也就無法教育出黑人教師來擔任工業學校的教師。Du Bois 批評這樣的做法將黑人所遭遇的問題歸於黑人自身的責任，反而讓白人有藉口旁觀而完全不伸出援手。Du Bois 同時認為北方白人應該挺身而出參與鬥爭，而非只是捐錢表示支持(Reed, 1997)。一些評論認為產生這兩種理念差異的根本原因是二人所受教育經歷的不同。Du Bois 是在新英格蘭接受的菁英教育，有人認為他並不懂美國黑人當時面臨的實際狀況，有點過於冒險突進、對於這個時代而言並不實用。而 Washington 儘管是妥協派，被認為是白人選出的、代表白人利益的黑人解放精神領袖，卻是真正熟悉美國南方狀況的。

（二）立即自由(freedom now)與黑人權力(black power)

美國的黑人群體，不論是在什麼形式的權力運動當中，都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我先是黑人？還是先是美國人？黑人作為受壓迫的邊緣族群和主流白人文化合作，還是應該創造文化、價值獨立的「國中國」？這樣的分歧在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 1960 年代則展現在 Martin Luther King Jr.和 Malcolm X 兩大黑人民權領袖的對立，對立的情勢一直延續到 1965 年 Malcolm 遇刺身亡，繼之則有黑人學生團體的領袖 Stokely Carmichael 等人。黑人權力這個概念的提出，可以歸於民權運動話語的轉變所立下的深厚思想基礎。Malcolm X 積極在黑人社群中傳播黑人意識，強調黑人取得社區機構控制權的重要性(Joseph, 2006)。他認為，「黑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壓迫者、剝削者和歧視者，那就是白人，黑人應在共同對敵的基礎上團結起來。」而黑人在追求民權時如遭遇暴力，可采取自衛行動反擊(Malcolm X, 1964)。

黑人權力這個口號真正出現是在 1966 年，Martin Luther King Jr.和 Stokely Carmichael 帶領數百名群眾走上街頭，抗議白人恐怖和暴力，並且延續 James Meredith 的「對抗恐懼遊行(March against Fear)」。在密西西比的抗議行動當中，關於武裝自我防衛、跨種族合作及政治策略的衝突延燒，在 King 和 Carmichael 之間產生了許多爭論。King 當時三十七歲並且已經是世界知名的人權領袖，Carmichael 則才二十四歲，剛剛在哈佛完成哲學學位，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的領導人。這兩個人的差異經常是媒體報導的焦點，緊繃的關係在一次遊行的訪談之後變得更加嚴重。

在被問到 Meredith 在遊行當中受到毆打的事件是否動搖運動的決心時，King 宣示堅定地投入非暴力運動當中，而 Carmichael 卻公開宣稱其戰略上的支持。之後更在一次 SNCC 的集會當中介紹新的口號「黑人權力」，在這場集會當中激憤的

情緒瀰漫，甫被放出獄的 Carmichael 對著底下的群眾說，「這已經是我第二十七次被捕，我不會再去坐牢了。唯一能夠使白人不再繼續欺壓我們的方法就是奪回權力。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說：黑人權力！」這樣的一番話以及聽者和講者之間相呼應的激起許多人的激動情緒，也使許多人受到驚嚇，更成為黑人解放運動的一個轉捩點。King 曾試圖說服 Carmichael 放棄使用黑人權力這個口號。他說，這個口號「不僅會使我們的盟友困惑，而且會讓黑人社會孤立，給許多因種族偏見而覺得羞恥的白人很好的藉口來為種族主義歧視辯護(Lawson, 1984)。」接受媒體訪問時，King 和這個口號劃清界線，而 Carmichael 則成為黑人激進份子的發言人(Jeffries, 2006)。

King 所支持的爭取投票權的抗議遊行，當時多數能夠參加的是白人宗教人士，而這是 Carmichael 不能接受的。他希望傳達一個訊息，也就是這是一場黑人的鬥爭，是為了黑人的、也只有黑人參與，並且黑人永遠站在最前線。隨著抗爭遊行持續進行，爭論的越來越專注在遊行的組織方式，也就是是否應該是由黑人組織、進行的抗爭。自此以後 Carmichael 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被認為是 Malcolm X 思想的繼承者，一個挑戰黑人民權運動傳統的人，是「Malcolm X 憤怒的繼承者(the angry child of Malcolm X)」。漸漸的在理念和做法上越來越分歧，多數黑人對於鬥爭運動的去從感到手足無措，而自 1969 年開始，黑人權力遂成為一個模糊的大概念，將理念互不相同的黑人群體繫在一起，但是對於這個概念的全是也各不相同(Carson & Gallen, 1995)。

對於 SNCC 而言，1964-65 年發生了重要的轉化階段，也就是 Clayborne Carson 稱作「內轉向（turning inward）」的轉化。他們非常清楚必須在自由主義之外找到替代的方法，但確切的方法卻始終懸而未決。這個轉化主要受到 Malcolm X 的影響，而這階段產生的正是黑人民權運動至今從未消退的爭論。這個時候的 Stokely 則是繼續 Malcolm 的工作，亦即發展一種黑人的政治表達，是獨立於現存任何政黨之外的。在某種程度上，黑豹黨正是這種政治表達的實踐。到了七零年代中期，因為無止盡的意識形態爭論、缺少資金來源、男性沙文主義以及警察與 FBI 組織性的鎮壓，黑人權力運動走到了盡頭(Jefferies, 2006)。

二、 黑人權力運動的定義與影響

黑人權力作為一個政治主張在美國社會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核心思想是黑人必須掌控自己的事務，不再重視種族合作原則。它主張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

力，強調黑人意識、種族團結、黑人社區的力量、黑人文化、歷史和制度的價值和意義，把黑人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美國的社會制度。

黑人權力運動對許多人而言，一直難以做出令人滿意的定義和解釋，這也部分地反應出這個喊的震天價響的口號，其實充滿困惑與爭議，甚至在其支持者之間也是如此。如同 William Van Deburg 所言，黑人好戰分子發現，「比起想出簡潔的定義，解釋被斷言的錯誤概念更為容易」。的確，黑人權力的一個核心特質就是其創造力和實驗性，並且當中存在著各種借用(borrowing)與改寫(adaptation)。各種版本的黑人權力經常沒有被清楚描述，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黑人權力和種族平等主義的意識型態成分和計畫性成分經常是同時並存於個體和組織當中(Joseph, 2006)。

在批判黑人權力時，King 不像其他民權領袖那樣激烈，但仍表達了他的懷疑。他承認，「對美國黑人來說，爭取獲得權力是必要的」，但是「黑人權力這個口號是不幸的，因為它給人黑人民族主義的印象。我們從不為黑人爭取任何排他性權力，而是與白人分享權力(Aberbach and Walker, 1970)。」對 King 而言，黑人權力意味著「以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而黑人種族優越論一樣是邪惡的，與白人種族優越論並無二致（SNCC papers, 1959-1972）。」與白人權力機構不同的是，King 並不反對黑人權力的戰鬥性，但他讚同的是戰鬥性當中的非暴力鬥爭，因為「當他們喊叫著黑人權力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暴力的出現。不管是否真是如此，它聽起來就像是反向的種族主義(Aberbach & Walker, 1970)。」

對某些人而言，黑人權力運動牽涉到暴力行為，並且目的在摧毀美國政治和經濟機構。另外，有些人則認為黑人權力運動致力於將存在於公民權力運動當中多年的那些白人除去；有些人將這個運動視為黑人對白人的仇恨，有些人則認為這是一種壓力團體策略，另外一些人則是將其解讀為對黑人族群注入尊嚴和驕傲的一種嘗試。Charles Hamilton 不直接做出定義，而是將支持黑人權力運動的個體或組織略分為四種：一，政治的買賣約定者(the political bargainer)，這一類的人遵守既存的政治程序，因為他們能夠在兩個陣營當中生存，並且主要目標在於使不同族群的工作機會均等。二，道德鬥士(the moral crusader)，比起平等工作機會，則是對於拯救社會的靈魂更感興趣，他們通常是非暴力的並反對和現狀妥協。三，疏離的改革者(alienated reformer)，這種人對於透過現存體系帶來有影響力的改變的可能性抱持著嘲諷的態度，他們支持黑人控制黑人社群，尋求一個社會的轉化，但是必須立基於活化的黑人社群之上。四，疏離的革命者(alienated revolutionary)，

如同前者，這一類型的人對於現存的權力體系也是嘲諷的，但卻主張進步的改變唯有透過工具性暴力(instrumental violence)的計劃行為才能夠產生(Carmichael and Hamilton, 1976)。

這樣的分類方法被廣被接受，但是也有學者提出質疑。John T. McCartney 認為這樣的分類仍十分模糊，並且在定義上有重疊的地方，因而提出了對於黑人權力運動的重新定義。首先，在 Hamilton 的定義當中，政治的買賣約定者、道德鬥士、疏離的改革者三者之間似乎沒有太大的政治差異，因為他們都提倡政治科學當中所謂的多元論者方法，因此重新形成的第一類黑人權力可以被稱為「多元論方法(pluralist approach)」。黑人權力多元論者主張在美國權力並不是被集中於一的，而是分散在一些符合類似「遊戲規則」的競爭族群之間。雖然承認在美國個別的成功仍然可能，多元論者仍堅持，對於一個族群整體而言的成功，是在於這個族群迫使其競爭者承認其要求的正當性之能力，也唯有做得到這些才能說是擁有權力。多元論者更評論黑人族群，認為他們試圖透過強調個人主義超過民族主義來競爭，結果是某些黑人個體特別成功的同時，黑人整體的成長卻少之又少。在多元論的脈絡底下，黑人權力運動被視為黑人對於個體和群體力量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於一直是黑人抗爭時傾向的方法的個體政治策略的平衡力之覺醒(McCartney, 1992)。

鑑於Hamilton的分類方式無法適當地解釋黑人隔離主義者與黑人革命份子的差別，McCartney 認為應該以另外一種分類來清楚說明。看待政治社群的方式之一就是將其視為由一些擁有共同價值、志趣和信仰的人所組成的，而以此為前提，就可以說，當一個特定群體對於這些價值、志趣和信仰的忠誠度降低至近於零，這個群體就陷入了解體的危機。在這個狀態下的群體當中很大一部分的人依循的是既存價值 A，同時卻也有很大一部分重視的是相反價值 B，這就導致一種「反群體(counter-community)」的狀態，即其擁護者「反自治主義者(counter-communalist)」在既存的秩序當中發展。反自治主義者這一類型的人不像多元論者尋求在系統當中生存，也不像隔離主義者想要從系統當中隔離開來，反自治主義者更希望能夠以不同的價值、志趣和信仰來取代系統當中現存的。盛行於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黑豹黨就是鮮明的例子，黑豹黨認為當前的政府和其附屬機構是不正統的，因為他們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也因此他們沒有權力繼續存在。黑豹黨指責美國當前價值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在當中只有極少數人獲利，多數人是受到剝削的。他們要求建立新的系統，在當中任何商品的生產或是服務的提供都是基於人民的需求，

並且所有人民都能參與做決定的過程。

黑人隔離主義者(Separatist)同樣輕視現存系統當中的價值、志趣和信仰，並且渴望從當中區隔出來，尋求引入新的價值。這裡 McCartney 以黑人詩人 Amiri Baraka 所描述黑人面臨的精神挑戰為例，Baraka 認為，「一個文化基礎(a cultural base)、一個黑人基礎(a black base)是黑人權力運動所必須具備的完整。我們必須理解我們正在取代一個瀕死的文化，我們必須有良好的準備再去進行，並且非常清楚我們正在用什麼樣的東西去取代(Baraka, 1971)。」雖然在輕視現存系統這一點上和反自治主義者相同，隔離主義者產生差異的地方，在於他們將輕視作為第一個步驟，為創造一個隔離的且有區別的黑人社群，而他們關注的也是如何建立這樣一個社群。也就是說，他們並不關心整體社會轉化，對於社會事務的關注也僅在於這些事務影響到他們的隔離主義目標之時。而和另外兩種類型差異最大的地方，就是隔離主義者將永久的黑白種族隔離視為是用來消除那些種種的不平等最好的方式。

簡而言之，不論哪一種分類，黑人權力運動經常被視為一種對傳統觀點的挑戰，作為民權運動當中的一個特殊斷裂。究其核心，黑人權力運動試圖激進地重新定義黑人和美國社會之間的關係。黑人權力運動家大力提倡一種好戰的新種族意識，在當中將黑人認同視為新的激進主義的靈魂(Ogbar, 2005)。

黑豹黨的出現黑人權力運動歷史中最具爭議性的一段，因著大眾對其兩極化的評價，這項權力鬥爭運動一直帶著一股神秘感，彷彿再怎麼探索都無法真正參透。一般人對於黑豹黨的定義可以簡單歸為兩種，一是勇敢且絕不妥協的革命份自，他們蔑視種族主義的警察，為社區組織了早安節目(breakfast programme)、醫療診所和自由學校; 另一個定義則完全相反，他們被視為純粹的暴徒，白人和黑人都懼怕他們，並且他們唯一成功做到的就是吸引媒體的注意力（Lazerow and Williams, 2009）。有的論點認為黑豹黨是一個高度去中心化的組織，並評論其行動並不是單一的全國性的運動，而是因著共通意識形態而鬆散地聯結起來的、許多地方運動的集合體。

黑人權力運動是一場思想變革運動，它以一種特殊的辯論方式進行。一方是美國權力機構和體制化的民權領袖，以各種方式批判黑人權力。另一方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其主要領袖以演講和著書立說傳播黑人權力，為它辯護。盡管權力機構詆毀黑人權力的聲譽，但其基本主張在經過美國體制的過濾後進入主流社會，成為大眾接受的基本價值(Carson, 1981)。黑人權力試圖改變美國的政治基

礎和權力結構。它除了喚醒黑人社區的黑人意識，還給黑人社區帶來一種政治意識。黑人權力呼籲黑人圍繞選舉組織政治力量，鼓勵黑人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權力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來行動。黑人權力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認為這是美國黑人日常生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關鍵。它主張組建由黑人控制的政治組織，要求在黑人人口占多數的地方掌握權力，在不占多數的地方適當地分享政治和經濟權力(Smith, 1981)。

第二節 hooks 對黑人權力運動的批評

一、女性在黑人權力運動當中的缺席

種族和性別在美國一直是同時發生/部分重疊的論述。一開始針對種族主義的論述主要是對奴隸制的討論，接著，黑人女性的身體也成為推論的領域(discursive terrain)，「黑人女體」作為種族和性的議題匯集之處而在其之上產生種種論述。從奴隸制時期開始，強暴就一直是白人男性支配族群的權力和儀式，也是歐洲帝國主義殖民在非洲和北美洲適切的象徵。然而，綜觀歐洲歷史，實際上並不存在關於奴隸制的性心理史記載，去探討白人男性性剝削黑人女性的意義或者是這種關係當中的性政治。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性作為破壞和打斷權力關係的力量，動搖壓迫者/受壓迫者關係的典範？然而，奴隸制當中的性政治作為一段歷史論述，很早以前就已經被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所取代。由白人男性所創造並述說的這個故事，說的是黑人男性無法抑止地渴望去侵犯白人女性的身體。隨著故事持續發展，這樣的慾望不再是出於性的愉悅，而是一個關於復仇的故事，在這段故事當中，強暴被黑人男性當作武器，用來扭轉他們的景況，取得超越白人男性的權力。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理論開始交錯纏繞，變得密不可分(hooks, 1981 ; hooks, 1990)。

即便黑人女性在整個奴隸制歷史當中受到最多的壓迫，在黑人尋求其公民權力的鬥爭當中，黑人作為一個整體卻好像只有黑人男性，看不到黑人女性的身影，也幾乎未嘗試在種族主義理論形成的過程中，加入性別主義的因素。回朔美國黑人解放鬥爭的歷史，似乎對於「自由」的定義就是模仿白人殖民者的行為、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雖然六十年代較激進的黑人民權運動抗拒模仿白人並且強調泛非洲(pan-Africanist)的聯結，他們對於自由的觀點仍非特別突出，亦非特別具革命

性。其中對於父權制價值的堅持，以及將黑人解放運動等同於讓黑人男性得到更多特權的運動，是危害激進鬥爭的重要因素。

對此 hooks(2006)認為對於性別的徹底批判能夠迫使黑人解放運動的領袖展望新的策略，並且以一種富遠見的方式談論黑人主體性。六十年代的作家、運動家和女性主義思想家 Toni Cade Bambara 參與黑人解放鬥爭，特別強調性別主義的危害力量。Bambara 的論文《On the Issue of Roles》保持對性別主義的強烈批評，舉出性別主義者以解放之名強調黑人女性的屈從與沉默的危險性。當代的女性主義運動並未真正對於黑人政治思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在文化層面，許多黑人男性和女性之間出現了分裂，顯示出男性和女性的關注焦點並不相似，男性和女性之間缺乏共通點去進行關於美學、性別或女性主義政治的批判對話(Bambara, 2005)。

受壓迫的黑人男性和女性，很少去挑戰被用來描述種族主義支配和/或黑人解放鬥爭的影響之性別化的象徵。黑人抗拒的論述幾乎一直都是將自由等同於男子氣概(manhood)的展現，而將黑人男性所受到的經濟與物質支配等同於一種閹割。接受這些性別化的象徵，在受壓迫的黑人男性和他們的白人男性壓迫者之間形成了一種連結，他們共享著一種父權制的信仰，認為整個革命鬥爭就是男性是否有能力去建立能夠符合性別支配的政治支配。仔細檢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很明顯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都把自由等同於男性氣概，而這種男子氣概就是能夠無差別的取得女性的身體。以此為基礎來看，兩個族群都被父權制社會化了，認為強暴是能夠接受的、用來維持男性支配的方法。在父權制當中將性和男性支配的融合，同時影響了不同種族和階級中男性特質的建立。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雖然在種族主義議題上相互對立，在父權制的壓迫當中卻是同謀(hooks, 2004)。

即便到了當代，女性主義理論發展漸趨完全，在父權制支配文化底下，性別因素似乎仍然只是次要議題。父權制社會更傾向於支持那些宣稱是女性主義、卻又拒斥女性主義的論點。因此，一些保守立場的女性主義者被白人男性支配的媒體奉為女性主義的新希望，而當大眾需要女性主義的聲音時，媒體也是首先轉向她們。這些白人女性出身自優勢階級、並在菁英機構接受教育，她們不可能代表激進的或具革命性的女性主義立場，而這些立場也是媒體幾乎不會去關注的。有色人種女性主義者必須掙扎著克服種族主義的藩籬，甚至出於害怕自己的聲音會被抹滅而被迫參與到這個忽視他們的媒體當中。

二、新民族主義(Neo-nationalism)[1]的過與不及

hooks(1990)描述黑人權力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黑人族群正經歷一種深切的集體失落感，因為意識到使黑人族群團結在一起的連繫與牽絆正迅速侵蝕損壞，對於那些逝去時刻的鄉愁非常強烈，黑人民族主義，或被稱為新民族主義遂相應而生。hooks 認為，黑人族群正在被分裂，那種根植於內化已久的種族主義當中的同化更進一步使他們分離。新民族主義的回應並沒能提供解答，因為這只讓黑人族群回到那種缺乏建設性的「我們對抗他們(us against them)」的二分法，而這不再能夠真實地反映出黑人族群在後現代世界的生活。

當前的這個世代,大多數黑人並不是居住在黑人社區,也不再是自己自足的，不再自己種東西、生產東西、也無法自己修東西。大多數人也是在白人機構接受教育的，過去那種所謂的「黑人戲院（chitlin' circuit）」—也就是黑人族群彼此認識且互相協助的圈子早已破裂。的確，那種緊密感漸漸失去了，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改變也意謂著進步。hooks 提到，並不是說黑人權力運動的發生不重要，而是它並沒有傳達好的、美善的東西，反而更多地受到具損害力的權力關係所影響，變得過度神話性了。

黑人女性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寫作，一直致力於揭露一個事實，亦即狹隘的民族主義、伴隨著對父權主義附屬的支持以及男性支配，實際上作為共謀傷害了黑人女性和男性之間有機的聯結(organic unity)。因此，hooks 認為，重新喚起民族主義並不是面對當前危機適當的解答。在許多層面，黑人族群面對的是一種認同危機，而不是「我必須找到我是誰」的生活形式問題。這種認同危機和失去政治立場有關，不知道應該如何集體地鬥爭來對抗種族主義、並且創造一個解放的空間來建立激進的黑人主體性。這個認同也和抗拒有關，關係到重建一個集體陣線以重新檢視並更新黑人解放鬥爭。

hooks(1992)以 Nelson George 的著作《The Death of Rhyme and Blues》為例，提到在當中將這種危機視為受到一種分裂的影響，亦即同化主義者與那些想要變得自給自足的黑人族群之間的分裂,這種過度單純化的歸類是有問題的。事實上，許多黑人並不是被歸為同化主義者，也不屬於自給自足者，這不只是個人選擇的

[1] 新民族主義主要是相對於民族主義而言，差別較不在於內涵而在於出現的時空背景，如英國與日本在戰後都出現了新民族主義的風潮。這裡的新民族主義指的是黑人權力運動時期，黑人族群之間以「黑色驕傲(Black pride)」為核心概念產生的民族團結。

問題。許多這種「新種族主義」默默侵蝕著黑人團結性的基礎，提出選擇和個體權力的概念，暗示著對黑人而言「自由」能夠以個人將生命中的決定立基於個人考量、個人欲望的程度來測量。

當黑人族群以相似的方式集體經歷種族主義壓迫，就有了較大的群體團結，種族融合的確從根本上改變了曾經作為黑人解放鬥爭基礎的共通立基點。今日，不同階級的黑人族群所經歷的種族壓迫也非常不一樣。姑且不論種族主義，優勢階級的黑人擁有各種不同的生活選擇和可能。我們不能夠藉由提倡回到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來回應各種不同黑人經驗的出現。根據觀察，hooks 認為黑人族群的年輕人渴求更精細的答案，但是群體之中瀰漫的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非洲中心主義的狹隘形式在回應著這樣的渴求。

許多時候，群體的領導者堅信一種烏托邦式的解放幻想，實際上在解放過程中所需要的，卻不是這些關於遠古非洲的想望，而是群體的具體鬥爭。hooks 也特別澄清，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關於遠古非洲的知識就能夠對西方教育偏好的議題作出回應，只是人們似乎漸漸淡忘 1960 年代的權力鬥爭運動是強烈反資本主義的。實際上，就黑人自由鬥爭而言，接納資本主義倫理所帶來的傷害是最多的。hooks 針對黑人民族主義和黑人自決作出了區別。首先，植基於階級分析和性別主義批評的黑人自決觀，透過鬥爭將黑人以及世界上所有受壓迫者聯結在一起，黑人民族主義卻是用拒斥的方式產生我群和他群的分別。若我們對於社會現狀不產生一種全球化的觀點，就很難重新去形塑非拒斥性的黑人自決革命運動（hooks, 1995）。

三、對本質主義的抗拒

在黑人民權運動首次讓全國注意到種族融合的議題時，許多白人種族主義者自認了解地提出「有色人種喜歡自成一群」這樣的論點，卻從來沒有人提到創傷在當中的角色，也就是說也許黑人族群喜歡自成群體並且遠離白人，是因為白人的剝削和壓迫讓他們感受到的煎熬。因為經歷過種族隔離時期，黑人族群所經歷的創傷往往有許多共通點，在黑人族群剛開始形成有組織的群體時，也經常成為他們強化其團結與同一性的方式，也就是用來形成所謂「黑人性」的重要因素。

粗略地區分，當代的黑人性當中主要有三種留存下來，包含隔離主義黑人性(separatist blackness)、文化黑人性(cultural blackness)以及同化黑人性(assimilated blackness)。hooks 認為，隔離主義的黑人族群喚起一種認同政治，其假定白人和

黑人之間在倫理上或道德上全然不同，並且沒有任何共通經驗，也不會有相同的政治議題。而在文化黑人性的脈絡當中，黑人性以一些文化詞彙被表達出來，黑人性需要獨特的文化特色表達。然而，這一種形式的黑人性部份是作為對白人性的回應而出現，以 hooks 的話來說，「對某些黑人族群而言，再造黑人認同意謂著確立一種激烈的黑人性，當中包含了培養特定的說話、穿著和互動方式。黑人性不再是一種根基於共同傷痛經驗的生存策略，取而代之的截然不同的概念，亦即一個人必須藉由回應白人性的方式來證明其黑人認同。」最後，相較於前面兩者，同化黑人性並不試圖表達黑人性和白人性的不同，也不是將黑人性作為對於白人性的文化回應，而是致力於創造一個融合的社會，在當中種族差異並不是影響個體命運的決定性因素。同化是這一類型黑人性的主要目的，並且強調白人和黑人之間的共通性(hooks, 1996a)。

hooks 認為，黑人族群之所以不願意批判本質主義，是因為害怕會因此看不見非裔美國人所共同擁有的歷史與經驗、以及因為這些經驗而產生的文化以及情感(hooks, 1992)。hooks 強調，受後現代主義影響而產生的文化批評是必要的，以「豐富[我們]對黑人認同的社會形塑以及黑人性的商品化之理解。」hooks 相信後現代主義和理解黑人性之間有一定的關聯，特別是在於後現代主義對差異性的強調。這一種對差異的強調表現在對倫理學的關注上，而這種關注必須聚焦在對他者的責任上，這就演變成 hooks 種族主義理論當中十分重要的「後現代黑人性」論點，在本章的後半部會有更詳盡的陳述。

hooks 對本質主義的拒斥和其對黑人性的倫理學批判有關，特別是被框架在一些種族本質詞彙之下的黑人性。在傳統的形而上學當中，事物因為擁有某些特質而決定其價值，並且以其本質區分階層的高低，然而，hooks 並不認為黑人性應該有一個形上學的核心概念。解構的倫理學(ethics of deconstruction)並不特別重視同一性和認同，而是強調差異和他者性，其基本概念就是尊重他者的獨特性。本質主義的一個主要問題點，在於其排斥並壓迫了他者，這就違背了倫理學的基本假定。此外，本質主義也對主體性造成威脅。作為一個主體而存在，實際上就是活出一個具創造性的人類價值。本質主義似乎是立基於主體性是被給予而非爭取而來這樣的概念，如此一來，主體性就變成了一種本質，而非一種成就。

從 hooks(1994a)對 Diana Fuss 關於本質主義的論述所做的批評，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hooks 的立場。文中 Fuss 不斷強調本質主義特別被邊緣族群所使用，而「本質、認同和經驗」之所以能夠在教室當中發生，是因為來自邊緣族群的批

判性投入。在其描述當中，每次只要有人用本質主義的立場支配了討論，讓其他人無法做出任何「經驗權威」之外的評論，他們一定是出自歷史上曾受壓迫和剝削的邊緣族群。雖然 Fuss 承認邊緣族群在支配結構當中受到壓迫，在探討本質主義的危險與誤用時，卻完全不去談論在學術場域和教室當中邊緣族群是如何被迫噤聲，也不探討經驗權威是否早已受到性別、種族、階級支配所決定。hooks 認為，用本質主義的拒斥作為定義存在與認同的方式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實踐，並不單只出現在邊緣族群。就算這些邊緣族群真的使用本質主義，通常也就是模仿在支配結構當中具有控制作用的典範。Fuss 將本質主義的誤用集中在邊緣族群，等於將他們認定為打亂教室進行並使其變得不安全的主因，這麼做和過去殖民者批評被殖民者、壓迫者批評被壓迫者的方式沒有什麼不同。

hooks 進一步指出，實際上，邊緣族群不需要把這種所謂的二元對立帶進教室當中，因為它早已經在當中運作了。從同理的角度來看，邊緣族群的拒斥性本質主義可能是對支配與殖民的一種策略性回應。在教室這個場域，教師本身，特別是來自支配族群的教師，自身就可能使用本質主義的概念來限制學生的聲音。因此，作為教師就更應該隨時對自己的教學保持警惕。對 hooks 而言，看待所謂「權威聲音」的方式，重要的不是經驗權威(authority of experience)，而是對經驗的熱忱(passion of experience)、對記憶的熱忱(passion of remembrance)。換句話說，就是個體「參與經驗(engage in the experience)」的過程。

hooks 經常提到批判思考者參與到不同位置、去表達各種不同立場的重要性。就像做麵包，經驗就是麵粉，光有麵粉無法做成麵包，但當其他材料都具備時，沒有麵粉也不行。hooks 又將立場比做山頂，有時候經驗太重阻擋我們爬向山頂的路，那我們就放掉它;又有的時候山頂實在太高太遠，就算匯集我們所有的資源也無法達到，那麼我們就一起感受知識的限制，一起仰望、一起渴望達到那個最高點。即使只是這樣的一種渴望也能夠是一種知的方式。

第三節　何謂黑人性(Blackness)

hooks 認為，過去關於黑人性的文化描寫事實上多植基於白人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中，而這更形塑了黑人和白人族群看待黑人形象的方式。hooks 的反種族主義理論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去發展一些政治策略，能夠挑戰黑人形象的界限，亦即進入 hooks 所謂的黑人形象的去殖民化過程。hooks 認為這樣的過程是具政

治性的，代表一種在抗拒支配的行動當中努力定義自我的行為。這段過程包括探尋黑人性的過往論述，並同時產生想像與創造未來的新方式。hooks 引述 Hall 的定義到：文化認同…是一種成為(becoming)也是一種存在(being)，它不是某種超越地方、時間、歷史與文化的而已經存在著的東西。文化認同總會來自某處，但就像其他有歷史的東西一樣，它們必定會經歷持續的轉化(hooks, 1994a)。

hooks 不厭其煩地強調，認同不是一種「我們」和「他們」二分的問題，黑人認同也不是指黑色的就一定是好，白色的就一定是不好。hooks 更著重的是去探求越界的、具挑戰性的黑人性形象能夠在什麼樣的立場和政治位置當中產生？對於那些敢於渴望以不同方式看待黑人性與看待自我的人而言，種族和再現的議題就不只是批評社會現狀而已，它也會是關於轉化形象、創造不同的選擇，轉化我們的世界觀並且讓我們遠離關於好壞的二元思考。為越界的形象、反叛的視野創造空間，對於產生轉化的脈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有了這些空間，我們轉化形象時若不同時轉變典範或改變觀點，也無法達成什麼進展。

一、　激進的黑人主體性(Radical Black Subjectivity)

hooks 定義激進的黑人主體是一個擁有抗拒的世界觀的個體，這樣的個體具有一種意識、一種認同、一種立場，不只是作為抗拒非人化的鬥爭而存在，更是作為使得具創造性、擴展性的自我實現成為可能的運動而存在。

hooks 自述經常用 Paulo Freire 的一段話作為其非裔美國文學課的開始：「我們無法作為客體來開始一段鬥爭，而目的卻是成為主體(方永泉譯，2003：19)。」從這個主張可以看出，hooks 所謂的「成為主體」強調的不只是其目的性，更重要的是過程當中個體不斷的反思，而就這些位處邊緣的個體而言，則是這些被支配者、受壓迫者、被剝削者對於如何讓自己成為主體的過程進行反思。藉由指出人類將自我連結到作為客體而掙扎著成為主體這樣的兩難，hooks 的論點展現出若語言是一種權力爭奪，那麼最好是一開始就站在可能被賦權的那一方，也就是作為主體來開始這段過程。當然，hooks 很清楚奴隸制、錯誤的媒體描述以及白人性使黑人主體性變得複雜，但這些負面的遭遇並不是 hooks 所談論的主體性概念之基礎。hooks 更聚焦的是，這樣的負面描述和遭遇從來沒有真正成功地使黑人主體性消失。

黑人主體性和激進黑人主體性之間，差別就在於前者是一種二元的概念，是透過對立於白人性而建立，並且其中只存在著一個目標，也就是去拒絕外在結構

和白人所施加的「非人化行為(dehumanization)」，而激進的黑人主體性並不受限於二元關係。為了建立激進的黑人性，hooks 認為應該超越負面的、外在施加的商品化的他者，去建立黑人經驗的獨特性。但 hooks 也不諱言，將美國的黑人經驗理論化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為在白人至上主義的教育系統和媒體當中，多數黑人族群被說服，認為自己所處的情境並不複雜、也因此並不值得複雜的批判分析和反思。這樣的想法是如此內化於今日社會大眾的心裡，甚至是那些投身黑人解放運動鬥爭的人，那些自認思想已經去殖民化的人，仍然經常感到難以「說出(speak)」自己的經驗。而談論的議題越是痛苦，也就越是無法發聲。

因為黑人性和本質主義的倫理學批判被連結在一起，重新思考黑人主體性就非常重要。hooks 認為，黑人主體性的重構是高要求的，因為要使其發生必須使認同成為具有能夠產生建構、創造和改變的特質。因此黑人主體性應該是流動的，而這樣的流動性意味著，隨著黑人族群回應不同情境，並且和更大的世界互動的過程中，黑人認同是持續在改變的。唯有重視這個改變的事實，黑人認同才可能納入一個關於黑人主體性的預言式論述，且能夠具有解放與轉化的旨趣。

至於為什麼是「激進」的黑人主體性，hooks 在《Censorship from Left and Right》一文當中，曾經提到她困擾於黑人解放運動和女權運動當中的保守思想家，這些保守分子擁護審查制度並且將其作為一種可接受的社會控制方式。hooks 認為，任何解放運動的核心都應該有保護自由言論的政治責任。而激進份子之所以激進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她們看盡太多審查制度被用來壓抑進步的聲音。女權運動和黑人解放運動，作為重要的進步運動，兩個群體當中部份個人在面對的緘默與保留，最後都造成了運動當中影響大而深遠的傷害(hooks, 1994b)。

關於是否應該以文化作為團體認同的依據，hooks(1990)指出，文化認同在一些圈子已經變成一個違背團體準則的議題。某一個群體就認為，「強調文化就是政治挫敗的象徵」。但是對 hooks 而言，若一個人當前所處的政治實踐場域並不允許改變發生，轉換行為場域是相當實際的作法。回到「認同」和「文化」上以改變位置，並連結到政治實踐，認同成為建立激進黑人主體性的舞台。同化、模仿或是承擔起反叛的外來他者的角色從來不是唯一的選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必須激進地修改認同政治的概念，去探索邊緣的場域作為黑人所能夠最好地成為的樣子，同時又能保持對黑人解放鬥爭的投入的空間。

二、黑色作為一種「他者」

作為主體性的對立面，hooks 對於他者性也有清楚的定義。在現今的社會當中，他者性的商品化非常成功而徹底，因為其提供作為一種新的愉悅，比一般的方式更強烈也更能滿足群眾。在當前關於種族與差異的議題中，大眾文化公開地宣稱「承認和享受種族差異可以獲得快樂」這樣的論點。那些深藏於白人至上主義社會結構深處的真正樂趣，亦即與他者相關的那些汙穢的的、無意識的幻想與盼望都浮到了意識表面。在許多方面，這都是原始風情（primitive）在當代的復甦，並明顯帶著後現代的痕跡。

而種族差異之所以讓人如此著迷，正是因為讓一個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差異的引誘，追求與他者的相遇，並不會要求他永遠放棄自己的主流地位。當種族和族裔被商品化為快樂的泉源後，特定的文化群體和某些個體的身體被視為新奇的遊樂場。在這個遊樂場中，居於主流地位的種族、社會性別和性行為可以在與他者的親密關系中肯定他們的優勢。在信奉白人至上的資本主義父權制看來，人們對原始風情的渴望或對他者的幻想可以被繼續加以利用，並且這種對原始風情和他者的剝削可以銘刻到社會現狀中，鞏固社會現狀。差異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探討那些面對差異的人如何表達對他者的欲望、如何操縱這種欲望並產生轉化，可以說明這些對他者的渴望是否真的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hooks 談論到當前的一波「帝國主義鄉愁(imperialist nostalgia)」經常模糊了當代的文化策略，而這些策略不是用來哀悼，而是頌揚原始風情的延續。這是一種近似鄉愁的渴望，根植於對於原始性存在於黑人他者當中的堅信。想要接觸那些被視為他者的身體的渴望，平息了過去帝國主義的罪惡，甚至是以一種蔑視的姿態，否定了責任與歷史的連結。更重要的是，其建立了一種當代的論述，在當中由支配結構加諸於那些被選定的他者身上的煎熬，因強調誘惑和渴望而偏離了方向，彷若這樣的渴望並不是要改變他者的形象而是要成為他者，將支配者的渴望美化了。相較於哀悼式的帝國主義鄉愁將背叛與拋棄的他者世界構成缺少與失去的累積，當代對原始性的渴望則是透過一種豐富、慷慨、夢想之地的投射來表達(hooks, 1992)。

如果白人與黑人之間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係，那麼這表明，黑人與白人之間不存在支配關係，也不存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主體對主體關係必須通過雙方的選擇與協商才能出現。僅僅表示渴望和黑人「親密」接觸，並不能消除種族主義政治。其實這就是種族主義在個體互動層面的表現，

種族間的相互承認，會影響到種族主義中的統治方與被統治方，而其也正是使不同種族不再相互否定與相互假設的唯一立場。因為這是永遠無法忘卻的種族主義支配事實，使得白人族群接觸他者的渴望變成問題性的。通常正是這樣的事實，在白人和非白人、白人和黑人之間的接觸表現在大眾文化當中出現的時候，最受到掩飾。hooks 舉了一些攝影方面的例子，在白人和其他非白人合照的時候，白人總是那個採取主動去「觸碰」的人，當中也頌揚白人擁有的原始性，彷彿在宣告著白人具有流浪世界、產生接觸的能力。

在他者性的幻想當中，對愉悅的渴望被投射作為一個能夠打斷並挑戰支配想法的力量，其作用是調解也是挑戰。hooks 描述自己在進行關於他者在大眾文化當中的研究時，曾經和不同身份地位的黑人討論過，是否在大眾文化當中聚焦於種族、他者性和差異真的能夠挑戰種族主義。大多數人同意，認為承認並探討種族差異可以是令人愉悅的，這樣的訊息代表了一種突破，一種對白人至上的挑戰，對不同支配系統的挑戰。然而，隱含在這樣的現象當中，最主要的恐懼是文化、民族和種族差異會持續地商品化並且最終成為滿足白人味覺的新菜色－而他者最終也會被吃掉、被消費然後被忘卻。在一個渴望和他者接觸並不被認為是不好的、政治不正確或是錯誤思考的脈絡裡，我們可以開始概念化並且辨識出渴望影響我們的選擇和加入的方式。

三、邊緣作為抗拒發生的場域

hooks 經常強調政治抗拒的重要性，因為抗拒是個體所能夠最輕易攫取的鬥爭。想要創造一種抗拒的世界觀，不只是作為對抗非人化的鬥爭，而是具有創造性、廣泛的自我實現。然而，光是抗拒並不足夠，個體在抗拒之後的那片空白仍然有其必需成為的樣子—也就是去更新自己。在個體認知到支配結構是如何在他的生命中運作以後，當他開始發展批判思考和批判意識，開始創造新的存在方式，並且從邊緣做出抗拒(hooks, 1984)。

hooks 舉許多當代知名的黑人文學或藝術作品為例，揭露了反霸權的文化實踐(counter-hegemony cultural practice)。許多時候在特定作品中顯示出來的政治議程是反動而保守的，所謂的創作也只是被一個反應出白人至上主義價值的市場所形塑的。因此，具有黑人性並不代表天生就是反抗的，放到更大的脈絡來看，就是指屬於邊緣族群、屬於受壓迫者不代表天生就是反抗的。雖然如此，文化創作的領域仍是關於黑人經驗本質的轉化思考所能發生的地方，其中最吸引人的黑人

主體性的建構是來自作家、文化評論家和猶豫不決於各種努力邊緣的藝術家。

為黑人主體性的建立帶來複雜和多樣性的關於認同的主張通常會被保守的政治力量否定—也就是說，那些藉由將人們標籤為黑人與非黑人來消彌黑人之間的差異的人。不認同或是想要改變黑人家庭社會現狀的人，很快地被指責不夠黑人，而這樣從黑人性的過程中被社會驅逐(social excommunication)遠不只是在家庭層面。相較於這種不希望任何黑人認同流動概念的刻板印象力量，在政治相關的文化脈絡之下面對白人前衛派(avant-garde)更令人沮喪，在這樣的文化脈絡當中，這些所謂的白人前衛派試圖挪用並侵占黑人族群的激進行為，以破壞黑人認同的靜態概念。這樣的挪用一再地發生，它以建立非裔美國人文化的形式，彷彿這些文化的存在只是為了要提議白人族群可能進入的新美學和政治方向，作為白人族群開發新的美學領域的墊腳石。

唯有在白人和第三世界菁英不再試著維持文化和諧，也不再堅持黑人族群是他們所希望的樣子，激進的黑人主體性才有可能被其他人認可。hooks 提到 Cornel West 的一個演講〈De-centering Europe: The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雖然演講內容高度重視智識且是高度理論化的，其呈現的方式卻是近似於在黑人社群中受歡迎的佈道模式，並且在當中被認為是具深度而認真的。在白人機構的脈絡之下，特別是大學，這樣的表達方式卻被認為是受質疑的，正因為這樣的方式讓人們感動。West 不只轉化社會空間，在鮮少認可黑人文化價值的脈絡當中，使黑人經驗的觀點合法化。他也將非學術的聽眾納入，其呈現風格要求觀眾典範的轉換，黑人文化認同的邊緣觀點因而被中心化了。想要了解發生了什麼事，一個人必須有不同的著述立場。這是反霸權文化實踐的一個實例，是一種激進黑人主體性的主張(hooks & West, 1991)。

hooks 認為，黑人族群一定要決定自己的樣子，而非倚靠殖民的回應來決定他們作為主體的合法性。不倚靠他者尋求認可，認可自己並且主動接觸那些會以有建設性的方式接納他們的人。hooks 將邊緣視為轉化發生的地方，在當中解放的黑人主體性可以完全出現，而在壓迫結構強加而產生的邊緣，和一個人選擇作為抗拒場域的邊緣之間，有絕對的區別。

四、後現代黑人性(Postmodern Blackness)

hooks 認為，影響六十年代黑人權力運動的觀點基本上就是屬於現代主義，而黑人族群談論認同議題的一些方式也確實符合現代主義的普遍化議程

(universalizing agenda)。在黑人權力鬥爭進行到後期、幾乎所有抗拒都被抑制而最終佚失之後，許多聲音被政府壓下，必須找到新的途徑去傳遞黑人解放鬥爭的訊息，以及找到新的方式談論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支配政治。而彼時後現代主義尚無法很好地作為種族主義的批判理論基礎，是因為其論述針對的對象正是那些與後現代主義號稱挑戰的大論述擁有共通語言的特定群眾。也就是說，後現代主義是以一種白人的、男性的、學術性的論述而出現，而也就因為如此，其並未能適當地考慮受壓迫者的位置。

若激進的後現代主義思考就是要擁有一種轉化的衝擊，那麼和「權威就具有支配性」這樣的概念之間的批判性斷裂一定不能夠只是修辭層面，這樣的過程必需被反映在論述存在的方式上，包括寫作風格和所選擇的主題等。至於那些被動地接受白人至上主義者思想的第三世界公民、菁英和白人批評家，hooks 認為這些人根本不去注意黑人經驗或是其他相關的事情，也就幾乎不可能去創造能夠挑戰種族主義支配的解放理論，或是促使傳統看待現實、建立美學理論和實踐方式的崩解。

hooks 要求一種後現代黑人性，作為對傳統黑人認同當中的本質主義概念的一種挑戰，而這也正是 hooks 在黑人認同理論當中最大的貢獻之一。亦即去探討，任何種族認同若失去了本質主義的支持，如何可能繼續存在？而若想克服種族主義，種族認同是否必要？hooks 從後現代主義理論的脈絡當中，重新將黑人性理論化，她主要的目標不只是對黑人性的解構和進一步處理，更是在一個遠離本質主義霸權的理論與分析脈絡底下重新定位黑人性。藉由批判本質主義，後現代主義提供了一種方式，能夠將黑人性理論化為差異，而不需要建構差異作為認識論而抱持著一種固定不變的形而上學核心概念。受倫理學影響的差異概念，能夠使一個人尊重差異而非去征服、去支配差異(hooks, 1994b)。

hooks(1995a)認為，後現代主義對「普遍性身份」的批評恰恰有助於重構不同的身份認同，而傳統所謂的族群認同不過是主流文化群體對族群的偏見。後現代主義鼓勵對於黑人性的各種重新詮釋的可能，希望黑人性能夠被重新描述並給予不同的理論輪廓。因為當多樣性被忽略時，看待黑人族群的方式就容易落入兩種類型：民族主義者或同化主義者，或是黑人認同或白人認同。而後現代主義的一個特點正是在於其改變了對認同的看法，意謂著藉此我們必須並且能夠重新定義集體連結的基礎。

後現代關於認同的批評，雖然和革新的黑人解放鬥爭相關，卻經常是以一種

問題意識(problematic)的方式提出。然而，既然存在著一種試圖防止黑人激進主體性形成的白人至上主義政治，我們不能夠就這樣拋去對認同政治的關心。hooks 認為，許多人都在找尋新的抗拒策略，若想要擁有具意義的生存機會，就必須使用去殖民化作為一種批判實踐。在黑人性的建立當中使用後現代主義並非只是尋求挪用他者經驗以增進論述發展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也不應該將差異政治和種族主義政治區別開來。

Cornel West 曾經這樣描述到黑人的集體狀態：「*有越來越多的階級分裂和區別，一方面創造一個顯著的黑人中產階級，高度受焦慮支配、無安全感、願意被吸收進權力中心，另一方面，一個龐大並在增長中的黑人低階層也漸漸浮現，…，我們也有一群垮掉的黑人工業勞動階級。這裡，我們談論的是極大的絕望。*」hooks 認為，正是這種絕望創造了對改變的洞察力和對策略的渴望，能夠為集體黑人解放鬥爭復興精神並且重建基礎。而後現代主義整體而言的衝擊是，許多其他的族群現在和黑人族群有著同樣深的異化感、絕望感、不確定感、缺乏立足基礎的感覺，即使並不是因為相同的處境。激進後現代主義喚起人們對那些共有的感受的注意，這種感受跨越了階級、性別、種族的藩籬，能夠作為建立移情作用有力的基礎－是對共同投入的認同之聯結，並且作為團結和聯合的基礎。

hooks 認為，渴望(yearning)是最適合的字，能夠用來形容一種許多人共有的心理狀態，特別是關係到對大論述(master narratives)的後現代主義解構，那種湧上心頭、充斥著腦海的渴望，正是過去因大論述而噤聲的人們，對於批判聲音的渴望。以黑人族群為例，不意外地，饒舌取代了節奏和藍調音樂而在年輕黑人族群當中的佔據了首要位置，並且開始變成下層階級的一種「宣言(testimony)」。因為它讓下層階級年輕黑人擁有一個批判的聲音，就像是一種普遍知識。hooks 深信後現代主義以黑人的聲音說話的重要性，並堅信後現代主義思想能夠將黑人從狹隘的黑人性概念所帶來的壓迫當中解放出來。hooks 試圖整合黑人性和後現代主義的這種越界的行為，幫助遠離了將黑人性視為永恆的或是一種真實存在這樣的想法。hooks 理論的越界，開啟了架構在幻覺與可塑性的認知空間當中的混和黑人性出現的可能(hooks, 1990)。

饒舌音樂是非裔美國人所創造的文化商品，吸引了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關注和討論。很少為人所知的是，黑人族群所創造的其他形式文化商品其實受到更多的監控與限制，像是文學作品、批判著作等。編輯和出版社企圖控制並操縱什麼代表黑人文化，以及對於能夠吸引最大觀眾群的商品創造的渴望，以一種能夠造

成重大傷害並且令人窒息的方式限制了黑人族群認為自己所能創造的著作，且仍能得到認可。hooks 以自身為例，說明其許多著作，即便是具有後現代的對立感性(oppositional sensibility)，是抽象的、片段的、非線性的敘述，卻持續地被出版社拒絕。缺乏觀眾的黑人文化創作者很多，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後現代思想家和理論家必須使自己成為這些觀眾，他們必須在批判寫作的空間當中確立權力和優勢，以使其更具包容性。因此，後現代批判論述的實踐必須實行一種後現代主義的抗拒。這種介入的一部分，就是黑人知識分子應該被納入其中(hooks, 1992)。

後現代文化，有著其去中心的主體，可以是連結被切斷的地方，或者提供讓新的、不同形式的聯結發生的情境。撕裂(ruptures)、表面(surfaces)、脈絡性(contextuality)等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間隙，提供對立實踐的空間，其不再要求知識分子被狹隘的、和每日生活的世界沒有實際連結的區隔範疇而限制。許多後現代主義的表現出現在論述存在方式、藝術表達形式、學術領域的同時，也影響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美學。在文化層面，可以和未受教育的窮人、低下階層黑人產生美學的批判對話，可以談論我們看到的、想到的、聽到的東西，並存在批判交流的空間。去思考、寫作、談論、以及創造能夠反應出對流行文化的熱切參與之藝術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因為這可能正是未來抗拒鬥爭發生的地方，是新的、激進的事能夠發生的交會處。解構權威主體論述，也就為「他者」提供發聲的空間。存在於邊緣文化的交界處，擁有綜合的身份認同，克服多重邊緣身份的侷限，對不同的文化身份進行全新的詮釋(hooks, 1990)。

五、喜愛黑人性

大部分非裔美國人都認知到探求自身主體性的重要，但卻有許多人並不真的喜愛、甚至不接受自己所擁有的黑人特質。hooks 舉其一次課堂討論為例，許多自稱激進前衛的黑人，實際上卻深受白人至上想法的影響，對於黑人自我仇恨的議題如此著迷，反而對「喜愛黑人性」這件事不感興趣。這個社會上的多數人並不願意承認黑人性作為象徵在白人的公眾想像當中喚起了仇恨與恐懼。姑且不論公民權鬥爭、六十年代的黑人權力運動以及像是「黑色是美麗的」這樣的口號，多數黑人群眾持續地被媒體和非進步(non-progressive)的教育系統給社會化，內化了白人至上的思想和價值。沒有持續的抗拒鬥爭，多數黑人也就無法具備能夠確立與頌揚黑人性的世界觀。而這些確立的儀式若是和尋求轉化社會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分隔開來，則其也很難介入白人至上主義的社會化過程(hooks, 2003b)。

許多思想家會質疑 hooks 後現代黑人性計畫的成功，理由是其對於後現代黑人性的支持和信奉「黑色是美麗的」這樣的口號相衝突。hooks 雖然支持這樣的口號，但是她並不將其詮釋為偽裝的本質主義，而是認為其標示出一種激進的政治立場，符合後現代黑人性的倫理學要點。hooks 不贊同將黑人性作為白人性的倒置來建構，像是某些黑人族群拒絕白人至上的假設，卻又以黑人至上的概念作為替代就是一個清楚的例子。hooks 認為「黑色是美麗的」這樣的口號應該被用來當作解構黑人刻板印象的政治舉措，所以這樣的口號絕對不會是保守的，反而應該是分裂性的(disruptive)，能夠介入並做出改變。

hooks 將認同視為一種流動的、多元的並且開放的概念，而她所主要關注的正是增進一種主體性的激進概念，這樣的概念是來自於存在模式的無限可能性。這種對開放性、多元性的堅持，hooks 不願意被特定的研究觀點侷限，更不願自己的聲音受到侷限，認為主體性應該擁抱現實當中的所有衝突層面，其認同更是必須抗拒壓迫和閉鎖。出自種族隔離脈絡的對立黑人文化提供了去殖民化的空間，在當中喜愛黑人性成為可能。而發生在白人至上主義脈絡當中的種族融合，則默默侵蝕了抗拒的邊緣空間，因為他們假定，不需要任何對黑人族群的文化態度方面的改變，就能達到社會平等。

美國社會傾向於將種族主義視為個人的問題，並且普遍認為只有個體能夠是種族主義者，許多時候卻忽略了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深植於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當中的方式。在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裡，所有事物都是被殖民化的，而太多時候種族融合就直接意謂著同化，意謂著面對白人至上主義體系而不去挑戰它。正是在這樣的脈絡裡，hooks 的聲音顯得特別具預言性。喜愛黑人性是一個革命性的概念，白人至上主義建構了以厭惡黑人性為基礎的社會體系，黑人族群一直被鼓勵憎惡自己。在自由反種族主義的脈絡當中，提倡的是裝作種族認同並不存在，喜愛與肯定黑人性是一種禁忌。喜愛黑人性就是在解構並挑戰使黑人性成為負面概念的系統，並且也是去重構黑人性成為美麗的、正面的並且人性化之想法的過程(hooks, 2009)。

六、黑人族群當中的階級議題

階級當然有關係，hooks 強調，而種族和性別總能夠將注意力從階級政治所揭露的殘酷事實當中轉移開。以黑人解放鬥爭運動的發展而言，種族是探討一切

議題的根本，是必須最先被考慮的因素，而階級的重要性與影響就自然而然地被埋沒了。然而，hooks 認為，想要有意義的討論種族主義，就不可能不去談論階級。從黑人發展的歷史上來看，姑且不論隔離和法律上的種族隔離，在黑人社群當中，從二十世紀開始就出現了明顯的階級區分。

隨著後殖民時期白人剝削與壓迫的加劇，種族團結成為一種定式，而種族地位提升的邏輯意味著在社會階級最底層的黑人被鼓勵以欣賞與尊敬的眼光看待那些已經取得階級權力的同伴們。在那樣的日子裡，那些極少數的優勢階級黑人並不被視為勞工階級窮困黑人的敵人。反之，他們成為了一種模範，證明每個人都有翻身的可能。這種團結的感覺直到一個根基於階級的民權運動發生以後產生了轉變，這個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為那些已經具有某種程度的階級優勢的人取得更多的自由。到了 1960 年代晚期，立基於階級的種族融合破壞了過去不分階級的種族團結。這些中上階級黑人族群和主流白人文化同化，搬進白人為主的社區，將他們的錢和產業搬出隔離的黑人社區。

對白人支配的社會來說，取消隔離制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能夠減弱民權運動與黑人權力運動時期所產生的集體激進化。比起讓一群可能領導黑人族群進行抗爭或文化革命的激進的「精英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出現，他們寧可給予優勢階級的黑人更容易進入現存社會結構的途徑。同時，國際政治上的變化顯示出白人必須和有色人種進行交易，以維持美國的帝國主義經濟支配。過去的殖民主義無法形成基礎、支撐現代的經濟全球化，也因此新世代的白人必須學習以新的、不同的方式和全世界的有色人種產生聯繫。因著這些考量，種族融合勢在必行。這也就創造出一群新的優勢階級、向上流動的黑人族群。經過長久地掙扎，到了六十年代末，自由的個人主義已經成為黑人族群的新標準，特別是黑人中產階級。

hooks 認為，一個蓬勃發展的、墮落的「精英十分之一」族群不只作為提倡個人主義和黑人資本主義的權力破壞者而出現，他們最大的商品就是「販賣黑人性(selling blackness)」，他們確保將這些目的掩飾的很好，使黑人資本主義看起來就像是黑人自決。不論是電影獲文學作品，很明顯地多數黑人優勢階級族群並不認為自己和那些黑人窮人有什麼共通點。透過各種方式，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黑人族群創造一種生活方式，讓他們能夠盡可能地減少和殘酷的種族主義的接觸。許多優勢階級黑人僱用白人下屬作為他們和種族主義的白人世界之間的中介。另外，同化也是另一種讓種族主義遠離他們並加諸到其他黑人身上的策略。

hooks 談論到向黑人學術界和知識份子提出階級的重要性，建議應該多花時間討論黑人族群當中的階級差異。但是當中許多人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大多數人最不願意承認的是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的視角與立場，而這種拒絕似乎是根植於階級特權的歷史。一直以來都是那些特權階級的黑人，像是作家、藝術家、知識份子、學界精英為一切黑人文化的公共話語制定議程，而在制定的過程中鮮少將階級問題提出來探討。這個群體當中存在著一個不言自明的假設：我們都渴望成為上層階級，而這個群體當中的每個人也都應該如此。相較於白人，談論階級對黑人族群來說可能更加困難，因為認知到階級差異擾亂了種族主義以同等程度影響所有黑人這樣的想法，並且影響了黑人之間的種族團結幻想(hooks, 2000b)。

第四節　bell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與限制

雖然 bell hooks 並不將種族置於其討論的絕對優先位置，甚至許多時候是將種族因素列為其理論當中影響較小的部分，刻意壓低其重要性。然而，hooks 也從來沒有忘記提醒人們，種族影響一個人看事情的角度和觀點的影響之大。其反種族主義理論更是經過深刻的反思，從自身經驗出發，並且為處在最邊緣的黑人女性發聲。hooks 著重在探討種族、階級、性別三者作為相互影響的架構存在的方式及其發展，以下將分析探討 hooks 反種族主義的重要性與影響，以及外人珍對 hooks 反種族主義所提出的限制與批評。

壹、 bell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重要性與影響

一、理論脈絡的交織與梳理

hooks 的種族主義理論的中心議題之一，即為他者性的商品化。特別是在討論黑人女性身體時，hooks 敘述自己的觀察：只要白人美國人仍然是較關注擁有受害者焦點黑人認同(victim-focused black identity)的黑人族群，典範的轉移就很難發生。hooks 的激進黑人主體性概念試圖創造一種空間，在當中不同的、肯認的黑人主體可以給予黑人女性聲音和力量。

因為 hooks 的主要目的，是為黑人女性或其他有色人種女性開闢自我定義的空間，他點出了主流性別批判的限制，認為這些批判的對象大多屬於於中上階級、受過大學教育、已婚的白人女性。hooks 致力於擴展女性主義運動的範疇，儘量

讓這些「他者」女性被看見。他們無力改變生命中的種種情況，他們是沈默的大多數，接受命運的安排而不去試著提出任何具體的疑問，不進行有組織地抗爭，作為一個群體也沒有產生集體的憤怒。這種沈默點出了他們歷史性的商品化過程，差異被商品化，他者性被侵蝕、消費並且被遺忘。

雖然白人族群將他們與黑人女性身體的接觸視為非暴力的、非種族主義的行為，hooks 卻認為這樣的行為遠比表面上看起來的更危險，因為往往會造成一種錯誤的信念(bad faith)，讓現狀持續，而且這種錯誤的信念不只在白人，在黑人身上也是如此。在白人錯誤地將黑人女性身體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當作一種容忍的同時，黑人女性也可能錯誤地將這種色情化當作一種接納。在理論上清楚地澄清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的行為很可能被誤解，認為那些過去被忽視、無法被看見的邊緣化他者是能夠被強調他者性所迷惑的，因為這種商品化的行為給予他們認可與調解的承諾，也就是說，邊緣化的他者可能被誘惑，相信來自白人父權社會的注意是一種對其主體性的肯認。hooks 澄清這樣錯誤的信念，認為藉由商品化而帶來的注意力對黑人女性身體只會更加確立其邊緣化他者的位置。

另外，hooks 也澄清了關於黑人是否應該透過完全的從白人父權制社會當中隔離開以提升地位這樣的想法。黑人權力運動時期的黑人民族主義者，正是以此為核心發展理論與進行行動。hooks 認為這仍然是一種誘惑，對黑人族群而言，這麼做輕則造成錯誤引導，重則是對黑人歷史與經驗的否認。黑人民族主義不是什麼批判抗拒的表現，反而是一種無力感(powerlessness)的展現。因此，hooks 強調論述在轉化黑人主體性的過程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雖然 hooks 自己並沒有在著作中明確的指出，他的著作其實廣義來說是符合論述分析的。論述分析的角色是去解構黑人性的錯誤概念，幫助我們看到那些讓既存陳述成為權威或真實的機制性條件及權力結構。也就在了解特定論述的功能後，了解支配與臣服、對立與抗拒的作用後，光是對於壓迫論述的一種智識上的批判是不夠的，hooks 認為應該超越對權力、支配與臣服的批判，走向一種挑戰現狀的解放實踐。

hooks 是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卻被與非洲中心主義批評家的稱號隔絕開來，因為其所感興趣、所關注的焦點在黑人生命歷程，拒絕在歐美文化、生活脈絡底下以對立的競爭關係看待黑人生活。hooks 對黑人文化的混合性並不擔憂，並且認為沒有必要抵制白人的影響，或是隔絕白人文化元素。hooks 試圖批判地檢視黑人性，但卻不接受任何形上學的或本質論的概念形式。他的目標是提升一種對黑人性在倫理學上注入的概念，一種對他者和差異做出回應的概念。後現代對女

性主義的解構一直是「所有個體都是不同的(Everyone is different.)」這句話的實現，而最早打破女性之間假定的同質性以及利益的共通性的就是像 bell hooks 等人的黑人女性。

hooks 從種族、性別、階級三個角度去理解黑人性的複雜內涵，然而，hooks 的批判參與是規範性的(normative)，因為他試圖打亂支配的結構邏輯，警告我們注意那些支持著支配體系的非 A 即 B 的思考方式。而不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參與種族與性別的議題，進步的思考者更應該堅持他們的經驗在一個種族主義且性別主義的社會當中之複雜性。hooks 拒絕黑人族群任何形式的單一建構，對於黑人認同最好的處理方式是非裔美國人集體地認知到不會有單一的黑人社群，也不會也規範性的黑人認同。hooks 拒絕任何形式的商品化，因此就創造了能夠開始檢視有意義的、正面的黑人認同的空間。

hooks 不只是批評女性主義當中以白人女性為主的種族主義歧視，也點出了黑人族群當中的性別主義歧視議題。以 hooks 所身處的學術界為例，儘管黑人女性在黑人社群當中作為教師、思想家和文化理論家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卻很少被提及。大部份黑人一聽到「偉大的思想」，聯想到的就是黑人男性。性別主意對女性本質的假定，認為女性天生就是要無私地為別人「服務」，許多黑人女性也將這種服務的想法內化，認為他們應該隨時隨地準備好滿足別人的需要，不只是白人世界，黑人社群當中也對他們抱持著這樣的期待。hooks 認為，正是這樣的本質假定成為了阻礙黑人女性成為知識份子的主要因素，因為知識份子的身份並不被當作一種無私的工作，其獨自思考、單獨參與的特質正好和黑人女性所承擔的身份相悖。

二、跨越邊界的書寫

hooks 的對話體批評主要採取黑人方言與標準英語、大眾用語和學術用語、非主流話語和主流話語相互揉合的敘述方式。對黑人方言的重視始於其大學時期，在包括學生與教師皆為白人的 Stanford 當中，hooks 堅持使用非主流的南方口音。成為教師以後，hooks 繼續嘗試使用方言教學，也鼓勵學生用方言參與課堂，再將其翻譯成標準英語。一開始多數學生對於在課堂上使用方言感到十分困惑，但 hooks 認為「學習傾聽不同的口音、傾聽不同的言說方式，挑戰了我們必須同化—及使用單一相似的話語—的觀念，尤其在教育機構當中，語言反映了我們出身的地方的文化，使用自己獨特的口音，是連結逐漸遠離的過去的方式。儘量多學習

和使用不同的語言是必要的，對黑人尤其如此(hooks, 1989)。

hooks 的批判語言在學術界是獨樹一幟的，和日常生活緊密連結是其一大特色。從他的第一部著作開始，就採取不使用腳註(footnote)這種迴異於傳統學術慣例的風格。hooks 自述自己走訪了許多黑人社區，並且和許多學術界的黑人討論，發現黑人社群當中，多數人只要遇到書中使用腳註的話，立刻就感覺這本書是給學術界當中的人讀的，並不適合他們。因此，hooks 開始思考一種「非常個人化、公開表明政治立場」的寫作策略，試圖超越知識份子的界限，將學術推向一般大眾。對此他進一步解釋：「不是我們作為知識份子不允許越界，而是學術界當中社會控制的力量，給了那些試圖用各種聲音向大眾講話的人很多壓力，阻止我們和不同人群的交流(hooks, 1999)。」

hooks 的寫作風格儘管獨特，也受到許多爭議，最常見的批評就是這樣的寫作方式缺乏學術價值。hooks 並沒有為自己的著作是否具有學術價值做太多的爭辯，其所關注的是如何使黑人方言和非洲文化滲透普遍被接受的主流話語，對改寫所謂的標準英語。正如同 hooks(1999)所自述，他的語言是一種多向度的模式，其聲音「包含了許多種類—學術語言、標準英語、方言、街頭語言」，使讀者很容易走進他所建構的意義脈絡。

hooks 認為，理論只能在知識份子和/或學者之間對話是一種錯誤的二分法，這樣「*就不能和大眾講話，但事實上，我們做選出選擇，我們選擇想聽到的聲音和不想聽到的聲音，如果用一種不被理解的語言講話，就沒有對話的機會。…當我們越過階級和種族的集體經驗的界限，進入階級森嚴的父權制機構時，我們也就逐漸與壓迫者同步，因著環境壓迫而失去批判的意識。我們必須警惕，到底在向誰說話，是誰聽到我們的話語、被我們的話語所感動與激勵是重要的*(hooks, 1989: pp. 78)。」

針對黑人女性無法將其話語理論化的指責，hooks 認為，理論/經驗的二分法本身即存在著危險。因為，實際上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家在理論的建構當中援引經驗，並不是就「拋棄」了理論，而是對於歷史上某些知識的邊緣化過程進行更透徹的檢視。當理論轉化為意識形態，就成為了思想的牢籠。本來是源自對周遭事物的知覺，卻變成超脫知覺的更上層的想法; 本來是據自身構成經驗，卻變成根本不觸及經驗; 從反對否定真理的疾呼開始，卻變成反對任何不符合其規範的真理。一開始是一種解放的理論，卻開始受到新的解放理論的威嚇(hooks, 2000) 。

對話體和非洲口述傳統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口述傳統是非洲文化的特色，

最重要的一點是著重說者和聽者之間的回應關係，由說者和聽者之間自發的言語和非言語交流構成，這種黑人話語模式普遍存在于非裔美國人的文化當中，互動的基本要求是每個人的積極參與，為的是測試和驗證觀點。說者和聽者並非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而是平等的參與者。Collins(1991)指出，對話體作為一種自足的批評方法，有其非洲中心主義的根基，其不同於西方非此即彼(either/or)的二元對立思維，而體現了非洲整體和諧的世界觀。hooks 認為，黑人女性批評家採用這種認識論也和黑人女性的處境有關。由於黑人女性的生活狀態處在邊緣，於是產生了一種看待現實的特殊方式，他們從外往裡看，也從裡往外看，既看中心也看邊緣，兩者都有所了解。這種世界觀提醒了黑人女性整個宇宙是作為一個邊緣與中心構成的主體而存在(hooks, 2000)。

三、寫作作為一種道德與價值評斷

hooks 積極地進行社會參與，彰顯了藝術再現中政治性的重要與必要，並且在寫作中一直實踐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家的政治訴求。他不認同寫作必須是客觀中立的，反之，應該是每一部作品都要有一個政治立場，不管這種政治立場是如何嵌入在作品當中。從這個觀點來看，hooks 的著作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政治批評，他強調一種意識形態的滲透。對他來說，沒有脫離價值判斷的批評，任何批評的過程中，選定立場是必須的。作為知識份子，應該具有道德和價值評斷的意識，不能夠忽視研究中的政治議題。而談論到著作中的道德評斷，就不得不進一步討論 hooks 的自傳體寫作方式。

黑人女性的自傳體寫作，是黑人女性文學傳統的重要體現。而作為與自身密切相關的寫作，不可避免地會有牽涉到作家個人生命歷程的問題，可以說這是多數黑人女性作家無法迴避的問題。hooks 認為，在倫理與道德傳達的範圍內，黑人女性的自白性寫作既可以揭露黑人社群的真實狀況，暴露種族主義階級制和性別主義歧視對黑人的剝削，也可以表達黑人女性作家對種族、性別和階級議題的政治性思考，對其介入社會現實的鬥爭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hooks 很看重講述自己的經歷這樣的寫作方式，並指出，「學院的教育使我們增長了寫作和分析的能力，卻使我們的注意力從個人經歷上轉移開來。如果我們想了解周遭的人，如果我們想要與和我們相似背景的人產生聯繫，我們必須明白，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確認與聯繫的方式(hooks, 1989 : 77)。」

一定要注意的一點是，hooks 在面對黑人女性的自傳體寫作時態度是特別謹

慎的。因為黑人女性在白人支配的社會中被塑造的刻板印象，一直是白人社會大眾所關注、感興趣的焦點。黑人女性的自傳體寫作當中經常富有挑釁意味地揭露其所受的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傷害，這是一種具革命性的舉措，卻也正好是這些情色與暴力的描述，滿足了白人社會對原始性的窺伺心理。

hooks 也探討了黑人女性作家在這種情況下的兩難，充滿暴力與情色的自傳總能獲得主流出版業及讀者的青睞，隨之而來的金錢與名譽促使他們緊跟潮流，一次又一次地把個體的「我」推向前台，寫作中的反叛與革命性也漸漸消解。hooks 強調，寫作不是純粹私人的事情，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為了打破黑人女性的沈默，是一種抗拒的方式。他鼓勵學生多欣賞注重寫作技巧的作品，尤其寫作自傳體時，一定要注意不能自我放縱，更要拒絕出風頭，考慮能夠最好地使用語言傳達各種真理意涵的方式(hooks, 1999)。

貳、 bell hooks 反種族主義理論的限制

一、 與黑人傳統社群生活的衝突

hooks 是一名無所畏懼的學者，強調「發聲」的重要，他的聲音是具挑戰性的、具爭議性的，對於議題的批判直接而一針見血。然而，具破壞性的言論總是較容易引起恐慌，hooks 探討的種族主義觀點，在黑人社群當中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存在著。以 hooks 批判教會在黑人自我認同建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例，在黑人社群當中，教堂一直是社交生活的中心，而基督教/天主教信仰更層層環繞、形塑了黑人族群的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在黑人權力運動傳統當中，運動的領導者也經常是出自教堂，可見教會生活是黑人社區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當 hooks 批評黑人教會對男性與女性角色的不公平分配和對待，可想而知引起了黑人族群當中不小的波瀾。

hooks 的自傳式寫作也對於黑人社群帶來威脅，自小生長在種族隔離的南方，hooks 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一切，包括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甚至是街頭文化，都是許多黑人共同的回憶，也是塑造黑人文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而 hooks 平實但毫不保留的批評，讓許多擁有同樣經歷的黑人受到很大的震撼，許多人的反應是難以接受，即便感到認同也去否定這樣的情感。黑人族群鬥爭的過程中一直強調團結，黑人作為一個整體、擁有共同的理念是核心要旨，在對抗所謂的敵人—也就是白人族群時應該口徑一致。也因為這樣，黑人族群對於任何內部批評也特

別敏感，幾乎不容許有不贊成的態度出現，就算有異義也不應該表現在黑人族群之外的其他地方，因為這會讓他們顯得「脆弱」、「容易攻擊」。

二、與黑人大眾流行文化的衝突

hooks 不只是對白人的極權主義者或女性主義者進行批判，對非裔美國人當中的男性激進份子，不論是學者或是媒體工作者，也有許多批判的聲音。hooks 一直持續關注與批判知名電影導演 Spike Lee 的作品，在他的電影裡黑人男性的再現經常是以消費黑人女性或拉丁裔女性來達到的。在某種意義上，Spike Lee 是第一個將城市貧民區(inner city)以多元文化的方式呈現的主流導演，美國主流社會當中許多人是透過 Spike Lee 的電影來認識黑人社群的。在其早期所作且經常被提及的“Who’s Pussy is This”一文中，hooks 批評 Spike Lee 在 She’s Gotta Have It 當中的女性再現，認為在當中借由將黑人女性放置在陽具中心主義的凝視，複製了主流電影界的父權制實踐，他將對白人女性的物化移轉到黑人女性身上，因此也讓他成為好萊塢電影經典當中最佳的黑人候選人。

Spike Lee 對黑人社群而言是英雄一般的存在，其被塑造成白人電影工業圈外人的形象，一個不斷努力奮鬥的人，作品目的在反對白人支配集團的願望和訴求。其支持者，不論是來自學術界或街頭，毫不留情地對任何抱持著「非讚揚態度」的評論進行審查。對其所拍攝的黑人文化電影進行嚴厲批評的黑人必須承擔風險，不是被視為種族叛徒，就是被視為不想看到其他黑人成功的卑鄙競爭者。在這樣的氛圍底下，創作和黑人有關、或是描述黑人文化的作品，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被冠上黑人民族主義的意涵，對黑人族群的讚揚就是對白人族群的批判，反之亦然，這樣的二分法幾乎排除了內部批評的空間，而這也是 hooks 對黑人作品的文化批評很難不引起爭論的主要原因，「叛徒」、「憤怒的知識份子」這樣的稱號不絕於耳。

hooks 另外一個引起很大爭議的論點是對歌手 Beyoncé的批評，在一場關於解放黑人女性身體的座談會當中，hooks 稱 Beyoncé為一名恐怖分子與反女性主義者，引起軒然大波。這個引起熱烈討論的描述是針對 Beyoncé為時代雜誌「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主題而拍的雜誌封面，在這個封面照片當中 Beyoncé僅著內衣、眼神迷茫地盯著鏡頭。對於這名世界級流行歌手在雜誌中所呈現出來的形象，hooks 表示不認同：「從我個人解構的觀點來看…他在這裡作為共謀者共同建構自己成為一個奴隸的形象…這並不是一個解放性的形象。」針對這樣的評論，

許多人認同 hooks 的觀點，認為在主題為「最具影響力的人」時呈現的形象卻是像小孩一般的、脆弱的、容易遭受暴力侵害的，似乎會對大眾、特別是青少年造成負面的影響。但也有人認為 hooks 這樣的批評是預設了「什麼樣的穿著適當什麼樣的穿著則過於暴露」的標準，本身就違背了女性主義的意涵; 或是認為使用恐怖份子(terrorist)或是反女性主義者(anti-feminist)這樣的字眼本身就含有暴力成分，當中責備的語氣過重，並不適當。

hooks 一直自詡為一名公眾學者，對流行文化的批評不是一次兩次而已，然而當探討的主題牽涉到像 Beyoncé這樣的流行天后，引起的迴響就放大了許多，也很容易被斷章取義或是進行片面的解讀。當然，批判流行文化一個附加的價值/代價就是容易引起大眾的注意，像是 Cornel West 稱 Obama 是「世界的 George Zimmerman」此一論點，引起大眾爆炸性的爭論至今仍未休止，引起的注意多，引起公共討論的可能性也就大了，這是像 hooks 和 West 這樣的公共學者希望達成的效果之一。的確，在某些層面上，對於各種壓迫體系持續地進行相互關聯的分析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來說，媒體又經常讓人很容易能夠指出關於性別、種族、階級的偏見、歧視和各種剝削的模式。然而，媒體傾向於塑造便於投入和相信的形象，這些形象是方便的、也是簡略的，往往是簡單幾句描述就「跳到結論(jump to conclusion)」的。hooks 一直強調發展相互關聯的錯雜網絡，不只是在個體和群體當中，也是根據大眾媒體造成的不同形式的壓迫，試圖找出抵抗的方法。這樣的過程對 hooks 而言是必須的，即便這代表了他的任何論點都可能成為各方抨擊的目標。

第五章 bell hooks 的教育觀和種族與性別的交互關係

第一節 bell hooks 的教育觀

hooks 專論教育的著作有三本，分別是《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Teaching Community: A Pedagogy of Hope》以及《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Practical Wisdom》。《Teaching to Transgress》一書是 hooks 在台灣最為人所知的著作，也是一般在談論 hooks 的教育理念時會直接聯想到的。這是 hooks 的第一本教育專著，從影響其生命發展深遠的批判教育學、入世佛學、多元文化主義和女性主義的角度，開展其著名的「交融教育學」。如同其書名所指出的，本書的中心概念在「跨界」，從刻板印象的跨越、師生關係的跨越再到學術審查標準的的跨越等，批判並挑戰各種傳統的、既定的不合理界線。另外，沿用 Paulo Freire「教育即自由的實踐」的概念，試圖連結理論與實踐，並透過己身教學經驗的描述，提供教學者與學生實踐教學行為的參考。

在《Teaching Community》當中，hooks 聚焦討論如何創造批判的教學場域，能夠去除壓迫並且建立跨越種族、性別、階級及國界的社群。他挑戰了教育就應該被限制在教室當中的概念，批判學生不應該只是不停被填裝的容器，教學也不應該是為了考試，而是為了傳遞讓社群有更好發展的相關技巧。總體來說，這本著作試圖揭露延續壓迫體系的機制，突顯個體和群體為了改變這些體系而做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讓教育家和學生能夠朝向建立社會公平的社群而共同努力。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則是 hooks 最晚近的著作，因此書中探討的重點也加入更多當代的教育議題。當中 hooks 回應了群眾在其前兩本教育專著出版以後提出的疑問或是希望進一步探討的主題，涵括範圍既深且廣，並且更多地舉了教育現場的實例作解釋或證明。透過反思與觀察，hooks 試圖找出一個複雜平衡，讓我們能夠從當前仍占多數的、帶有某些歧視與偏頗論點的著作中找到值得學習的價值。另外，如同本書標題所言，hooks 認為批判思考是將教育付諸實踐、發揮其轉化力量並最終取得真正自由的關鍵。以下根據 hooks 的三本教育專著，首先介紹 hooks 的教育理論基礎「交融教育學」，並據此分析其教育觀的發展及其內涵，主要聚焦於其觀點當中的種族與性別立場，以及立基於這些立場而產生的教育方法。

壹、交融教育學

相較於批判教育學和女性主義教育學，交融教育學有更高的要求。交融教育學是一種全人教育，必須提供學生全面性的安適，而這也意味著教師必須積極投入於自我實現的過程。也就是說，教師若希望學生能在教學中讓學生全人地被增能，自身就必須先達到全面性的安適。hooks 以自身求取知識的經驗為例，認為大多數時候大學教育並沒有達到以知識實踐自我的目的，而是將知識的習得與實踐分隔開來，身心二分，精神與靈魂的整全也不受到重視。知識本身遂成為大學殿堂裡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價值。hooks 提出交融教育學，結合了自身女性主義理論與反種族主義理論，並且舉實際教學經驗為例相互呼應。

hooks 的交融教育學理論當中蘊含了她的女性主義理論、種族主義理論與階級制理論中許多關鍵要素，為達成其理想的無壓迫自由教育情境，必須了解其理論的架構與脈絡，並且在真實的教與學過程中實踐其教育學方法。根據 Florence(1998)歸納出的特點，交融教育學的內涵主要包括：「知識的再概念化」、「連結理論與實踐」、「學生增能」、「多元文化主義」以及「熱情的體現」。

一、知識的再概念化

hooks 將教室中知識作為權利的表達的方式分為「知識概念化」和「知識傳遞的方式」。一個教育者對知識的觀點深刻影響他的教學方法，而認知到知識的暫時本質(temporary nature)就意味著必須建立一種對立於傳統的師生論述，這一種師生論述賦予了議題權威性，同時知識傳遞者支配了知識接收者以及學習的過程。因此，在學習者參與的提升與團結背後，更重要的是權力重分配的議題。

在 hooks 的觀點，要首先必須辨識出深化白人極權分子、父權制及資本主義價值系統的方式，此方式包括「知識基礎(knowledge base)」與「課程(curriculum)」。hooks 批評官方知識中強調知識的中立性與客觀性，認為這個論述否定了人的主體性，反而使得既存的支配不可能消失，學習遂成了一味的堆積「事實」。在官方知識底下，社會被要求「在一個使支配、壓迫與剝削合法化並且給予特權的回憶，與一個讚揚並肯定對等性、社群與交互關係的回憶之間做選擇(hooks, 1994b)。」hooks 主張多元文化主義和女性主義裡的多元參照，認為唯有學生在學習中成為了完整的主體，才能促進學生主動參與知識的建構。而教學者的工作，就是「轉化」傳統的教育基準與實踐，並創造讓教與學的過程更加動態、更加令人興奮、

也更加有意義(hooks, 1994c)。

二、連結理論與實踐

將理論和實踐分開會導致對社會現實非批判性的反思被具體化與發揚。hooks 認為，藉由加深理論和實踐、理論和學術、理論和大多數學生的生活現實三者之間的隔閡，這個過程使階級菁英主義永存不朽。在面對爭議性議題，如種族、性別和階級偏見時，官方知識強調政治中立，盡力讓教師免於去處理這樣的爭議性議題，而只要傳遞官方的、標準的、中立的知識；但是這樣的教學方式會誤導教學者所選擇的課程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風格，並使當中充滿意識型態和政治符號。

hooks 強調官方知識會使支配階級學生獲利，並強化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係，而交融教育學，就是在獲致已存在的知識之外，也能建立教育場域內外大多數學生所面對的爭議性論述。hooks 堅持理論和實踐的內在連結，理論提供分析經驗的場域，但實踐也同樣的重要。透過實踐，理論被使用以評估其應用性與有效性；而透過理論，邊緣族群得以說出他們的經驗，並探索能夠向大部分學生訴說其關注議題的策略。連結理論和實踐的過程讓存在於白人極權主義的、父權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架構當中的歧視因素可以被質疑。交融教育學就是要打破傳統精英教育中學生的屈從與疏離，創造教與學生多元經驗、多元聲音的教育環境。

三、學生增能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能夠透過建立學習社群使學生參與在課堂討論當中，並將課程內容與學生經驗結合，以達到學生增能的教育理念。hooks 發現，雖然教師的確會受到標準化的學校政策與實踐的限制，但教師更常是出於「安全」的理由而採用傳統的教育模式，使學生無法從學習當中增能。在傳統教室中，差異被抑制而階層關係被強化，而學習社群提供了一個與傳統教室不同的模式，在學校中利用學習社群可以避免落入壓迫的階層制關係，透過增能和重視師生雙方的貢獻，尊重個別差異。教室成員承認彼此的存在並且接受對於議題不同的觀點，因而豐富並增進了學生對於主題的整合。

hooks 主張學生個人經驗被納入教學討論，雖然有些教授反對個人經驗被帶入教室，認為這樣會打擾教室教學，讓教室因為教授與學生爭奪權威(authority)而陷入混亂，hooks 卻有不一樣的觀點。交融教育學要求一種對教學的理解，超

越劃分的學校教育，將教學角色延伸到不只是單純的信息共享，更是全人的學生參與。

此外，hooks 也補充到，肯認學生的存在與觀點的確有許多的好處，但並不是所有學生都準備好接受交融教育學。有的學生對於解放的教育充滿熱忱，有的學生則回以憤怒和焦慮的情緒，將其視為對自身既存的傳統知識價值和教室階層制的威脅，有的學生就只是感到好奇而非真的有興趣。hooks 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多數學生被訓練為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因此對他們而言這樣的教育方式也是較為「安全」的，如何打破這樣的「安全的預期」，將會是實際執行交融教育學時一個艱難的課題。

四、多元文化觀點

許多自身文化特質並沒有反映在學校或社會主流文化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感覺疏離，因此，hooks 強調教室中多元文化的呈現與互動，讓學習社群中每個人的聲音都被聽見，讓他們的存在都被承認與尊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除了幫助邊緣族群學生增能之外，更能幫助發展學生之間的合作與凝聚力(hooks, 1994c)。hooks 認為，文化支配是一種普遍情形，因此，讓社會認知到多元表達和重新定義的必要。確保論述中多元觀點的呈現，在開放的精神之下肯定共享、鼓勵差異，才有可能使學生在生活與智識上皆獲得改進。

hooks 承認交融教育學需要教師比起在傳統的講課方式中付出得更多，她同時也承認，包括她自己在內的許多教師都還沒有真正具備一種能力去適應階級背景差異、語言差異、理解程度的差異、溝通技巧的差異。因為在師資訓練課程中，多數教師受的訓練仍是單一的教學法與價值，而正因為師資訓練的不完全，教師在「知識」傳遞上的選擇就至關重要。教師還有選擇，就有達成轉化的可能。

五、熱情的體現

hooks 認為，教室中學習社群的熱情非常重要，而要引發學生的熱情首先就是要營造令人興奮的教室環境和學習氛圍。對學生而言，形成一種整體的教育，取代傳統分割的教育，就是破解教室中階層制權力關係的方法。hooks 認為，過去在教室中造成學生學習興趣低落的主因，就是競爭的、強調個人的、只注重科目內容與成績表現的學習環境。hooks 反對西方傳統知識論中的身心二元論，認為學習情緒的快樂與興奮、以及學生全人地投入對於學習過程皆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hooks 也強調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應該建立包含生活和經驗的個人圖像。知識必須是整體的，也就是除了標準知識，更應該涵蓋學生作為人的情感與價值。傳統教學方式讓學生成為片段知識的接收者，學生和教師都對學習過程無法產生興趣。讓不同經驗背景的學生都得到認同，這樣的教學方式所產生的凝聚力來自師生共同追求知識的力量，而非來自否定差異的支配力量，學習氣氛的營造也就在於師生雙方，教室中的個體都成為了被看見的「主體」。

貳、 hooks 的教育理論發展

hooks 的交融教育學結合其女性主義理論與反種族主義理論，探討性別、種族、階級在教育當中的角色，對美國甚至全世界的教育產生重大的影響，也是其最著名的教育理論。在提出交融教育學理論之後，每間隔十年 hooks 就會寫作一本教育專著，根據其在自身教學經驗以及研究觀察進行反思，修正其教育理論並針對不同時代脈絡分析與提出建議。以下從《Teaching Community: A Pedagogy of Hope》及《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Practical Wisdom》兩本著作當中整理出 hooks 的教育理論要素，並分析其教育觀的發展。

一、 學習批判思考

針對學校教育的內容，hooks 從來不諱言支配文化在當中的重大影響力。談論在學校當中的文化再製時，hooks 的觀點近似於一種多元文化批判，主張學校文化所反映出來的內涵，是在主流規範這個保護傘底下的支配文化態度與價值觀。舉例來說，一般大學英語系所中選讀的文學作品多數為白人男性、加上部分的白人女性作家的著作，其他族群的作家則少之又少。知識在這樣的脈絡底下，不可避免的是歐洲中心的、男性的、並且從起源到概念的形成皆是上層階級文化的，特別是在藝術和社會科學方面更是如此。hooks 以自身求學經歷說明，在那樣的時代，黑人就讀聲望高的、多數為白人的大學因而被迫感覺自己在學校裡的目的不是學習，而是去證明自己和白人是平等的這件事。而證明這件事的方法，就是盡力去表現出自己能夠成為白人同儕的複製品，而這正加重了黑人族群當中精英份子向主流白人文化同化靠攏的現象(hooks, 1994a)。

教育當中的文化支配除了種族層面，性別自然也是重要的一個因素。身為一名黑人女性，hooks 求學經歷所遇到的困難除了種族文化之外也包括了性別文化。回憶到自己在 Stanford 求學期間，經常因為女性身份而受到關於其能力的質疑。

而突然之間，女性主義思想震撼了整個校園，女學生和女教授們開始要求終止教室內外的性別歧視。hooks 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以女性經驗為為研究主題的課程，像是由作家 Tillie Olsen 教授的女性研究課，在課堂上要求學生首先考慮勞工階級背景的婦女的命運。而在 Diane Middlebrook 的當代詩歌課上，則是把 hooks 的詩歌印發給每一個學生，上面沒有名字，請學生辨別作者是男是女。這些經驗讓學生開始批判地思考根據性別判斷作品價值的偏見。也就是在 Stanford，彼時年方十九的 hooks 開始寫作其第一本書《我不是一個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為黑人女性主義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若沒有女性主義運動為女性創造一個團結的環境，所有這些轉變都不可能發生。這就是在性別壓迫底下做出抗拒的例子，讓女性在父權制壓迫的環境當中仍能擁有個體的能動性(hooks, 1996b)。

創造這個環境的基礎就是女性對於所謂的「內部敵人」的批判。這個內部敵人指的是女性內化的性別主義，作為女性都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父權制思想教育—簡單來說就是女性把自己看得處處不如男人。為獲得父權制的認可，把自己 看成與其他女性競爭的永遠的與唯一的對象，懷著嫉妒的、恐懼的、仇恨的眼光看其他女性。性別主義的思想使女性之間毫不仁慈地批評彼此、毫無憐憫地懲罰彼此。女性主義思想幫助人們意識到女性的自我仇恨，從作用於意識層面的父權制思想中解脫出來。這也是為什麼 hooks 認為教育當中一定要有女性主義的觀點，如此一來才可能創造批判的空間。

以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為例，hooks 描述在大學層級的教育批判介入，發現在以培育未來統治階層為主的學校，特別強調所謂多元的教學法，這些常春藤名校或是各州頂尖學校的白人或少數有色人種學生，因為預期將來工作上會和世界各國、各種族群的人往來，他們必須了解並有能力接受多元性，他們必須了解不同族群的風俗習慣。所以對這些少數菁英來說，多元化教育變成了一種商品，是生意上的必備能力。當然，這種商品化的多元性到底具有多少價值是有爭議的，但不論哪一種形式的多元文化教育，在學費相對便宜很多、學生組成也偏中下階層的公立大學裡卻又更少了。學習其他文化的重要性經常不被社區學院或公共大學認可。甚至，在社區學院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對於雙語教學的敵意。這是很現實的事情，在美國的許多地方，工作條件的要求就直接包括西班牙語的能力，但卻很少社區學院的教師會告訴學生這一點(hooks, 2006)。

hooks 斷言，只要國家還是拒絕支持雙語教育這一類的多元文化教育，就等同於在支持現狀，亦即創造並維持為白人帝國資本主義父權制服務的侍僕階級，

而這也就是它唯一會有的意義了。想要真正做到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基礎的「越界」，我們必須真正開始對於讀寫能力展開強烈的改革。就美國的高等教育而言，如果不真正對於基礎讀寫能力做出努力，不管怎麼做最多也只是再造了一群越界但仍屬精英的優勢階級黑人、拉丁裔、亞洲人、和美國原住民的思想家、藝術家以及作家。那些真正需要教育來生存的、中下階層的邊緣族群，將永遠無法達到階級上的流動，而那些所謂的多元文化教育，就真的不具任何實質意義了。

hooks(1995a)認為，美國的教育急需探索並理解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之間的連結，教育家必須教導每一個人這個連結，使其能夠具有批判意識並且活躍於社會，而許多對於批判意識的教育都可以發生在日常對話裡。回到黑人族群的教育，hooks 認為黑人女性和男性一定要參與在女性主義思想的建構當中，針對黑人族群的特殊處境，創造女性主義鬥爭的模式。重新概念化男性特質，讓不同的、具轉化力量的模式存在文化當中，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幫助那些正建立自我概念的男孩和男人建立新的認同。hooks 並呼籲，黑人族群需要來自女性主義觀點的黑人解放鬥爭，並且談論的是一整個黑人族群的困境。隨時保持警醒，維持對於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的意識，持續地對抗直至種族主義、種族主義暴力、性別主義、和性別主義暴力停止發生的一天。而這樣的鬥爭，在其他邊緣族群亦然。

二、去殖民化的教育

去殖民化是 hooks 教育觀當中另一個重要的著眼點，也正因為這個觀點讓他的教育理論經常被用於討論第三世界的教育議題，許多書籍甚至將 hooks 歸為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學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教育理論當中較常使用「灌輸(indoctrination)」一詞來表達，hooks 並不這麼描述白人至上主義的影響及其延伸觸手—也就是媒體，或者個人態度、選擇以及行為的塑造，而是使用社會化和思想殖民化這樣的詞彙，直接關聯的原因應該就是hooks自身的種族主義抗爭背景，也就以去殖民化的概念貫穿其教育理念的各個層面(hooks, 1994b)。

教育中的去殖民化這個概念始於六十年代的美國，彼時方興未艾的民權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改變了文化的各個面向，並為教育界帶來了無法忽視的改革。在激烈地推動種族平等並結束種族隔離與修改法令之後，黑人權力運動家首先專注在喚起人們注意教育被結構化、而白人至上主義加深的情形，這個國家的教育教導白人小孩支配的意識形態，並教導黑人小孩屈從的意識形態，以不成文的律則維持穩定的社會結構。在此同時，女性主義則挑戰父權制及其以男性思想家為主

的思維，是另外一個帶來重大改變的變化。而當對種族和階級的批判被加入到對性別的批判當中，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各種偏向與不平等開始受到質疑。

激進化後的美國人，吸取來自世界各國的武力鬥爭經驗，學習著一種新的語言，用來重新產生其在美國這個國家的位置。「解放」變成一個經常被提起的詞，而特別具解放性的行動是去學習一種更複雜的政治語言，讓人們能夠去說出並理解自身國家的政治，以及去超越個人偏見和仇恨來看待各個支配系統本身及其相互依賴而運作的過程。hooks 認為，對每個人來說，不論其性別、種族、階級為何，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去了解教育如何在美國被作為一種殖民的工具。以美國經歷奴隸制的黑人族群來說，對於許多本身是家族當中第一代進入大學的黑人，讓他們能夠去抗拒殖民化思想的種子早在他們進入大學機構之前就已植下。當然這是因為美國獨特的族群形成過程，黑人族群長期作為受壓迫的、最邊緣的一群人，若是不先學習著去抗拒統治者價值和觀點帶來的壓力，就不可能得到肯認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這樣的能力。因此，在進到大學以前，通常黑人族群就已經從家庭當中學習了某種形式的抗拒方式。

若是缺少了去殖民化的思想，那些出身自公民權被剝奪之背景的學生，經常會發現自己很難在支配文化的教育機構當中取得成功。就算是那些已經接受了支配文化價值的學生也是如此，甚至這些學生會是在面對重重阻礙時最措手不及的，因為他們一直相信自己和族群當中的其他成員有所不同，相較之下應該是較受到庇護的對象，實際上卻不是如此。hooks 點出，美國這個國家的社會正義運動最大的問題，就是相信解放會突然發生。這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往往運動取得某些成果，鬥爭就停止了。這是十分危險的，特別是當想要在支配者的文化架構底下建立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次文化的時候。在這裡 hooks 評論美國的自由鬥爭的缺失，如果能夠早點理解到解放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結束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階級剝削的鬥爭當中，本應能夠進行得更好、更有成效的。

人們每天被殖民化的思想轟炸，不只是形塑意識，這一類的思想更為屈從與默許的行為提供了獎賞，遠遠超過抗拒行動所能得到的。因此，相較於產生自己的意識，人們自然更容易受到殖民化思想的影響。hooks 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沒有別的，我們必須持續地參與到新的思想與存在方式當中，我們必須隨時保持批判警醒。可以確定的是這個過程十分辛苦，畢竟當大多處人都花費大量的時間生活在支配文化結構當中的時候，作為其中少數看清楚支配文化影響力的人，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撇除鬥爭行動當中的種種困難，hooks 認為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算是特別幸運的一群，因為，就個體而言，我們幾乎不需要實質的抗拒行動就能夠去抵抗支配文化和其中的各種偏向(biases)。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教授在課堂上有著極大的自由，要發揮抗拒的作用是相對容易的，主要的困難是如何在多數學生仍深陷在支配文化當中而無法開放地接受新的學習與思考方式時，以一種不帶有偏向、去殖民化的觀點傳遞知識。hooks 在其課堂上很清楚地向學生表達，他教學的目的「絕對不是創造更多他的複製品」，作為一名教師，他想要創造的是一個開放的學習社群，在當中學生學習成為批判思考者，能夠對所學到的素材做出回應。當學生成為了批判思考者，他們就能夠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來改變觀點，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什麼對他們而言是更好、是更適合的。

而既然教育還沒有在根源上產生真正的激進轉化，教育作為自由的實踐就仍然只是能夠為部分選擇往這個方向發展的個體所接受。雪上加霜的是，許多所謂激進的思考者經常是在談論激進理論的同時，實際行為卻是傳統的、受支配文化約束的。當然，支配的教育階層所能帶來的報酬往往會對抗拒與轉化教育帶來傷害，因此，理解到解放是持續進行的過程的教育家，一定要尋求各種機會使自己和學生的思想去殖民化。雖然有許多挫折，實際上確實已經正在發生、並且會持續地在教與學方面產生具建設性的激進轉變，帶給教育場域自由、教學越界與轉化。

另外，在討論去殖民化教育時，hooks 經常以哥倫布在美國各階層學校當中被述說以及傳遞的方式為例說明其觀點。美國這個國家至今仍持續以讚揚的態度去述說哥倫布登陸美洲的歷史，所用的詞是「發現」新大陸，而 hooks 認為這當中的深層用意是以一種隱晦的方式要求和號召所謂的「愛國者」再一次站穩立場，繼續奉行帝國主義和白人至上理論。美國人從小學開始在學校學習到的哥倫布歷史，其中心目的似乎就是在灌輸這樣的思想：統治和征服與我們不同的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且不拘泥於特定文化。

哥倫布的故事告訴學生，假如能力可及，印第安人本來應該會征服並統治白人探險者，而最終無法成功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夠強壯也不夠聰明。簡單來說，是「白人性（whiteness）」賦予了這些探險者更強大的力量。當然，白人性這個詞沒有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詞。也就因為文明是如此重要，學生被說服相信，不管這些白人探險者對印第安人做了多麼殘忍的事，為了帶來文明都是值得的。也因此，既然不計代價取得文明是有益且必須的，那麼統

治也不會是壞事。只要持續忽視非洲人先於哥倫布在「新世界」的存在，人們就會認為統治是自然而有益的。hooks 直言，在美國，消除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歧視的工作之所以沒有取得足以帶來改革的進步，就是因為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一個團體或個人凌駕於他人之上是很正常的事。

實際上，哥倫布在他的手記當中確實提到了美洲原住民的特質單純、善良而慷慨，但他並沒有對此表示敬意或產生共鳴，反而認為這種文化觀充滿缺陷，斷言這樣的族群很容易被征服、剝削甚至摧毀。至此 hooks 進一步強調，對於哥倫布與在他之前的美洲原住民這兩種文化的意義進行重新的批判思考是必須的，但思考過程不應該停在這裡。

因為雖然這兩種文化大不相同，卻都帶有男性特徵。白人殖民者把土地想像成女性，可以占有、享用並隨意支配，而男性征服者對原住民婦女的大規模強暴，更指出其將在美洲的冒險視為一種粗暴、不容拒絕的男性征服。hooks 認為，雖然這樣的想法唯獨殖民主義者擁有，但並不代表非洲或美洲人的價值觀不帶有性別主義色彩，而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實踐這種價值觀。悲哀的是，當代有色人種男性借由彰顯男性陽剛氣質來尋求對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性與男性權力的認可，這正是殖民帶來的悲劇性結果。

三、建立主體性

主體性(subjectivity)是 hooks 思想中的一大重點，對他而言，任何解放鬥爭的過程都是主體性建立的過程，這也是 Freire 批判教育學當中主體性概念的延伸。主體性的概念可以有各種解釋，配合不同情境所包含的細節內涵也不一樣。主體性對於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要如何透過教育讓個體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才是真正困難的地方。

當課堂成員變得更多元時，教師被迫面對支配政治在教育現場進行再製的現象。例如，白人男性仍舊是教室裡最常發言的人，有色人種學生及一些白人女性則害怕被同儕批評為智識不足，因此幾乎不主動發言。有些人則是覺得他們不去堅持自己的主體性，反而不會遭受攻擊。hooks 回憶自己課堂上或是其他課堂上的那些聰穎的有色人種學生，往往反而技巧性地逃避在課堂上發言，因為他們直接假定教授因為其身份而對其發言並不感興趣。

根據 hooks 的觀察，要學生改變就像要教師改變教學典範一樣困難。多樣性的教室若是根基於批判教育學、或是女性主義的批判教育學，將存在更多的緊張

關係。從批判教育學的觀點進行教學，常會招致學生的抱怨，像是明明應該是英語課，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女性主義、種族、階級的討論？因此，轉化的課堂通常比「尋常」的課堂更需要解釋當中的教育哲學、策略與目的。

hooks 特別針對教育場域中的同理心做了討論。的確，放棄舊的思考和認知方式並學習新方法往往是痛苦的，但是這樣的痛苦卻也是令人尊敬的。在接受了新的典範以後，看事情的角度發生轉變，對同樣的事情產生不一樣的想法，可能引起不自在感。利用這點，hook 經常要求學生放假返校後，分享他們在教室中所學的理念如何影響他們在教室外的生活，習得批判視野之後，原來看待家人朋友的眼光都會開始改變，學生常常不得不對這些原本熟悉的人事物作出批判，因此感到十分痛苦。但是這樣的學習機會不可多得，透過檢視自己所習慣的生活，學生學習結合理論與實際，實踐所受到的教育，並且漸漸從當中學習形塑作為一個完整主體所應具備的視野與價值觀。

多元文化主義迫使教育工作者去正視那些形成教室中知識分享方式的狹隘邊界，也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因為接受與保留各種偏見而形成的共謀關係。教育者若是能夠進行意識轉化的教學，創造一個自由表達的氛圍，就能帶來真正具解放性的博雅教育，在教育場域中進行真正的意識轉化。談論到意識地轉化，就可以聯想到 Freire 和 hooks 的著作當中都經常談論解放鬥爭當中，「意識轉化」作為整體轉變與改革的重要開端。然而，特別是美國的讀者經常誤解這樣的說法，批評這個概念似乎主張改變個人的思考就已經足夠了，不需要任何進一步的行動。針對這個誤解，hooks 認為，首先從人們使用「足夠」一詞就能看出他們對此問題的態度，帶有施捨的意味，同時更顯示出他們並未了解到意識轉變對於被殖民者/受壓迫者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也因此，Freire 必須不斷強調他從未說過意識覺醒本身就是目的，而是總是需要有意義的實踐相伴才能展現其價值。因為，人類雖然仰賴意識或意向來發現自我，但現實當中總是無法超脫具體的情境。另一方面，實踐也不能夠是缺乏意向的盲目行動，而必須是行動加上反思。不論男人、女人或是其他介於之間的任何性別，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他們歷史性地構成了實踐的存有，並且在此過程中，他們開始擁有足以改變世界的力量，賦予這個世界意義。hooks 認為，美國這麼多的革新運動之所以未能具有持久的影響力，正是因為對於「實踐」的真諦缺乏足夠的認識所致。

為自由而教育，教師必須去挑戰及改變大家對教學歷程的思考方式，特別是

在學生方面。在試著讓他們參與任何概念上的對話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教導他們學習以及思考的歷程。hooks 提到自己課堂上的許多白人學生，當他們進入一堂非裔美籍女性文學的課，卻期望課堂上不要出現種族、階級及性別政治學的討論。他們接受再現焦點的轉變，卻拒絕思考方式的轉變。hooks 強調，將個人經驗與學術連結的原因之一，是當學生越是能肯定自身的獨特性、越是能確立在教室中自己的主體性時，就越能夠傾聽。所以其教學策略是引導學生將注意力從教師的聲音轉向其他人的聲音，這種情形最常發生在學生分享經驗以與學科知識連結的時候，在那之後學生就會記住彼此，教育場域中的個體也才真正開始展現。

四、自我療癒的自述

hooks 認為，想要建立完整的主體性，就必須能夠完全地接納自己、喜愛自己。在交融教育學的教室裡，教師揭露真正的、完整的自我，讓教室充滿愛與能量，批判地反思自己的經驗，進行身心合一的教育，而學生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學習敞開自己，那麼教師與學生之間也可能產生真正的熱情。hooks 舉 Thomas Merton 在《Learning to Live》一文當中提出的建議為例說明，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向學生展示如何定義自己與世界「真實的與自然的」關係，那麼教師若能做到自我實現，就能夠教得好。不是只有教師掌握知識的鑰匙，知識的鑰匙存在於學生的內在自我，必須朝向內在探尋。

真正探索自我的過程是痛苦的，因為探索以後看到的東西不見得符合最初的期望。對 hooks 來說，寫作就是他揭露自我的方式。寫作是他的聖殿，是為他帶來庇護的居所，但卻不足以產生自我療癒的效果，往往只停留在發洩壓抑情緒的作用。因為許多透過寫作應該帶來的知識的轉化被羞恥的感受所屏蔽，而在當中面對某部分的自我對他而言是羞恥的，使他感到赤裸而脆弱。文字迫使 hooks 和一直逃避的陰暗自我面對面，對這樣的「我」的存在感到羞恥。

hooks 坦承面對自我的傷痕是必要的，但只是面對並審視這些黑暗面是不夠的，那些羞恥必須被放下，才有可能獲得療癒。寫作對 hooks 而言是一種長久的內在探尋，透過揭露並修補籠罩著陰影的自我記憶，連結過去和現在的自我存在。而那些過去他如此羞於承認的傷痕，漸漸變成了療癒的處所，在這些黑暗的、伸手不見五指的深淵中有著痛苦的根源也有著治療的方法。

在寫作的過程中，解構(deconstruction)是重要的批判工具。在建立任何一種論述時，我們一定是從推定的假說作為起始，而想要從推論開始就必須忘卻或是技

巧性地除去對於這些假說之可行性的質疑，解構則教導我們去審視這些限制和問題。批判理論化的主要挑戰之一，是想法在施行於批判的心靈之上時隨之產生的需求，而這則挑戰了批判者不斷地去轉換立場，也就是批判者不只是寫作，而是隨著談話的內容和希望談話的對象轉變寫作方式。hooks 也強調「獨處」的重要，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我們不願意對公共和私密這兩個概念提出質疑，如果我們不願意打破壁壘，我們就永遠也無法終結各種形式的支配。在獨處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去面對那些一直逃避的事，我們不再拒絕現實，就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解，這是一種對自我的承諾。

hooks 強調在寫作時，是將自己當作一名「作家，身份是黑人女性(a writer who is a black woman)」，而非「黑人女性作家(a black woman writer)」。因為即便是黑人或女性作家因為不刻意引起別人對其種族與性別的注意而受到讚揚時，這些特質仍是被強調了出來，這是無可避免的。出身邊緣族群的作家經常面對兩個選擇：對某種身份的過度認同(overidentification)或非認同(disidentification)。實際上，那些作定義的標籤的確是重要的，但不是以一種絕對的方式而存在。hooks 作為一名出身宗教家庭的美國南方勞工階級黑人女性的這個身份，形塑了她看世界的方式，然而其經驗的特殊性並不阻止她傳達大眾普遍關心的議題。這並不是非 A 即 B 的問題，而是兩者可以同時兼顧的。

五、抗拒的教育學

隨著教室的組成變得越來越多元，安全的議題也漸漸成為學術場域關注的焦點，特別是越來越多黑人/有色人種學生進入到過去多數為白人的機構當中時，這樣的情形更是明顯。種族差異並不是唯一造成潛在緊張的因素，實際上，許多第一次進入大學的有色人種學生都是來自貧窮的、勞工階級背景，這些不同成長背景的學生所帶進教室當中的階級差異，甚至比種族差異帶來更大的分化。這就造成有的教室當中學生彼此不敢發生表達意見，害怕會造成更大的疏離或衝突，有的教室的學生則是過分熱衷地彼此相互挑戰與對立。

許多人發現，當他們試著尊敬文化多樣性時，必須面對自己過去所受的訓練和知識的侷限，以及失去「權威」的可能性。甚至，在課堂中揭露某些真實和偏見時，時常會造成混沌和困惑。課堂應該是一個安全、和諧空間的想法受到挑戰。那些不願以種族、性別和階級意識觀點來進行教學的想法，泰半源於擔憂課堂將因而失控，以及情緒和熱情將無法節制的恐懼。的確，在課堂上處理學生熱衷的

議題時，就存在著對立、激烈的意見表達、甚至衝突的可能性。然而，學生的沈默或是缺乏參與，許多時候正反映了在這樣所謂中立的場域中，參與者可能一點都不感到安全。

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hooks 重新思考了在教室當中安全性的議題。關於安全的定義，與其專注在一般所認為的「多數人都同意就是安全」這樣的假定，在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時間表達意見的前提之下，若我們能夠將安全視為知道如何處理危機情境，那麼我們就開啟了一個可能性，亦即就算是在有著不認同甚至衝突的情境裡，這個教育場域仍然是安全的。hooks 主張，讓課堂成為每個人都自覺參與貢獻的民主場域，是轉化教育學的中心目標。

本身已經處在邊緣的族群，其存在是不安的、是經常變動的，我們會假定這些人從其文化脈絡、成長經歷等各種觀點應該都更能做出有力的抗拒，以美國學術界而言最明顯的代表之一就是黑人女性。然而，hooks 根據觀察與互動的經驗發現，事實上絕大部分學術界裡的黑人女性是不反抗的，他們和學術界當中的其他保守力量同樣保守。hooks 認為這是因為當置身於支配結構當中時，邊緣團體會感覺到自己非常脆弱。甚至許多時候，阻止黑人女性激進的正是其他黑人女性。這些人認為，過於激進的行為、脫離主流置身邊緣的策略會讓那些想方設法「達到標準」或「符合標準」的人在融入主流社會時面臨更加困難的處境。

黑人女性沒有制度化的他者能夠作為歧視、剝削或壓迫的對象，通常都有著直接向主流的階級、性別與種族主義社會結構及其意識形態挑戰的切身經歷，而認識到自己處於邊緣這一點讓他們能夠去批判各種霸權並作出抗拒。從邊緣確實能夠做出最有力的抗拒，但必須注意的是，邊緣族群會對某些形式的支配提出抗議，但也會隨之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小團體，在這些小團體中人們採取和支配族群同樣的手段來決定哪些人可以加入他們的共同體。hooks 引述一行禪師的論點，闡述了抵抗建構錯誤邊界的思想之必要，因為「那個你不得不與之對立的人變成或被建構成你的敵人，但這個人實際上與你的共通點可能比你意識到的更多。」

時常可以發現的是，人們往往願意接受所謂的「邊緣」團體，卻對於他們的貢獻和努力，不願賦予相同的尊敬。hooks 觀察到，在美國這個國家當中，民主、多元、民權等論述只在哲學層面產生，但是一旦它們開始要求改變、要求權力的轉手、或是為非白人爭取行動力(agency)時，人們就開始阻止，主張這是沒必要的，或是所有目標都已經達到不需要更進一步的行動。然而，許多有色人種的年輕人仍然相信他們不需要肯任行動，直到這種行動力完全被奪去。因此，建立抗拒的

意識，讓從邊緣到中心的各種群體都能意識到所處支配結構當中的權力運行，是具解放性的教育所必須做到的目標。

第二節 種族與性別的交互關係

如同外界對 hooks 的理解，稱之為一名「黑人女性主義者」，hooks 從自身經驗出發，對於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的議題同時給予相當多且相當深刻的關注。關於 hooks 的性別觀與種族觀，在其《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當中有一段話可以讓我們一窺其立場：「沒有任何要求比要求女性主義思想家承認種族和種族主義的事實更改變美國女性主義的面目。這個國家的白人婦女都知道他們的地位和黑人婦女或其他有色人種婦女是不同的。...這個國家的白人女性都知道，白種人是一個有特權的族群。白人女性可能否認或是不談論這個議題，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真的不知道，只是意味著他們的自我蒙蔽而已（hooks, 2000a）。」顯然，性別與種族這兩個體系在 hooks 的理論建構當中是密不可分的，以下分別就其教育觀當中種族與性別的相互交織、相互依存關係進行討論。

一、密不可分的體系

擁有特權的女性主義者很大程度上不能與各種不同的女性團體交流，也無法談論他們或是為他們講話，因為這些女性主義者不能夠全面地理解性別、種族、階級等壓迫之間的關係，或者說他們不願意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女性主義對女性命運的分析傾向於把焦點僅僅集中在性別問題上，而沒有為建立女性主義理論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這樣的行為正反映了在西方傳統父權制底下統治者的統治傾向，即掩蓋女性現實狀況的真相，堅決地認為性別是決定女性命運的唯一因素。這樣片面的詮釋，仍是發自某種壓迫者的聲音，無法反映出社會真正的需要。

以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為例，大學和學院中婦女研究學科的建立為專門研究女性的工作學術提供了體制性的合法性。而雖然學院合法化對推進女性主義思想至關重要，但它同時也造成了一些難題。突然之間，比起那些使用大量學術用語的、充滿排他性行話的、那些只是為學院讀者而寫的理論，直接從理論和行為實踐當中產生的女性主義思想受到的注意越來越少。好像一批女性主義學者綁在一起，組成一個精英小組，專門寫作那些只有「圈子裡」的人才看得懂的東西。

種族議題的介入並沒有摧毀女性主義運動，反而使得運動更壯大。打破種族

問題的堅冰，才能幫助女性面對現實各種層面的差異。hooks 自述自己的女性主義理論著作，許多都強調理解差異的重要性，種族和階級地位又是如何決定了一個人能夠堅持男性支配和優勢的程度，最重要的是，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連結支配體系的方式。許多女性主義者繼續將這些視為分開的議題，相信即使種族主義存在，性別主義也可以被禁絕，或者是努力抗拒種族主義的女性就是不支持女性主義運動，這些想法正在不知不覺當中損害著女性主義理論與行動的發展。

白人女性對於是否過於專注在抗拒種族主義就會影響到女性主義鬥爭運動大多充滿不確定性，而黑人女性經常擔心若是支持女性主義運動就是背叛黑人男性，這樣的恐懼也很難消除。hooks 認為這個現象必須受到批評，而雖然越來越多的黑人女性開始抗拒這樣的典範，黑人男性去抗拒這個概念的卻仍屬少數，尤其是黑人男性政治人物。當前 hooks 認為我們正目睹這樣的論述的復甦。越來越多黑人男性，特別是年輕黑人男性，被社會褫奪公民權，主流白人媒體讓情況顯得是黑人男性有威脅性，而控制、壓迫和暴力支配是唯一有效的解決方式。意識到自身所處位置的黑人男性開始能夠像經常是處於三重邊緣的黑人女性一樣思考性別與種族主義的關係。

hooks 自述自己之所以不喜歡單純去思考種族(race)而是去討論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議題，是因為 hooks 清楚知道自己很容易就會落入殖民者的位置，因為隸屬於優勢階級，自然地選擇也就多，更應該隨時保持警惕。hooks 發現，當投射一個特別明顯的敵人，像是女性主義裡面的男性、種族主義裡的白人等，我們就無法警覺自己對待他人的方式。hooks 也反思自己總是認為邊緣族群和受壓迫者應該盡可能地取得最多的教育，但往往並不是對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這樣等於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在這些弱勢者的身上，就與殖民者無異了。

二、 產生加乘效果的交互關係

性別與種族壓迫除了相互交織的關係，更是會互相產生影響的關係，兩種形式的壓迫同時存在，壓迫也就加倍，反之若是對其中任何一種形式的壓迫做出抗拒，另一種形式的壓迫的傷害也會降低。面對社會結構中的壓迫，要讓人們意識到並且關注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壓迫形式並不困難。讓 hooks 憂心的是，在人們清楚意識到一個支配形式的同時，卻也可能對另一種支配漠不關心。我們會預期一個人若是對一種形式的支配和壓迫有越清楚地意識，就能較容易地看到其中的關聯，但往往我們看到的卻是人們如何去否定這些關聯。一些極為傑出的思想家像

是 Freire 和 Fanon 對種族議題有絕佳的洞察力，面對性別議題時卻視而不見，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白人女性主義對種族議題的觀點以及我們多數人面對階級議題的態度。從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許多時候人們對某些問題視而不見，並不是因為他們無法在理論層面、知識層面去看見，而是因為他們在更深層的情感與心理層面無法做到放棄原來的觀點，自然而然也就視而不見了。

hooks 深受 Paulo Freire 思想的影響，在談論到許多人對 Freire 著作中使用性別歧視語言的這個爭議，hooks 首先承認 Freire 語言中的性別歧視、以及他建構的以男性為中心的解放典範確實顯而易見，而這對於深深仰慕其理念、將其當作生命泉源的 hooks 來說，是十分痛苦的過程，因為這代表了具有深遠洞見的男性視野出現盲點。一方面仰賴他的話語作為革命鬥爭的中心思想，一方面卻又同時感受到這種世界觀的侷限。然而，hooks 並不認為支持 Freire 的著作和其致力於女性主義研究這兩件事情是相矛盾的。實際上，正是女性主義的思想賦予了 hooks 力量，能夠對 Freire 提出具建設性的批評。因為具備女性主義的思維，才不至於被動地全然接受它呈現出來的世界觀。

hooks 並不會清楚地區分女性主義教育學及 Freire 的作品和思想，對他來說，這兩者的經驗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像編織壁毯一樣，將其思想交織在女性主義教育學的思想中。舉例來說，hooks 在《我不是女人嗎：黑人女性與女性主義》一書展現了他如何從客體轉向主體的努力，而這也是 Freire 關心的議題。Freire 的思想肯定了 hook 身為一名黑人女性而作為抗拒中的主體，定義自身實體存在的權利，並且提供了 hooks 將美國種族主義政治置於全球脈絡的途徑。從這裡可以看出，即便 Freire 的理論仍是帶有性別歧視的成分，仍然能夠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重要依據。當然，這麼說並不是在為 Freire 的性別主義論點辯解，hooks 也從來沒有想要這麼做，hooks 仍持續地批判任何形式的壓迫，包括性別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壓迫。

抱持著個人即政治的觀點，hooks 認為在教育當中必須不斷地提醒每位參與者其所代表的政治立場，以及將這些立場帶進教學現場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外，在人與人的互動之間，彼此的政治立場也是相互影響的，每個人都可能是某種層面的壓迫者，我們只是必須持續地意識到這點。hooks 提到過去在歐柏林學院任教時進行教學轉化專題討論的經驗，第一次聚會時，許多教授對於公然討論政治觀點而感到不安。hooks 也必須不斷強調，教育並非政治中立的。一位在英語系任教的白人教授，如果只教授由「偉大白人男性」所撰寫的著作，此舉就是一個

政治性的決定。我們必須持續不斷地對抗那些否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異性戀歧視的人，然而這些政治性都將支配我們如何教，以及教些什麼。我們不斷地發現，幾乎每個人，特別是年老守舊派，比起要他們消極地接受教學反映的偏見，尤其是白人至上的觀點，要他們公然承認政治觀點確實對於教學造成影響這件事，更讓他們感到不安。

應該站在最騷動的運動意識前線的高等教育學生，對於影響教學的政治觀點反而可能更無法察覺，甚至是有意識地去否定。hooks 描述自己經常在課堂上做的一個實驗，學生總是說種族主義在當代已經不明顯、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但是當他們被問到若是即將死去並重生，會希望以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或是黑人女性的身份出現時，多數人的回答是白人，特別是白人男性，而黑人女性是最少人選擇的。當學生被要求解釋其選擇的理由時，往往就開始進一步分析各種因種族而造成的優勢，這種對種族有意識的否定和無意識的誤解之間存在的間隙是必須去彌平的。

在學術界也是一樣，既便是近年來關於種族和種族主義的論述漸漸被接受，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仍十分明顯。然而，hooks 提醒我們不應該因此而氣餒，事實上在一個支配的文化裡面，幾乎所有人都會有和自己的信仰與價值相悖的行為表現。這就是意識的轉化在教育當中的重要性，不論在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壓迫當中，扮演的是壓迫者亦或是被壓迫者的角色，意識上的轉化能夠影響這些壓迫所可能帶來的傷害，而在意識層面對任何一種壓迫做出抗拒之後，另一種抗拒形式對個體而言就更容易分辨，也就能夠做出回應。

三、性別與種族意識的教育

如同前面所述，hooks 相信在教育當中喚起學生意識的重要性，那麼什麼是帶著種族與性別意識的教育呢？以女性主義為例，女性主義對兒童教養的關注是當代激進女性主義運動的中心成分，借由教育出不帶性別主義思想的兒童，希望創造出一個未來的新世界，在這個未來的世界裡不再需要反性別主義的運動。女性主義者主要致力於女孩子的教育上，批判性別主義的偏見，提倡不同的女性形象。有的時候，女性主義也關注性別主義教育培養男性兒童的問題，但絕大部分都是在批判男性父權制，堅持所有的男性，從上到下、從裡到外都比女性好過，並且男孩總是比女孩有更多的特權和權力。這種處理男孩和女孩關係的方式在女性主義強調女孩的問題才是首要問題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女性主義運動站在兒童的立場最積極的改變之一就是創造了一個更強的文化意識，意識到需要男性共同參與兒童的教育過程，這不僅有助於性別平等，並且會和孩子建立更好的關係。不再只是將女性兒童的問題置於首位，而是同時以抗拒性別主義的方式教育男性與女性兒童。hooks 認為，當前我們需要在一般意義上更多地了解女性主義的為人父母的方式，在反對性別主義的環境中，能夠如何去教育孩子的具體實踐方式，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知道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會成為怎麼樣的人。而在將來的女性主義運動當中，我們需要更努力的去向父母展現結束性別主義的、積極地改變家庭生活的方法。結束性別主義對兒童的支配，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實施的過程，是使家庭成為孩子們感到安全、自由並懂得愛的場所之唯一方式。

性別意識的教育目的相較之下較為明顯，那麼帶著種族意識的教育目的為何呢？首先必須澄清的是，對 hooks 而言，這裡的種族概念並不是一群擁有相同特質的人關起門來討論「屬於我們的事」，種族不應該是排他的，反之，種族是一個提供依歸的群體，在當中我們一起關心這個世界、為所處的世界共同負起責任。hooks 舉自己在講授「第三世界文學」的課堂為例，在這堂課當中，他總會先花費數周的時間，設法先讓學生拋棄第一世界的思維定式。當我們能夠以全球的視角來思考問題，就不再僅能看見我們自己擁有多少，而會開始思考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是如何製造出來的。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感受到自己是世界共同體的一員，而不僅僅是第一世界的一份子。

若是教師自身不願意承認這件事，也就是想要不帶任何偏向地進行教學就必須重新學習、重新成為學生，那麼教室也無法產生改變。hooks 認為，個體一旦意識到生活周遭的種族主義壓迫，並且渴望使用這樣的意識去改變他們的行為，要讓他們產生思想和行動上的轉化就容易多了(hooks, 2003)。作為教育者，想要產生改變，我們一定要願意去教導。從民權運動時期開始，投入反種族主義的運動經常就是意味著教導種族主義者如何放下(unlearn)種族主義，到了真實的教育現場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一樣在教育那些種族主義者或是性別主義者放下偏見，這是一種意識上的喚醒，真正做出改變的選擇權仍然在學生。

總的來說，性別與種族意識的教育內涵雖然是由教師主導，卻必須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負起責任。在教育實踐當中，我們尋求解放，渴望達到真正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必須是在個體全面性的安適、並且能夠意識到各種壓迫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達到。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不分彼此，去除以自我為中心謀求改變

的願望。hooks 本身就是這種解放實踐最好的例子，他在《Teaching Community》當中提出了這樣的概念,去探討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對於性別意識的教育的影響。不論是過去或現在，不會因為是女性主義觀點的教育，就認為性別意識的教育內涵應該是女性中心的。實際上，教育需要一種新設想的陽剛之氣，自我價值以及對自我的獨特存在的尊重與愛是擁有這種特質的基礎。hooks 認為(2000a)，女性主義的著作中還沒有足夠的部分是在談論男性的問題，讓他們知道如何建立沒有性別主義的身份，在提高批判意識的教育上也做得不多，而這正是性別與種族意識的教育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 從邊緣到中心—朝向主體性的發展

hooks 作為一名黑人女性，在其受教育的過程當中不斷遭遇到各種形式的壓迫，而他也像一顆石頭，在顛簸之間逐漸形塑出成熟的模樣，開始散發光芒。hooks 不管在談論什麼主題，向來最重視誠實，誠實地面對自己也誠實地面對他人，所以他從來不會去掩飾壓迫的存在，也不會去辯解壓迫一定能夠被解除。那麼在這些壓迫當中，黑人女性如何能夠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在教育現場與在生活中皆然，如何讓主體的建立成為一種解放的途徑？以下將試圖從前面針對 hooks 性別與種族理論的分析，結合 hooks 的教育觀，探討黑人女性作為雙重弱勢族群，如何透過教育建立其主體性。

壹、 本質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爭—黑人女性該何去何從？

不論是談論性別議題或種族議題，一直存在著本質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爭論。首先，hooks 在闡述其反種族主義理論時經常提到的是黑人權力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與理論發展，包括 Malcolm X、馬丁・路德・金恩、黑豹黨的出現等，我們可以看到 hooks 在延用這些人的論點時非常小心，儘量不讓自己落入本質主義的巢臼當中。因為，對習慣在社群當中建立強大連結、以共同抵抗外來壓迫的黑人族群來說，本質主義是最方便也最有力的區分方式。你是非我族類還是我的盟友？很簡單，看看膚色和我是不是一樣就知道了。這是 hooks 害怕看到的發展，因為這樣的一個因受壓迫而結合的社群，自己也可能成為壓迫者。此外，本質主義很容易落入「我們」和「他們」的二分法，變成一種狹隘的自我中心觀點

所以，利用「本質」作為主體性的依據行不通。那麼黑人女性為什麼還在高喊

著「黑色是美麗的」這個源自於黑人權力運動時期的口號呢？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釐清 hooks 面對這個口號的態度，不是因為黑色是比較好的，所以是美麗的。白色也能夠是美麗的，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不應該用「本質」去比較。黑色之所以美麗，是因為黑人族群接受自己並且喜愛自己，看到自己的「美」並能夠發揮出來，這種美麗不是孤芳自賞的，是由內而外散發的、能夠讓周遭的人也去感受並如沐春風的。這樣我們就能看出 hooks 的和黑人權力運動家思想的區別，hooks 認為美好的感受是建立在所有人皆能得到幸福的基礎上。以黑人女性取得主體性來說，這樣的主體性除了讓黑人女性這個邊緣族群成為主體而變得完整，也讓在支配結構中扮演壓迫者角色的一方能夠得到意識上的覺醒。

很顯然地，hooks 的態度是偏向反對本質主義的，甚至可以說他的種族與性別理論的一部份都是建立在對本質主義的批判上。那麼，hooks 是否建議黑人女性或是其他邊緣族群採取經驗主義的路線呢？對於經驗，hooks 認為最重要的要打破權威聲音的界限，優勢族群不能夠為弱勢族群「代言」，但也不是只有弱勢族群能夠為自己發聲。也就是說，沒有所謂誰應該在什麼樣的情境下發言，或是誰因為身份認同而能夠/應該作為所有相關發言的標準。hooks 也坦言將黑人經驗理論化並不容易，因為黑人族群當中許多人長久以來將殖民化的思想內化，認定自己的經驗並不重要，即便是那些深處運動核心的激進人物，往往也很難說出自己的經驗。因此 hooks 經常鼓勵邊緣族群練習「說故事」，當然這樣的過程會觸碰到很多不想觸碰的問題，過程中會感到困擾甚至痛苦，但若能擁抱自己的經歷，就是向真正接納自己邁進一步，就在這樣自我剖析、自我描述之下，一個開放的、具有能動性的主體被建立了。

貳、 後現代的主體性

hooks 的主體性建立之所以特別，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其所談論對象。他認為，那些屬於支配結構邊緣的族群，因為總是被當作他者、被當作客體來對待，所以一直處於受壓迫的狀態，也因為作為客體，其存在不受重視，所說的話也不被認真看待，因此 hooks 的理論當中特別強調邊緣族群如何建立其主體，並且這樣的主體建立過程是靠自己的力量所達到，而不是受了支配族群的「恩惠」而達成的。針對邊緣族群自主建立主體的困難，hooks 提出了後現代主體性這一概念，希望透過後現代主義的特質，作為指引邊緣族群建立主體過程的方針。

後現代主義具備了批判反省的特性，針對現代主義的種種現象提出質疑與批

判，尤其是現代主義所追求的「一致性、普遍性、簡化性」的理念。在一九六0年代以降，後現代主義激烈地衝擊人文社會界，以致形塑了一股反傳統、反單一的新潮流氛圍，因而造成社會文化的丕變。對後現代主義的特徵與重要的論述有幾個共通點，首先是解構，亦即超越符號的自由；其次是片斷，描述一種鉅型敘事的衰落；最廣泛的應用則是多元，強調對異質聲音的重視。特別要注意的是，hooks 也批評了過去後現代主義無法被應用在黑人女性主體建立上的原因，是因為用來敘述後現代主義的論述本身就是優勢階級中心的，這一點必須先被打破，才有可能真正形塑所謂的後現代黑人性。

Alvesson 與 Sköldberg(2000)提出解構的兩步驟：第一步即為「打破」，把被抑制的方面轉變成為支配性的方面，甚至不滿足於顛倒兩個對立面的等級；在解構的第二步，則是消除兩個對立的差異，並用另一個概念取代整個對立情況。而 hooks 的解構，解構的對象是支配結構底下的大論述，這些大論述迫使受壓迫者噤聲，並且決定了結構當中形成論述的標準。在一個種族與性別壓迫的社會裡，所謂的大論述是優勢階級決定的，是白人中心、男性中心的，對邊緣族群來說，首先要意識到這樣的大論述所造成的壓迫，並且有意識地做出抗拒。黑人族群做出的抗拒包括各種次文化，像是饒舌音樂、塗鴉、街頭文化等，雖然是本來就存在的文化，但若是想要將這些次文化作為一種抗拒的手段，就要消彌這些實踐與理論建立之間的距離，若還是用學術性的、上層階級的話語作為標準，就無法藉此達到打破大論述的目的。當然，就後代主義理論而言，打破的行動並不停止於此，原來被支配的、受壓迫的在打破其受壓迫狀態以後，其目標並不是成為支配者的角色，不是取得支配權力，而是在意識上的徹底顛覆，讓原來的支配與被支配、壓迫與受壓迫的結構，由一個多元的、異質組成的結構取代。

後現代主義主張打破後的重建，在當中對立被消彌了，不再是非黑即白、非 A 即 B 的二分法。所以，hooks 強調任何鬥爭不應該以對抗共同的敵人來進行，對抗種族主義不是對抗白人，對抗性別主義也不是對抗男性。在教學場域中，想要翻轉教室的支配結構，也不應該分為教師與學生兩邊，而其抗拒的對象也不應該是教師。在消除了對立以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容納異質聲音的空間，在當中每一個主體都能夠被彰顯、都能夠被聽見，並且在互動當中互相影響。對於消除對立之後認同如何可能，hooks 認為形成主體的過程當中仍然有對抗，只是對抗的是壓迫狀態而非壓迫者。他將認同視為一種流動的、多元的並且開放的概念，認為主體性應該擁抱現實當中的所有衝突層面。

參、 抗拒之後該做些什麼？

綜合前面所述，可以看出 hooks 強調抗拒的重要性，並且這種抗拒是隨時隨地的，因為生活在支配結構當中遭遇壓迫在所難免。然而，光是抗拒並不足夠。在抗拒之後個體會成為什麼樣子，影響了個體如何成為主體、以及成為什麼樣的主體。hooks 說，邊緣族群為了成為主體而進到中心發聲，處於中心的優勢階級則要不斷來到邊緣、抗拒帶有偏向的觀點。不論是從中心到邊緣，或是從邊緣到中心，都不會停留在原地，而是不斷隨著需求與主體形塑的不同階段而轉變場域。兩者都在持續地做出抗拒，也在抗拒之中形塑具開放性的主體。所以，主體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流動的、是不受拘束的，不論種族、性別、階級或是其他認同為何，結構的界限被打散了，個體可以自由地在當中穿梭，更重要的是，個體能夠自主決定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我們在對抗中形塑主體，時時提醒自己拋去偏見與支配的思想，這並不是一個和諧的過程。因此，我們不需要掩飾衝突，不需要試圖維持文化和諧，而當我們能夠透過衝突學習，透過不停轉變立場，我們就擁有了接納自己也接納差異的勇氣。除此之外，hooks 認為讓轉化帶來自由的關鍵很特別但也很單純，就是愛。很多人，特別是學術界會批評將「愛」作為轉化的力量太過於情緒化，也難以衡量或討論出具體的方法，但 hooks 仍堅持他的論點，並且引述 Peck 在《少有人走的路》一書中對愛的定義，認為愛是「一種意志行為—也就是說它既是一種意願也是一種行動(hooks, 1994a)。」因為意志就代表了做出選擇，我們實際上是「選擇去愛」。而選擇去愛則意味著我們選擇了在社群中生活，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一個人去尋求改革的發生。若沒有愛，我們多數人只會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才會起而反對。沒有愛，我們很容易會產生盲點，受到其他形式壓迫的誘惑，也不會顧慮其他人遭受的壓迫與剝削。

所以我們選擇去愛，愛自己、愛同伴甚至愛敵人，我們能夠具有同理心，在為他人服務的時候，不會只視對方為客體，而能夠看見對方的主體性。在選擇去愛的那一刻，我們就開始行動起來反對支配、反對壓迫。在選擇去愛的那一刻，我們就開始邁向自由，採取行動來解放我們自己與他人。而這種行動就是一個見證，見證了愛是自由的實踐。

第六章 bell hooks 教育觀與新移民女性的主體建立

本章將綜合前面的討論，首先整理出 hooks 性別、種族、階級理論與其教育觀產生交互作用的方式，並試著以 hooks 的觀點探討新移民女性在台灣所遭遇的困境，分析其成因以及和台灣文化脈絡的關係，最後進一步從 hooks 的主體建立觀提供可能的解決辦法。

第一節 當然有關係—性別、種族、階級與教育

透過了解 hooks 的女性主義理論、反種族主義理論以及教育觀，可以知道 hooks 的理論發展皆是由每一個人作為個體所會考慮到的因素出發。首先，一個人看待任何事情的角度會受到其本身身份認同的影響，而對於身份認同最直接產生影響的便是個體的性別、種族與階級，因此，想要成為真正具有主體性的個體而存在，對於自身的身份認同如何對其產生影響，就必須要有真正的了解、接納與掌握。

以美國的黑人女性而言，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大眾媒體、學校教育、與他人的互動等讓他漸漸形塑作為一名非裔美國人的模樣，而除了被動的接受各種訊息的影響，他也會隨著思想脈絡的轉變主動地去調整對自己的想法，並且進行自我反思，朝向自己所想要成為、或認為應該成為的非裔美國人的模樣。而身為一名女性，在自身成長的文化背景中所賦予女性的責任與期待，個體學習如何符合這樣的性別角色期待，但在這樣的過程之外，個體也學習抗拒這些角色期待，探索自身的性別認同，漸漸趨向自己所希望擁有的性別特質，在這樣接受與抗拒的過程中形塑出身為女性的模樣。階級則是不管什麼樣的種族或性別認同皆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其決定了個體成長在什麼樣的背景當中，也因而決定了個體的認同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這些認同深深影響著一個人的主體形塑，而除了被動地接受身份認同所帶來的影響，個體能否發揮主體的能動性並且取得形塑過程的主控權，教育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個體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施的與受的，以及和他人互動的過程，其影響力甚至往往超過了個體本身的出身背景。以新移民女性而言，許多在原生地就已經受過不同程度的教育，在台灣接受的則主要是華語文教育，也有姐妹會、同鄉會性質的非正式教育，而在這些教育形式當中，新移民女性作為獨立的個體，

如何能夠形塑其主體性，以及在形塑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接下來將進行分析探討，並提出實務與研究方面的建議。

第二節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遭遇的主體性困境

bell hooks 不論是在談論種族或是性別議題時，總是強調每一個現象都有其「政治性」，教科書當中為什麼選了某張照片、或是教師給予男女學生的答題等待時間不一樣，這些都不是單純發生的事件，而是隱含著權力的行使與交互作用，是有意識的行為，甚至往往這些意識是被操弄的。hooks 探討黑人女性在「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父權制」社會當中被看待的方式，發現黑人女性所呈現出來的形象，似乎都和黑人女性對自身的看法有很大的落差。至於學術場域，不論是在談論性別或是種族議題，黑人女性似乎都無法保有其完整的認同，種族議題當中黑人男性要求黑人女性放下女性主義觀點，性別議題中白人女性則認為黑人女性應該以其女性認同為重，將種族的因素儘量地降低。黑人女性遭遇了自我認同的兩難困境。新移民女性作為和黑人女性相似的雙重弱勢族群，在台灣社會當中所受的困境為何？這些困境又是如何影響其主體性的建立？以下將分別進行討論與分析。

壹、新移民女性的「社會問題化」

在台灣有相當多的關於新移民女性的研究，然而進一步檢視這些研究的主題，可以發現多數研究似乎集中於探討新移民女性的「問題」，特定的議題像是新移民女性的適應問題、子女教養、溝通問題等，而結論往往也是以上對下的角度，假定新移民女性需要的種種「協助」。此現象似乎與台灣將新移民女性「社會問題化」的趨勢有關，而這種趨勢又助長了政府盲目的投入大筆研究經費，而研究經費進而促進了問題化研究的興起，也更強化了新移民女性「社會問題化」的主流論述。

那麼，新移民女性是如何從單純的一群遠渡重洋嫁到異鄉生活的女性，變成一個刻板印象化的「社會問題」呢？夏曉鵑(2002)在從建構論的角度探討社會問題的形成，並指出社會問題是一種「成就(accomplished work)」，而非客觀存在的真相。如 Holstein 和 Miller (1993)的定義，建構論社會學所研究的社會問題作品，其關注的焦點在於，社會問題的類型一經公眾認定，是如何被關聯到經驗之中，使社會問題的論述變成可辨認的實體。這種取向結合了俗民方法論、集體再現以及論述結構和凝視(gaze)等觀點。

新移民女性作為台灣社會的邊緣族群，經常陷入夏曉鵑(2001)所謂的「進退維

谷結構(double-bind)」，其社會問題的形象也因此被強化。這種敘事結構常為優勢階級的支配者所用，建構出邊緣群體的低劣性(inferiority)。其牽涉了兩個相互矛盾的負面形象，而被描述的對象幾乎無法逃脫被刻板印象化的處境，因為當他們與其中一種形象相矛盾時，立即陷入另一種對立的負面形象。針對這種逃脫不了的刻板印象化，hooks 將其視為一種壓迫手段，批評社會刻板印象使既存秩序合法化，形成核心對邊陲的壓迫。而不論壓迫的形式為何，壓迫就是一種馴化。藉由提供一種有理的依據，加深了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平等。

貳、媒體的意識形態建構

以東南亞女性為主的跨國婚姻，早期甚至並沒有新移民女性這個稱呼，多數台灣人所熟悉的稱呼是「外籍新娘」。「外籍新娘」這樣的詞彙裡面包含了明顯的貶低與歧視意味，似乎暗指這樣的一群人永遠只會是「外籍」，無法融入台灣，和台灣這片土地的關係也只是台灣郎的「新娘」。一般大眾對於語言的使用並不會特別敏感，也大多無法辨識出當中隱含的意識形態，然而這並不表示語言當中的意識形態不會影響到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觀感。相反的，正因為這些影響是在潛移默化當中進行的，反而更深刻且更難以消除，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大眾在被詢問到對新移民女性的印象時都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帶有歧視，實際行為卻又明顯表現出歧視意味而不自知。

對跨國婚姻的了解，一般人接觸的管道大多來自大眾媒體，因此在大眾認知形成的過程中，媒體的建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媒體報導在取樣、強調或省略的重點，都是高度選擇性的(Herman & Chomsky, 1988)。媒體也是一個組織，和任何其他組織一樣，他代表特定的利益團體，而借由媒體作為工具，特定的利益團體得以巧妙地以其「客觀性」做為掩護，發揮其影響力，使與其利益相抵觸的聲音淪落至邊緣的地位。媒體的力量如此之大，讓 hooks 一直對於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形象非常警惕，他將缺少轉化社會的集體力量歸因於社會迷思與媒體宣傳。媒體塑造並不真實存在的形象，而這些謊言看起來都是純粹而無害的，一些白人、甚至黑人主張種族主義已不復存在，或是女性主義運動已經徹底轉變社會的印象，甚至表現出在政治上賦權力量已經被顛倒，男性反而成為女性壓迫的受害者等。而個體不止接收非真相，接收的方式更是迅速且有效。當對於這些錯誤資訊在文化上的吸收與依附，和個體在其生活當中所說的一層層的謊言結合在一起，我們面對現實的能力、以及介入和改變不平等狀況的意志就大大地削弱了(hooks,

1994c)。

媒體的報導通常引用官方說法，而官方幾乎都是強調「外籍新娘」引發或是即將引發的問題。媒體塑造一種刻板印象，即台灣男性和東南亞女性之間的跨國婚姻是兩方低學歷、低社經背景的結合，是純粹利益交換的買賣婚姻。這種結合被建構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並且會危害下一代的人口素質。此外，台灣大部分媒體均高度依賴官方機構的新聞與資料來源，而任何消息一旦出自官方說法，就會以顯著的篇幅登上幾乎所有媒體。那麼，任何現象只要被官方宣告為社會問題，其在大眾心中形成的印象之強勢與根深柢固可想而知。在媒體的假想和建構當中，這種跨國婚姻除了會敗壞下一代的人口品質，甚至連來台投靠的親屬都會對台灣的社會與文化結構造成不小的威脅。此外，政府近年來強調制定方案法規以顧及新移民女性的權利，然而多數的方案之所以急切，是想要將這群人數龐大的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進行「矯治」，以避免日後造成更大的社會問題。

美國社會當中將有色人種視為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一種優勢階級上對下的歧視論點。對此，hooks 指出兩種看似有很大的差異、實質上卻相同的種族歧視為例。一種是直接對有色人種做出歧視，甚至完全不願意和他們接觸; 另一種人表現歧視的方式則完全相反，反而渴望和有色人種接觸。後者認為，自己主動地公開說出對他者的欲望，是對文化多元性的肯定。這些人認為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是跨越種族界線，而不是統治他者，所以他們的行為應該被仿效，種族界線可以被徹底改變。他們相信，在白人對非白人的態度上，他們與他者聯繫的願望是一種進步。

hooks 批評這種似是而非的「接納」，認為這種互動關係非但不平等，反而更強化了「我們」與「他者」的階級差異。因為白人與黑人之間若是主體對主體的交互關係，黑人與白人之間就不應該是支配關係，也不存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然而，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主體對主體關係必須通過雙方的選擇與協商才能出現，僅僅表示渴望和黑人親密接觸，並不能消除種族主義政治。比較台灣當前新移民女性的處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就是出於台灣男性的需求，因此在配偶與配偶的家庭這一方，和新移民女性的接觸基本上是帶有目的性的，並且隨著相處的過程逐漸產生轉變。至於一般大眾面對新移民女性的態度，則和 hooks 所描述黑人女性遭遇的情況類似，一部份人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幾乎和新移民女性完全不接觸; 另外有一部份的人則是相信和新移民女性接觸就是展現其包容性，將這種接觸當作一種「恩惠」，以上對下、施與

受的方式表現出來,像是台灣近幾年來對新移民女性和其子女一窩蜂地進行研究,探討如何處理他們的「問題」，就是這一類型的渴求的表現。而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渴求，其接觸的方式都不是主體對主體的交互關係。

參、新移民女性身體的商品化

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是一種以女性為主的特殊移民形式，關於這種移民形式的研究眾多，且多以「推拉理論」為主要分析架構。Cheng 和 Bonacich(1984)曾批評推拉理論，只針對移出國和移入國的推力與拉力，而無較宏觀的分析架構，並提出移民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理論架構圖，主張「勞動移民」是資本主義邏輯發展下的產物。資本主義發展導致了不平等的發展模式，造成核心、邊陲的國際分工關係。資本國際化與勞力自由化表現在邊陲國家，造成大量工廠關閉，大量勞工被解僱。男性在本國婚姻市場上的價值滑落，邊陲國家的女性因為男性經濟力的降低，而將對象轉向核心或是半邊陲國家的男性。

新移民女性多以「無助受害者」或是「拜金的吸血鬼」的形象被呈現在媒體當中。這些女性在婚姻市場中是待價而沽的商品，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並且受到仲介的欺騙或剝削。對比無助的受害者形象，新移民女性還被建構成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他們為金錢欲望所趨，假來台灣只為了錢，而媒體反覆報導假結婚真賣淫的案件更強化了新移民女性為錢墮落的形象。無助的受害者和拜金的吸血鬼這兩種明顯互斥的形象，卻同時存在媒體對新移民女性的刻板描述中。而媒體報導各種假結婚真賣淫的案件,則進一步將新移民女性「色情化」,加上跨國婚姻「看圖選妻」的婚配形式，更將新移民女性塑造成傳宗接代的工具形象，新移民女性的身體被徹底的商品化了。

這一點和黑人女性在美國媒體當中被建構的形象有驚人的相似性，出現在電視劇或是電影當中的黑人女性，不是肥胖、吵鬧、照顧白人的「奶媽」形象，就是總是性慾高漲、穿著裸露、無法停止勾引白人男性的「蕩婦」形象。hooks 批評，在白人至上的支配結構底下，黑人女性的身體被「他者化」了。那些明顯的種族歧視者，直指因為黑人女性的誘惑，讓白人男性無法抵抗誘惑而侵犯他們的身體。或是主張黑人女性本身就是帶有動物般性欲的蕩婦，黑人女體是能夠輕易取得的所有物。而那些自稱不帶有任何種族主義思想的前衛派，則將黑人女性作為一種「原始性」的代表，渴望去接觸、去親近，並且藉由和黑人女性的互動交往擺脫自己蒼白的膚色與無趣的文化，沾染黑人女性的色彩和溫度。

在商業文化中，種族議題給乏味的主流白人文化提味了調料、佐料。當媒體以這一種新鮮的差異文化轟炸人們時，性和欲望等方面的文化禁忌被打破且浮出檯面。以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父權制的角度看來，人們對原始風情的渴望或對他者的幻想可以被繼續加以利用。而且，這種對原始風情和他者的剝削可以被深植到社會現狀中，並鞏固社會現狀。黑人女性被視為較劣等的他者，需要西方進步文化的「拯救」，而白人男性越界的行為就被視為一種拯救，使其陷入個人主義的英雄式幻想而感到滿足。

許多關於新移民女性的研究，往往將跨國婚姻的當事人建構成社會異類，而當中的男性則被理解為父權的極致表現。性別歧視確實是跨國婚姻當中的重要議題，然而把當中的男性描述為父權的代理人，許多時候反而強化了社會中既存的階級歧視—只有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和藍領工人才會如此傳統、如此父權，對現代戀愛結婚的婚姻觀不接觸也無法了解，只好尋求這種不堪的婚姻方式。這樣的說法背後，似乎在暗示著「外籍配偶」這樣的商品，若台灣男性擁有足夠的資本，包括較高的教育程度、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等，就不會去消費。

肆、無法言說的痛苦

多數新移民女性，在剛來到台灣時幾乎不具有任何中文能力。何青蓉(2003)分析指出，新移民女性所面臨的不只是識字的問題，未能看到文化內蘊的價值而致產生的困擾或認知與情緒的衝突，更是左右他們在台灣生活適應的關鍵。這是因為識字不只是聽、說、讀、寫的工具性功能，識字更深層的意涵在於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是人與人共享的意義結構，而語言的流通使用，不僅是人際間的溝通問題，也是權力運作的問題。新移民女性能夠透過文字解讀世界，建構其生存的意義，亦即 Freire(1970)所指稱的「為世界命名」(naming the world)的意涵。對新移民女性而言，擁有中文識字能力首先最大的目的是滿足生活所需，包括找工作和子女的教養等，識字能力的取得刻不容緩。從 1996 年在美濃的第一個新移民女性識字班開始至今，隨著需求的增長，再配合政府訂定的各項法規，識字班的數量與密度也穩定增加。

然而，識字教育是否真的回應了新移民女性的需求？這一點似乎仍是有疑問的。Sleeter(1991)指出，一般針對弱勢族群的教育多採取「道德模式(moral model)」與「啟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所謂道德模式是是個人在社會裡的成就與處境為個人天賦與努力的成果，教育只是在於提供均等的機會，每個人都應當為

自己在社會中的失敗或成就負責。在這種道德模式下，社會中的邊緣族群被視為擁有「個人的缺陷」。而所謂啟蒙模式則是視社會中弱勢族群的處境是其「文化缺陷」所致，是因其文化缺乏競爭力所造成的「無知」，所以需要的是專家的啟蒙。不論是在哪一種模式下，弱勢族群的教育皆被視為慈善、福利或補償的機制。在台灣，新移民女性所能夠接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此，與其說是回應新移民女性自身的需求，不如說是政府為了「解決新移民女性的社會問題」而提出的解決辦法。

hooks 沿用 Paulo Freire 的知識觀，認為知識即權力，知識即政治，這意味著知識是有雙重向度的，一方面指出了知識的問題不單單只是人類純粹認識外在世界的活動，也不僅是為了達到認識客觀對象的真理而已，知識的建構與擴散更是權力運作的過程，為掌握權力者所控制，也為既得利益者的權力運作而服務。在種族主義社會中，黑人無法完全說出和確認他們生活中的痛苦，他們沒有能夠被聽見的公共話語能力，也沒有聽眾供他們表達痛苦。而且，這種無法表達有著政治意義。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性別議題上。支配社會當中，掌握權力的那一方能夠決定什麼樣的聲音被聽見什麼聲音則否。當「合法性」與「正統性」的標準由支配的優勢族群所制定，所謂的合法或正統也就是合乎支配社會結構的期待。

hooks 批評優勢族群為弱勢族群「代言」，認為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較高、且其原生文化較優越，由他們來代表發聲是最恰當的。我們可以看到講述黑人女性經驗或探討相關議題的書籍或文章，卻是歐洲中心文化的白人男性或女性所作。在女性主義的討論中只有白人女性的聲音，在種族主義的討論中則只有黑人男性的聲音。因此，雖然身為雙重弱勢身份皆具備的邊緣族群，卻是遍尋不著能夠真正去認同的想法或群體。針對這一難題，hooks 認為最重要的要打破權威聲音的界限，優勢族群不能夠為弱勢族群「代言」，但也不是只有弱勢族群能夠為自己發聲。也就是說，沒有所謂誰應該在什麼樣的情境下發言，或是誰應該作為所有發言的標準。

對新移民女性來說，影響他們是否能夠從識字教育中得到賦權機會的因素，除了不友善的社會氛圍，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來自配偶及其家庭。李瑛的研究顯示，新移民女性不參加識字教育的主因，很大部份並不是參與意願的問題，而是因為外在環境的限制或是夫家不支持。一些新移民女性的配偶坦誠他們的恐懼與擔憂，害怕當他們的妻子擁有了在台灣獨立生活的能力，包括語言能力、工作能力等，就有可能想要離開。如同前面所描述的，多數新移民女性的配偶本身就是社會當中的邊緣人，若是失去了相較於其配偶、在台灣這個社會當中的唯一優勢—

也就是語言能力，可能就連最後一點的尊嚴都會失去。本應讓新移民女性感到有歸屬感、有落地生根的踏實的家庭，當中的權力運作卻也壓迫著這一群漂泊的異鄉人，痛苦無處訴、更無人聽。

伍、頌揚差異或入境隨俗的兩難

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本就是帶著原生文化進到一個幾乎全然陌生的文化脈絡裡，且幾乎沒有緩衝適應的空間與時間，就要開始面對是否能夠融入的問題。以台灣大眾與政府的態度而言，新移民女性的融入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內政部有「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計劃」、「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等措施，旨在提升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適應能力，並且進行輔導與追蹤。另外，新移民女性在台灣接受的識字教育，則主要分成「接受外籍配偶就學的國小補校或成教班」以及「外籍配偶華語班或是外籍配偶識字班」，前者最初是為失學的民眾所辦的成人教育班，後者則是針對新移民女性的需求，除了教導本國文字外，包括衛生保健、家政手藝、育嬰常識、親職教育等，都是教育內容的一部份。

張正（2003）分析內政部「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發現當中雖然鼓勵各地開辦識字班，但是其目的是為了「落實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工作，增進其語言及生活適應能力,使能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這樣的目標意味著，之所以要「輔導」新女性移民、之所以要「增進其語言及生活適應能力」，目的是為了「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強調的是希望新女性移民「適應」、「融入」於台灣社會，帶著強烈的「同化」色彩。

邱埱雯（2005）的研究發現，面對新移民女性的這個群體及現象，同化思維當中有著很深的文化因素，亦即支配社會在性別與族群方面的優越感。就性別而言，華人文化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觀念根深柢固，認為女性婚後以丈夫的文化為尊理所當然; 從族群的角度，台灣相較於新移民女性的原生地屬於較富裕的國家，擁有較「進步」的文化，因此新移民女性的夫家多認為，同化台灣的文化是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那麼，朝向同化的反面，也就是去突顯邊緣族群的差異，是否就是較有益於其主體建立的方式呢？從許多對文化差異教育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多元文化教育的施行實際上就是兩面刃，一方面它可以是承認多元身份、確認主體認同並能尊重文化差異的一種教育實踐; 但另一方面，如同批判理論常會質疑的，多元文化教

育不過是一種收編弱勢與吸納異己的政治手段，甚至往往流於一種嘉年華式的慶祝，或是博物館式的陳列，遂失去其本意。

hooks 在面對黑人文化在支配社會中被作為差異他者而被突顯時，提醒人們必須注意這種差異可能被商品化並且被消費的危險。的確，肯認和發現種族差異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突破，是對白人至上主義與各種支配制度的挑戰。但也存在著許多隱憂，文化方面的差異若持續地商品化，就像是給白人餐桌增加一道新鮮菜，由此而導致他者被吃掉、被消費、被遺忘。新移民女性原生文化一旦被放到台灣的脈絡底下，當差異被突顯，就有可能經歷上述被商品化的過程。此外，如同 hooks 所指出的，差異經常會根據社會控制和商業創新的需要而被杜撰出來。也就是說，當新移民女性的文化差異被重新安排、經過修飾之後呈現在大眾面前，可能已經和原來的模樣大不相同。

這就造成了文化差異當中融入或突顯差異的兩難，顯然這樣的兩難困境至今沒有一個真正滿足需求的解決方式。對此，我們可以從 hooks 描述黑人形象的去殖民化過程當中一窺其立場。hooks 並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解決方式，而是從文化的動態性觀點去解釋。hooks 定義文化認同為一種成為(becoming)與存在(being)的過程，必定會經歷持續的轉化。也正因為文化認同的動態特質，不管是核心或是邊緣族群的文化，就像動態的水流，兩者都在變動，也都受對方的影響。因為文化不是固定的概念，與其說受到支配文化的影響而改變，更像是因為所處脈絡以及當中的成員等因素不同而改變，賦予「人」這個主體更高的能動性。

第三節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主體性建立

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身份特別，身為多重弱勢族群而處在台灣社會結構的邊緣。如何在現存的社會脈絡底下，透過教育使新移民女性能夠脫離所遭遇的困境，並且在過程中建立其主體性，以下將進行討論與分析。

壹、和壓迫者的對話—形成互為主體的關係

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新移民女性由於一開始來到台灣的方式就是一種「買賣」關係，其形象的商品化幾乎是在他們還未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之前就已經開始。新移民女性按照出生地、身高體重、長相、膚色等被分類，放在分類廣告上「任君挑選」。這種非戀愛結婚、且多建立在需求與供給關係上的婚姻形式，長久以來被

污名化與刻板印象化，在台灣人心中所形成的形象難以扭轉。

hooks 描述黑人女性被商品化的過程，明白地指出白人社會對黑人女性的消費，正是出於大眾對於「承認和享受種族差異可以獲得快樂」這樣的想法，那些深藏於白人至上主義社會結構深處的真正樂趣，也就是想像他者的那種汙穢的幻想與盼望，是對原始風情的渴求。在台灣，對新移民女性的各種色情化想像，或是將其當作危險的犯罪者的形象，滿足人們對腥膻色的渴望，就像是給平凡生活添加的佐料，也像是供給人們茶餘飯後閒嗑牙的話題。當高尚的「我們」一起討論卑劣低下的「他們」，有了一致對付的敵人，團結的意識也被加強。新移民女性成為被商品化的他者，台灣人和新移民女性之間成為主體與客體、我群與他者的關係，這樣的僵固必須被打破，新移民女性才有可能作為主題而存在。

新移民女性和黑人女性一樣，在支配社會結構裡面是最受到壓迫的族群之一，若以 hooks 的理論來看，想要抗拒壓迫，就必須進行解放的鬥爭。然而，鬥爭的過程並不是邊緣族群進到中心並且擁有權力就算結束。因為壓迫者和受壓迫者都應該被解放，也就是說，反壓迫的目的不是成為壓迫者，而是雙方人性化的過程，雙方都被解放。在新移民女性識字教育的教室裡，教師和學生不再是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關係，其固定角色可以透過對話被翻轉，透過對話來發展出「覺醒」，而參與教育對話的學生與教師應該具備平等的角色，學生同時也是教師，教師同時也是學生。藉由角色的翻轉，教師能夠基於有關學生的考量提供教材，而當學生表達了他們自己的看法時，教師又重新審視他原先所作的考量。這樣的教育活動成為教師與學生同時必須擔負的責任。

要注意的是，對於如何在和支配群體的互動當中建立主體性，必須要特別小心。邊緣化的他者可能被誘惑，相信來自支配社會的注意是一種對其主體性的肯認。hooks 澄清這樣錯誤的信念，認為藉由商品化而帶來的注意力對邊緣族群而言只會更加確立其邊緣化他者的位置。新移民女性作為邊緣族群，當台灣社會開始普遍注意到他們的存在與處境，其被商品化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透過媒體、政令法規、學術研究等方式呈現的新移民女性，如何避免落入商品化的圈套，新移民女性作為主體的批判思考能力就很重要，而這也是其教育內容應該涵括的部分。

貳、是新移民也是女性—雙重的賦權

hooks 的理論強調壓迫形式的連鎖本質，也就是各種壓迫形式之間是互相影

響的，不能夠只重視其中一種而忽視另外一種，或是在抗拒其中一種壓迫時，卻以另一種形式的壓迫施加在別人身上。新移民女性作為族群上與性別上的雙重弱勢，直接的感受到來自兩種形式的壓迫，再加上這一種跨國婚姻往往是發生在鄉村偏遠地區，或是經濟、社會地位弱勢的族群，因此也承受著階級的壓迫。和黑人女性相似，新移民女性因為本身的多重弱勢，無法不去注意到各個壓迫體系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新移民女性已經處在 hooks 所謂的「邊緣位置」，能夠對支配體系作出更有力的批判，並且以批判為基礎，進行其認同的自我賦權。

hooks 提出多重弱勢族群在面對自我認同時，無法對其所有特質都產生認同。以黑人女性為例，當中有許多人因為在情感與心理層面無法放棄原來的觀點，往往必須做出選擇，選擇放棄女性的認同或是種族的認同，這種要求也可能是女性群體或是黑人群體所提出，要求他們選擇其中一種認同才有資格被「納入」其群體當中。對台灣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較不存在這種選擇的問題，而是大多直接歸屬於其新移民女性這個身份認同，當中就已同時包括族群與性別兩個特質。雖然面臨這樣無法選擇也無法拒絕的認同，這樣的雙重認同身份卻也賦予了新移民女性更大的進行賦權的空間。

新移民女性的賦權，首先要具備對壓迫形式的批判思考，而批判思考的能力是需要教育才能擁有的。特別要注意的是，雖然識字教育是新移民女性賦權的基本途徑，卻不應該停在這一步。識字教育的內容受支配結構的標準所限制，反映出的是台灣支配文化以及父權制社會的價值觀。以 hooks 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分析，新移民女性所受的識字教育，使用的教材與課程內容是以支配結構中的大論述為基礎。新移民女性所處的邊緣位置，能夠清楚地看到大論述當中權力如何運作，又是如何發揮影響使人接受其論點。透過批判，重新詮釋識字教育當中的台灣文化，並且在過程中尋找對其原生文化的認同，以及其原生文化與支配文化的交互關係。

參、我書寫、我言說—被聽見的聲音

hooks 認為，要建立完整的主體性，就必須要能做到真正的接納自己、喜愛自己。喜愛自己是一件看似容易、執行起來卻很困難的事。特別是對邊緣族群的人們來說，因為支配社會塑造其負面形象，造成的影響早已根深柢固，也就是 hooks 所說的「內化的歧視」，使得這些人對自己的想法也深受這些負面形象的影響，無法產生自己的觀點。以新移民女性為例，也許他們當中許多人有想要完成的夢想，

卻因為社會、家庭不斷地傳達一個訊息：你是「外籍配偶」，你來到這裡的唯一目的就是傳宗接代、教養子女，除此之外的事你是做不到的，也不用嘗試著去做。政府辦理的識字班，當中包含許多和母職工作相關的知識，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面對「內化的歧視」，新移民女性首先必須面對真實的自己。hooks 提出寫作作為揭露自我的方式，透過寫作，個體能夠檢視自己最醜惡的一面，去面對讓其感到羞恥的自我，連結過去與現在的生命歷史，然後試著放下。寫作也讓人能夠在對身份的「過度認同」或「非認同」兩個選項之間游移，不讓經驗的特殊性影響他關心其他大眾關注的普遍議題。對新移民女性而言，實踐寫作還有語言使用的問題。應該使用的是其使用了大半輩子的、原生文化的語言，還是其即將落地生根、成家立業的台灣所使用的語言？以 hooks 的觀點來看，因為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並且是在個體的生命歷史當中持續進行的，那麼使用的語言應該也伴隨著其生命階段的更迭而轉變。也就是說，在描述過去原生文化當中的故事時可以使用本國語，描述的是在台灣的生活時則可以試著轉換成中文，或是兩種語言交雜，可能更能貼切地表現出其不同生命階段故事交織的過程。

除了寫作作為自述的方法以外，為了讓自己被看見，爭取自己的權益，新移民女性必須在所處支配社會結構當中發聲。聲音，是 hooks 教育觀當中的重要議題，有聲音，就會被看見，被看見，才能夠表達觀點、建構自己的存在意義。寫作與言說對黑人女性而言就是「頂嘴」，黑人女性致力於恢復過去的聲音並且在公眾凝視當中重新敘寫自己，持續將黑人女性的聲音置於中心，也持續地揭露出黑人女性意識權力的到來、聲音的產生與其作為自由的轉化的功能。也就是說，發聲，除了讓邊緣族群的存在被看見，也是一邊在向大眾呈現邊緣族群向中心移動、成為主體的過程。新移民女性的識字教育當中，除了日常生活對話所需的能力，也應該讓新移民女性擁有對公眾事務表達意見的能力，也應該提供新移民女性向外界大眾敘述自身故事、為自己發聲的機會與空間。

肆、流離的邊緣族群—在邊緣做出抗拒

hooks 十分重視抗拒的重要性，因為抗拒是個體所能夠最輕易做出的鬥爭。抗拒作為一種自我實現，並且在當中創造一種抗拒的世界觀。hooks 也提醒到，抗拒可以是任何形式，只要是以打破現狀為立意焦點，就可以是一種抗拒。要注意的是，打破必須以現狀不合理為前提，並且能夠確保在打破以後有更新重建的可能，亦即「有破亦有立」。以新移民女性而言，對社會公眾給予的稱號「外籍新

娘」做出批判並要求更名是一種抗拒，要求政府有關當局修改入籍規定也是一種抗拒，甚至組成「姐妹會」、「互助會」討論在台灣生活的大小議題也是一種抗拒。

除此之外，hooks 強調在邊緣做出抗拒，因為這裡是新的、激進的事能夠發生的交會處，是鬥爭能夠發生的地方。hooks 將自我的去中心化視為一種新的機會，產生新的、不同形式的連結，並且創造轉化的主體性，能夠表達與展示認同的不同面向。而唯有將在邊緣所建構出來的認同帶到中心，現存的單一主體性的和諧才可能被打破。新移民女性在台灣，已經是族群、性別、階級三方面的邊緣族群，可說是在整個支配社會結構的最外圍。而也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身份，可以做出最有力的抗拒。但是 hooks 也指出，並不是處於邊緣的人們就一定會做出抗拒，以黑人女性來說，許多學術界裡的黑人女性是不反抗的，hooks 認為這是因為邊緣團體處於支配結構當中時會感覺到自己非常脆弱。這些人認為，過於激進的行為會讓想要融入主流社會時面臨更加艱難的處境。

想要讓抗拒最有效的發生，就要注意喚醒人們的批判意識。新移民女性的意識覺醒，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識字教育當中教材內容的編寫。當然，若是要透過教材作為喚醒意識的工具，首先那些教材編寫者本身的意識就要經歷覺醒的過程。多數教材編寫者在各方面都和新移民女性的社會地位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他們正是屬於支配社會結構「核心」的族群，若是意識未經喚醒，所編寫出來的教材非但難以作為新移民女性抗拒的依據，反而會使他們馴化，而不想、也無法再做出抗拒。

從邊緣確實能夠做出最有力的抗拒，但必須注意的是，邊緣族群會對支配社會結構提出抗議，但也會隨之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小團體。若是不注意讓意識的覺醒持續，在這些小團體中的成員也可能採取和支配族群同樣的手段來決定哪些人可以加入他們，哪些人則否。正因為認同是動態的過程，意識的轉化也要持續，讓權力的運作不斷流動，才不至於落入和原先所抗拒的對象相同的不合理結構當中。

伍、以愛之名—實踐自由的教育

新移民女性來到台灣，不管是透過什麼樣的過程，買賣婚姻也好，被強迫的契約婚姻也罷，漂泊擺盪的跨過了一千多公里的距離，許多時候也只求有個能夠安身立命、落地生根的地方。邱埱雯（2000）的研究提到，某些新移民女性，特別是具有華人血統者，並不希望被刻意突顯出來，也不認為自己有需要被政府特

別關照之處，他們寧可像其他大多數的台灣女性一樣，安安靜靜的生活。看到這些研究結果，政府與教育工作者應該反思自己一直以來帶著的「照顧」或「保護」心態，是否已經是一種上對下的歧視觀點的結果。

然而，這並不代表現狀不需要被挑戰，也不代表不需要去關注新移民女性的相關議題。相反地，新移民女性在台灣的生活，不止是這一個族群以及他們的婚配家庭的事，而是和所有台灣人有關的事。新移民女性帶著原生文化來到台灣，幾乎是隨時在遭遇衝擊。我們不需要想像在台灣的新移民女性和其他台灣人的相處與互動是全然的平靜和諧，這並不實際，也沒有幫助。應該認知到的是，有差異就會有衝突，在衝突中我們學習抗拒，並且在抗拒中形塑主體。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時時提醒自己拋去偏見與支配的思想，就擁有了接納自己也接納差異的勇氣。從教育開始做起，不要去告訴新移民女性他們需要什麼，而是讓他們自己來說，述說他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述說他們與台灣這片土地的牽絆。

在教育中實踐自由這個概念看起來理想化且複雜，hooks 承認，實踐自由的教育確實複雜難解，當中的關鍵卻很單純—就是愛。對新移民女性來說，學習愛自己、愛原生文化也愛台灣文化；對我們其他人而言，則是學習去愛這一群和我們既相異又相似的人。因為選擇去愛意味著我們選擇和群體一起改變，意味著我們不需要一個人去尋求改革的發生。若沒有愛，許多人只會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才會起而反對，那麼就很容易又落入壓迫與被壓迫的循環。學著去愛，我們就是在學著擺脫自己的盲點，試著轉化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在當中我們得到自由，自由地做我們想做的一切，成為我們想要成為的模樣。

參考文獻

Abbott, P., Wallace, C. & Tyler, M.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Aberbach, Joel D. and Jack L. Walker (1970). "The attitudes of blacks and whites toward city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In *Financing the metropolis*, ed. John P. Crecine.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Alvesson, Mats & Sköldberg, Kaj (2000).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Inc.

Apple, M. (2009). Series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Davidson M. & Yancy G.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bell hooks*, (pp.ix-xi). New York: Routledge.

Bambara, Toni Cade (2005). *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Bank, J. A. & Banks, C. A. M.(Eds.). (2004).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5th ed.).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Baraka, Amiri (1971). "The need for a cultural base for civil rites & black power Movements." In *Raise, Race, Rays, Raze: Essays Since 1965*. New York: Random House, 39-48.

Bauman,Z..(1999). *Culture as prax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dolla, L. G. (2007). Intersections of inequality: understanding marginalization and privilege in the post-civil rights era. *Politics and gender*, *3*(2), 232-248.

Berry, T. R. (2005). Black on black education: personally engaged pedagogy for/by African American pre-service teachers. *The urban review*, *37*(1), 31-48.

Beyer, L. E. (1995). Beyond the formal and psychological: The arts and social possibility. In Wendy Kohli (Ed.), *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p. 137-148). New York: Routledge.

Bisman, J. (2011). Engaged pedagogy: a study of the use of reflective journal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36*(3), 315–330. New York: Routledge.

Botting, EH & Carey, C. (2004). Wollstonecraft's philosophical impact o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rights advoc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 (4), 707-722.

Browne, K. (2005). Placing the personal in pedagogy: engaged pedagogy in 'feminist' geographical teaching.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29*(3), 339–354.

Carmichael, Stokely and Charles V. Hamilton(1967). *Black 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Carolissen et all. (2011). bell hooks and the enactment of emo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ross boundaries: A pedagogy of hop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5*(1), p157-167. Pretoria: Unisa Press.

Carson, Clayborne and David Gallen, ed. (1995). *Malcolm X: the FBI file*. Atlantic Books: New York.

Carson, Clayborne(1981).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eng, C.(1997). A review essay on the books of bell hooks: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lessons from a thoughtful race and gender heretic.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2): 553-574.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lins, P. H. (1986).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Problems*, *33*(6): S14-S32.

Donovan, J. (2000). *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3rd ed.). New York: Continuum.

Florence, N. (1998). *bell hooks' Engaged Pedagogy*. Westport, CT: Bergin & Garvey.

Franklin, J. H. (1993). *Racial Equality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Freire, Paulo(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Graham,O.(1994). Liberal vs Radical Femin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11*(2): 155–170.

Harris, K. (1995). Educating for citizenship. In Wendy Kohli (Ed.), *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p. 217-228).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 Mesa-Bains, A. (2006). *Homegrown: Engaged Cultural Critic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81). *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89).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92).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93). *Sisters of the Yam: Black Women and Self-recovery.*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1994a). *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1994c). Eros, eroticism and the pedagogical process. In Giroux, H. A. & McLaren, P. (Eds.), *Between Borders: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pp.113-118).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1995a). *Killing Rage: Ending Racism.* New York: Henry Holt.

hooks, bell (1995b). *Challenging capitalism and patriarchy: third world viewpoint interviews Bell Hooks.* Z Magazine 8 (Dec.): 37.

hooks, bell (1996a). *Reel to Real: Race, Sex, and Class at the Movies*.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1996b). *Bone Black: Memories of Girlhood.* New York: Henry Holt.

hooks, bell (1999). *Remembered Rapture: The Writer at Work*. New York: Henry Holt.

hooks, bell (2000a). *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2000b). *Where We Stand: Class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2003a). *Teaching Community: A Pedagogy of Hope.*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hooks, bell (2003b). *Rock My Soul: Black People and Self-esteem.* New York:

hooks, bell (2004). *We Real Cool: Black Men and Masculinity.*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2006). *Homegrown: Engaged Cultural Criticism.*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 bell (2009). *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2010).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Practical Wisdom.* New York: Routledge.

hooks, bell, & West, Cornel (1991). *Breaking Bread: Insurgent Black Intellectual Life.*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hooks,bell (1994b). *Outlaw Culture: Resisting Represent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Jaramillo & McLaren(2009). Borderlines: bell hooks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Davidson. M. & Yancy G.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bell hook* (pp.ix-xi). New York: Routledge.

Jeffries, Judson L. (2006). *Black power 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Joseph, Peniel E. (2006).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rethinking the civil rights-black power era*. London: Routledge.

Lawson, Steven F. (1984). *Civil right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edition.

Luke, C. (1996). Feminist pedagogy theory: reflections on power and authority. *Educational theory*, *46*(3), 283-302.

Malcolm X (1966). *Malcolm X Speaks : Selected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edited with Prefatory Notes. Ed. George Breitman. New York : Groove.

Malcolm X(1964). "Address to a meeting in New York." In George Breitman (Ed.), *Two speeches by Malcolm X* (pp. 7-21).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McCartney, John T. (1992). *Black power ideologies: an essay in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cEwen, C. (2001). Development: intersections and dilemma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2), 93–111.

Menand, L. (1994).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In Richter, D. H. (Ed.), *Falling into theory: conflicting views on reading literature* (pp.88-105).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Merck. M. & Stella Sanford, S. (Eds.) (2010). *Further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of sex: critical essays on Shulamith Firestone*. New Yor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Moi, T. (2008). *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 (2n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Jacqueline M. (2003). *Booker T. Washington, W.E.B. Du Bois,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uplift.*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Moore-Gilbert, B. (1997).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Verso.

Moya, P. M. & Hames-Garcia, M. R. (Eds.) *Reclaiming identity: realist theor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ddings, N. (1992). *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ddings, N. (1995). Care and moral education. In Wendy Kohli (Ed.), *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p. 137-148). New York: Routledge.

Ogbar, Jeffrey O. G. (2005). *Black power: radical politics and African American ident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on, H. J.(1991). *The imperfect panacea: American faith on education (1965-1990)*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Randall, V. (2000). Rethinking the canon: reflections on a text that ought to be essential reading**.**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2*(2): 197-199.

Reed, Adolph L. Jr.(1997), *W.E.B. Du Bois and political thought: fabianism and the color 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pencer, Samuel R.(1955),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the negro's place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Riera, J. H. (2010). Engaging pedagogy: One student's less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campus*, *15*(3), 17–21.

Rousselow, J. (1988). Women's words—women's worlds: Mary Daly's vision. *Media development*, *5*(4), 31-32.

Sadker, M., Sadker, D., & Klein, S. (1991). The issue of gender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G. Grant (Ed.),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17*(pp. 269-33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leeter, Christine E. (1991). *Empowerment throug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ew York: SUNY Press.

Smith, Robert C. (1981). Black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6*(3): 431-443.

SNCC(1982).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apers, 1959-1972. Sanford, NC: Microfilming Corp. of America.

Spivak, G.C.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 London: Routledge.

Steinem, G. (1995). *Outrageous acts of everyday rebellions*, (2nd ed.).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Tong, R. (1989). *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Tyler, M. (2005). Women in change management: Simone De Beauvoir and the co-optation of women's othernes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18*(6), 561-577.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丁凡譯（1999）。K. Millett 著。性政治。載於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經典**(頁76-86)。台北市：女書文化。

方永泉譯（2003）。P. Freire 著。**受壓迫者教育學**。台北市：巨流。

王玉秀（2012）。**新移民女性識字學習方案規劃實施與成效評估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王淑宜（2013）。**寓言故事結構分析策略在越南籍新移民女性閱讀教學之應用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王碧霜、黃淑玲（2009）。新移民女性的敘事文本及其教育意涵。**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2**（2）：59-75。

王錦迷（2013）。**新移民女性初級口語表達教學實施之個案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王麗玲（2012）。**繪本教學應用於新移民女性識字課程之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丘善美（2008）。**新竹縣北埔國小之新移民女性識字教育現況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課程與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冬聰凜（2004）。佳里教會的外籍新娘輔導班。**新使者，85**：32-34。

江芷玲 （2008）。**越南籍新女性移民語言學習策略的個案研究**。國立臺東大學語言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縣。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北：作者。

何青蓉（2004）。閱讀、對話、書寫與文化理解：一個多元文化教育方案的實踐經驗。**高雄師大學報，17**：1-20。

何青蓉、丘愛鈴（2009）。我國新移民識讀教育政策之問題評析與前瞻。**教育與社會研究，18**：1-31。

利百芳(2011)。**跨文化長河—新移民女性參與學校教育經驗之敘事探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吳芳茜（2008）。**台中縣新移民女性學習經驗之研究－以其動機、需求、態度與困境探討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市。

吳芳茜、李麗日（2009）。台中縣新移民女性學習經驗之研究－以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探討之。**社會科教育研究**，**14**：31－55。

吳俊緯（2004）。展臂迎新—談外籍新娘教育。**師友月刊**，**441**：17-19。

呂靜妮、李怡賢（2009）。東南亞新移民女性文化適應之經驗歷程。**耕莘學報**，**7**：55-63。

李明哲（2009）。新移民女性數學學習經驗與輔導子女數學學習間之關聯性個案研究。**教師之友**，**50**（2）：70－81。

李瑛（2004）。新移民婦女"賦權"教育之哲學省思。**哲學論集**，**37**：143-173。

沈睿（2008）。貝爾．胡克斯: 美國激進女權主義的聲音。載於沈睿(譯)，**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讀懂的女性主義**。北京：金城出版社。

屈書杰（2004）。**美國黑人教育發展研究**。保定市：河北大學出版社。

林妗鎂（2006）。**將識字教育視為一種賦權：以宜蘭縣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生活適應為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社會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宜蘭縣。

林翠玲、劉智忠（2009）。從雙文化脈絡的研究來看台灣弱勢族群的學校教育問題。**學校行政**，**59**，76-95。

邱瑞紅（2007）。**客家地區新移民女性的識字與就業：以造橋國小識字班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教師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姜珊（2011）。**貝爾．胡克斯黑人女權主義思想探析**。陝西師範大學世界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陝西。

施惠文（2005）。**「你是我的陽光」從寒冷到溫暖的教室－bell hooks「交融教育學」之故事敘說**。台南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柯妙幸（2012）。**新移民女性推廣多元文化教育之探究-以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協會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柯妘青(2012)。**南洋新移民女性錄影自拍學習歷程及其影音再現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洪泉湖（2005）。**台灣的多元文化**。台北：五南。

洪素櫻（2012）。**讀報教育應用於新移民女性華語教學之行動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夏玉華（2008）。**打造新移民女性：國小補校識字教育之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夏曉鵑（2003）。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台灣社會研究**，**49**：1-47。

高虹（2004）。**女性主義的急先鋒：西蒙波娃，灑脫的文學女人**。臺北市: 牧村圖書。

高嘉慧（2009）。**識字教學法與口語詞彙能力對新移民女性中文識字學習之影響**。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張芳全（2009）。台灣新移民女性的教育需求。**台灣教育**，**655**：37-43。

張建成（1997）。**政治與教育之間：論臺灣地區的鄉土教育**。發表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主辦「鄉土史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86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舉行。

張建成主編（2000）。**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與別人的經驗**。台北：師大書苑。

張茂桂（2002a）。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載於薛天棟編，**台灣的未來**(頁 223-273)。台北：華泰。

張茂桂（2002b）。台灣是多元文化國家？！。**文化月報－三角公園**，**13**(1)。

張維書（2010）。**影響國小新移民女性繼續學習之因素與挑戰**。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梁正怡(2005)。**新世紀教育電影中的教學圖像—交融教學越界之教育觀**。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明貞（1997）。**道德教學與評量－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台北：師大書苑。

莊勝義（2000 年 6 月）。**機會均等與多元文化兩教育運動的基本訴求及其正當性之比較**。論文發表於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學術研討會，花蓮縣。

許淑燕（2000）。解構積極性差別待遇教育措施－文化主體性的反思。載於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台灣教育社會學學會主辦之**第四屆教育社會學論壇－「多元文化、身分認同與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72-489)，花蓮縣。

陳美玲（2006）。**新移民女性識字教學之行動研究-以竹東國小補校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語文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陳英傑（2006）。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政策之分析。**學校行政**，**42**，206-221。

游美惠（2012）。跨國婚姻與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多元文化教育**。台北：高等教育。

程錫麟（1993）。*一種新崛起的理論批評：美黑人美學*，**《外國文學》，6：**12-15。

賀璋瑢（2002）。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思想淵源淺析。**世界歷史**，**5**：103-110。

黃力（2007）。社會運動脈絡下的教育實踐－記南洋臺灣姐妹會在"新移民女性在南方澳"研習營中的培力模式。**婦研縱橫**，**84**：77-84。

黃玉幸（2009）。台灣東南亞外籍配偶識字教育的生活圖像之研究。**正修通識教育學報**，**6**：157-173。

黃尚文（2006）。**多元文化思潮之爭議及其對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啟示**。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黃政傑、張嘉育（1998）。多元文化教育的問題與展望。**教育研究資訊雙月刊**，**6**（4）：69-81。

黃暉（2002）。20 世紀美國黑人文學批評理論，**《外國文學研究》，3**：22-2

楊盛名（2012）。**東南亞新移民女性華語文學習動機之研究—以屏東縣鹽埔鄉新圍國小補校學生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溫漢玉（2010）。**台南縣新移民女性參與學習與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葉雪梅（1989）。理論分析法。載於葉保田主編，**教育研究法**。高雄市：復文。

廖湘美、王榮正（2007）。臺灣女性外籍配偶語言習得之困境研究。**花大中文學報**，2：55-76。

劉金山、林彩碧（2008）。從“識字”到“增能”－外籍配偶課程規劃之合理模式。**學校行政**，54：33-43。

劉美慧（2011）。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反思與前瞻。**人文與社會學簡訊**，12（4）：56-63。

劉美慧（2012）。性別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多元文化教育**。台北：高等教育。

潘慧玲等（2000）。台灣近十年教育領導碩博士論文的分析：女性主義的觀點。**婦女與兩性學刊**：151-190。

蔡依珍（2012）。**屏東縣新移民女性華語文學習特性、學習困境及解決策略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鄭惠珮 (2012) 。**臺東縣國小補校新移民女性學習適應與中輟傾向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東縣。

鄭雅雯 (2011)。**高雄市新移民女性就讀補校學習動機與成效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盧宸緯（2005）。**越籍新移民女性中文學習經驗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賴凡（2009），美國黑人運動的發展及展望，**《四川文理學院學報》**，4：78-81。

賴美言（2009）。心理劇在新移民女性輔導工作之應用。**諮商與輔導**，273：21-26。

鮑曉蘭編（1995）。**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

謝美桃（2007）。**苗栗縣新移民女性成人基本教育問題與對策之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課程與教學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謝美桃、劉由貴（2009）。苗栗縣新移民女性成人基本教育華語文教學問題之研究。**聯大學報**，6（1）：233-261。

闕河嘉、李欣潔、朱亭亭、呂宜華（2013）。禮物論與臺灣新移民教育政策。**農業推廣學報**，30：63-82。

魏麗敏（2011）。新移民女性自我價值感、生活適應及對子女教養方式之團體諮商應用分析。**諮商與輔導**，307：49–53。

羅長江（2000）。**西蒙波娃:新女性主義的倡導者**。臺北市:婦女與生活社文化。

羅雅倫（2009）。**創作性戲劇教學在新移民女性語言課程的實施與運用－以蘭馨婦幼中心為例**。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譚光鼎（2012a）。族群關係與教育。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多元文化教育**。台北：高等教育。

譚光鼎（2012b）。原住民教育。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多元文化教育**。台北：高等教育。

譚光鼎（2012c）。多元文化教育的批判與檢討。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多元文化教育**。台北：高等教育。

顧燕翎（2000）。導言。載於顧燕翎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